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英雄探险家卷

陈纳德

赵家业编著



Chennade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1996年10月2日。

广西桂林地区兴安县的两位青年农民，进入当地猫儿山原始森林腹地黑冲采草药。

这猫儿山一带，地势险峻，人迹罕至，不久他们就迷路了。他们相准了附近最高处的一棵大树，爬上树顶向四周观察，试图寻找出路。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的山崖上有发光的物体，像是大块金属。

当晚，他们在崖下卧草过夜。

第二天，他们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攀上悬崖。那发光的物体果然是大片金属，而且已经有点扭曲变形，附近还有几只“汽车轮胎”！令他们百思不解的是，这崇山峻岭、密林深处，何来这些东西？

10月16日，兴安县领导得知消息后，组织人马再度进入猫儿山探险。

他们同样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散落在长约500米、宽约5米的悬崖断壁地带的金属残骸，山崖上留下的痕迹，清楚地表明，此处曾经有一架飞机撞崖坠毁。飞机早已解体，残骸碎片大多已被草木掩盖，被风化崩塌的石块埋压。飞机的一片螺旋桨叶还插在石缝中。残骸的铁质部件已是锈迹斑斑，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正是机翼等铝合金部件。

接着又进行了多次搜寻。

除了运回机翼等飞机残骸部件，还找到了手枪、机关炮子弹、发动机铭牌、钱币、水壶、饭盒、怀表、匕首……

更为重要的是——

人们清理飞机残骸中，发现了表明美国军人身份的标志牌，一式两个，用链条相连，分别为铜质和不锈钢。据说，美军规定：遇到死难的军人，其他活着者要将其中一块标志牌取走向上级汇报，另一块留在死者身上，以便日后辨认。

现已找到的机组人员遗骨多为肢骨，此外还有两块下颚骨，其中一块下颚骨还残留着一颗包金牙齿。遗骨遭50多载风雨侵蚀，已基本残碎，有黑点斑痕或长了青苔。

这一意外发现，不久震惊了华盛顿。

1996年12月12日，美联社自华盛顿报道：

“官员们说，五角大楼已证实在中国南部一个山谷里发现的五块美军身份牌与报道在1944年驾驶B—24飞机执行轰炸任务中失踪的美国飞行员的姓名相符。”

1997年1月15日，上午9时。

广西兴安县灵渠饭店。

这里正在举行一个令人瞩目的二战期间美军飞行员遗骸交接仪式——

“广西兴安县美军遗骸交接仪式”。

会场庄严肃穆。

广西外办主任首先发言。

然后由美国国防部失踪人员办公室副主任艾兰发言。他说：

“我代表克林顿总统、佩里国防部长、死难机组人员的亲属和全体美国人民向广西政府和人民，以及他们的搜寻遗骸工作表示感谢。50多年前，这些勇敢的美军士兵和他们的中国朋友一起抗击共同的敌人，今天正是这种友谊使我们能把他们的遗骸奉安回国。”

双方代表在交接文件上签字。

之后，美方代表接过遗骸盒，一位美国军官庄严地在遗骸盒上盖上一面折叠起的美国国旗，并致军礼。

……

让时间回到 50 多年前。

那时，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蹂躏。能够从中国空中给予日本侵华敌机致命打击的，正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

1943 年，“飞虎队”遂成为第 14 航空队的骨干，仍归陈纳德指挥。

而这架坠毁于广西兴安县的美军飞机，当时就是隶属于第 14 航空队第 375 轰炸机中队。

美军一份作战报告说：1944 年 8 月 31 日，下午 4 点 30 分，这架轰炸机从位于中国柳州的美军基地起飞，机上共有 10 名机组人员。该机在轰炸了停泊在台湾一个港口的日本军舰之后，在返回基地途中失踪。……

如此壮烈的画面，50 多年以后，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为两个普通而又平凡的青年农民所发现。

人们不禁想探问：“飞虎队”的首脑陈纳德将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来华抗日？

陈纳德已于 1958 年病逝美国。他的遗孀就是陈香梅女士。这位美籍华人，迄今仍然活跃在政治社交舞台。陈纳德生前曾经对陈香梅说——“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本传记，从这位“也算是半个中国人”的反法西斯英雄的成长历程中，认真地吸取一些于我们有益的启示及其他。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 X = 素质。素质 = 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陈纳德

第一章 故乡

1 祖先来自法国

1776年7月4日。

美国费城独立厅楼上的自由钟敲响了。

《独立宣言》用铿锵有力的字句宣布：

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力，谨庄严宣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应从此完全废止。

北美大陆上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后来，美国政府和人民就把7月4日这一天，定为美国的国庆日。

然而，英国殖民者并不甘心于失败。英王咬牙切齿地说：

“宁可丢掉王冠，决不放弃战争！”

英国援军越来越多。

美国大陆军渐渐抵挡不住英军的进攻。纽约一战，险些全军覆没，华盛顿本人也差点被英军捉住。

这时，被派往法国进行外交活动的富兰克林，巧妙地利用英法两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到了法国的军火支援。

1778年，美国和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法国派兵参加对英作战。接着，西班牙等国也在军事上援助美国。

华盛顿重振旗鼓，经过几年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强大的英军。

1783年，英国被迫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在美国的这场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时期，1778年在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有一个姓陈纳德的法国耶稣新教徒。他家有三个兄弟，跟随拉斐德将军，参加了志愿军，赴美国同美国人民并肩作战。

三兄弟中有一个名叫斯蒂汶的，他就是本书传主克莱尔·李·陈纳德的祖先。

斯蒂汶在战争结束后，成了家，并且移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西南部，一个叫做阿尔比玛的地方。他开始种植烟草，并以此谋生。

斯蒂汶的儿子，约翰·纳尔逊，像他父亲一样富有冒险精神。

他只身携带一支来福枪，穿过原始森林，朝南行进，来到人迹罕至的田纳西州。过了一段时间，他继续向前开拓，深入到了卡罗来纳州。

接着，他在西进的途中，邂逅了哈娜·休斯顿。她是得克萨斯州开山祖山姆·休斯顿的堂妹。

约翰·纳尔逊与哈娜成婚。

他们给他们的长子取名斯蒂汶，为的是继承先父斯蒂汶的遗志，发扬开拓精神。

孩子渐渐长大。

显然，他也具有英勇冒险的陈纳德家族精神。继续西进，穿过密西西比州。终于到达路易斯安那州平原的水乡泽国，从此在这里落籍。

大约在1842年，斯蒂汶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在路易斯安那州购置了300亩良田。

路易斯安那州南临墨西哥湾。美国南方最大的港口——新奥尔良，就位于该州。

斯蒂汶打算将他的后半生希望和精力，全部都寄托在种植棉花和成家立业上。

他向法兰西斯·汤玛森求婚，随后娶了她。他们的儿子，名叫约翰·史东活·陈纳德，教名是约翰·杰克逊·陈纳德。

约翰·史东活长大后，其个性一若乃父。他尤其喜好到树木茂密的辽远地带遨游，狩猎，垂钓。

一次，他射出的一颗子弹，击穿了马贩子的毡帽。从而把这个专事欺诈的马贩子，驱逐出了这块土地。

就这样，约翰·史东活的名字，伴随着他的强壮与剽悍，几乎传遍了路易斯安那州。而且没有人不认为，他是全州最漂亮的年轻男子。

约翰·史东活娶吉茜·李为妻。

吉茜·李的父亲，名叫威廉·华莱士·李。他是当时颇负声誉的医生，曾经在弗吉尼亚州做过军医。而吉茜·李的伯父，罗伯特·爱德华·李，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赫赫有名的南部联军统帅。

李氏家庭最初是英国的一个古老家庭，后来迁居美国。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的个人观点，倾向于反对奴隶制，反对祖国分裂。因为是南方人，他又不得不违心地站在南方人一边。

南北战争经历了5年之久。

虽然李将军在多次战役中显示了他的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且被人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最终随着北方的胜利和南方的失败，李将军于1865年投诚。尔后，他在华盛顿大学担任校长之职。1870年10月12日，李将军去世。

起先，吉茜·李一度拒绝约翰·史东活·陈纳德的求婚。因为在她心目中，未来的丈夫应当是温顺、体贴，而他却太粗犷了些。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成了婚。

由于约翰·史东活祖母的娘家休斯顿家族是得克萨斯州的望族，因此，他携妻前往得克萨斯州拓荒。

在得克萨斯州的东部，距离该州的大都市达拉斯大约有100英里，有一个小镇，叫做康麦斯。

约翰·史东活一家就住在这个小镇上。

1893年9月6日。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即本书传主克莱尔·李·陈纳德，这一天就诞生在这里。

吉茜·李娇弱多病，身染肺疾，经常咯血。

约翰·史东活举家东迁，回到路易斯安那州，定居于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梦洛。

陈纳德5岁。

母亲仍咯血不止，终因吐血而歿。

母亲的逝世，给陈纳德留下了锥心刺骨的痛苦记忆。

然而在童年陈纳德的热血中，流淌着先人遗留的更为丰富的营养：献身自由，勇于开拓，大将风范，耿直淳朴……

2 喜欢历史地理数学

陈纳德的童年，是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梦洛度过的。

世界第四长河——密西西比河从这里流过。弯曲的河身，经著名港市新奥尔良，注入墨西哥湾。河口处，形成鸟足形的三角洲。所经之处，留下一片无垠的肥沃田地、高大荫深的橡树柏树丛林。

相传路易斯安那州原本是法国的殖民地。它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落基山脉以东的广大区域。1681年为纪念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取名为路易斯安那，意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土地”。1803年，拿破仑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把这片土地卖给了美国。美国后来又把它分割为好几个州，而把密西西比河口这个州，仍然称做路易斯安那州。

原始丛林中，时常有熊狼出没，野鹿和野火鸡成群结队。河湾沼泽地，野鹅野鸭难以计数。这美丽、富饶、如诗如画的大自然，似乎就是母亲的怀抱。

恰如他的先辈，陈纳德也喜欢独自在家乡附近的原野狩猎，垂钓。

8岁那年，陈纳德便学会了使用来福枪打猎。他习惯于过那种以打猎为生的猎人生活。

父亲很理解陈纳德，任随他外出游逛。

有时他以咸肉、小鱼和麦饼之类的食物充饥，能够在野外呆上一个星期。回家时，他总是带着满满一袋子小猎物，可供全家人吃上好些天。

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常在西萨斯河畔垂钓。秋末季节，他又好整以暇地在林中追猎野鹿。

后来，他经常离家到野外搭起帐篷，自己寻找、烹煮食物，独自置身于森林之中，而从未感到过孤独。

狩猎和垂钓这两项嗜好，竟然伴随着陈纳德的一生。后来他成为著名的飞虎将军，对他的童年生活都一直难以忘怀。他曾经回忆说：

“每次我从中国回到美国的时候，无论逗留的时间是久是暂，我总要想办法到故乡路易斯安那州去垂钓一番，哪怕是几个钟头的享受也好。”

陈纳德热衷于冒险旅行，其酷爱之情，不会亚于狩猎、垂钓和野营。

在他12岁时，有一次，他独自驾了一叶小舟，从田纳西河出发，驶往咆哮奔腾的密西西比河。

小船载着他顺流而下。

远处，隐隐约约有灯光在闪亮。

那灯光似乎在向他靠拢，渐趋渐近，不禁勾起了他的一番遐思。

忽地，他看清了。这是一轮弓形的亮光，它高高悬挂在一艘桨叶在外的老式轮船上。

说时迟，那时快。

轮船猛驰前来，翻滚着水浪，波涛汹涌，竟然将陈纳德的小船掀了个底朝天。

陈纳德紧紧抓住他的来福枪，奋力游上了岸。又冷又饿的他，敲响了一幢亮着灯光的农舍的大门。

一个星期后，陈纳德平安回到了家。

从陈纳德的祖父斯蒂汶，到父亲约翰·史东活，及至陈纳德长大后，

家道已渐次中落。据说他后来上大学的学费，还是靠外祖父供给的。

上小学时，家境更是清贫。每天要徒步四五英里去上课，就是过圣诞节，所能得到的礼物也只是苹果一个、图书一本、糖果少许而已。

除了上学读书之外，小小年纪的陈纳德还要帮助父亲下田做农活，有时还要照料比他年幼八九岁的两个弟弟。母亲的逝去，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品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苦辣。

在学校，他每门功课几乎都是名列前茅。

他最喜欢的课程，是历史、地理、数学。

只要一有空，他就埋头于外祖父威廉·华莱士·李医生的书房。

《劫后英雄传》、《金银岛》、《罗宾汉》、《汤姆历险记》……都是他爱看的书，而且一读再读，爱不忍释。《圣经》也是他感兴趣的读物。他发现《圣经》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史料，而且中世纪的文学艺术作品，很多就是取材于圣经故事。

在外祖父的书架上，还收藏了一些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战争故事的书籍。

这些故纸堆陈纳德也取下来翻阅一番，虽然他对希腊、迦太基、罗马这些古地址不甚了解，却被书中那些插图所描绘的大象、披甲的士兵、熊熊燃烧的战船，深深地吸引住了。

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与罗马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从而导致了战争。公元前218年，迦太基派遣大将汉尼拔开始远征。汉尼拔率兵直驱罗马，罗马累遭失败。直至迦太基兵临罗马城下。此时，罗马名将西庇阿出兵奇袭，直捣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军驰援。结果，迦太基于公元前202年败北，次年缔结和约。

还真叫陈纳德读懂了这个故事。

日后他到中国参加对日空战时，竟然采纳过这种战术。1942年陈纳德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封长信中，也提到了这则故事。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则有妇孺皆知的“围魏救赵”。

战国时期。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双方战守年余，赵衰魏疲。这时，齐国应赵国的求救，派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率兵8万救赵。孙臆向田忌建议，带兵直插魏国都城大梁，占据交通要道，避实击虚。因为当时魏国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赵国，内部肯定十分空虚。田忌采纳了孙臆的计策，引兵直奔魏国大梁。魏军果然闻讯急忙回救，齐国军队乘其疲惫，在预定的作战地区桂陵迎敌于归途。结果魏军大败，赵国也得以解围。

万籁俱寂的夜晚，陈纳德独自端坐在户外，遥望着星空。此时，他已经知道天幕中许多星座的名称。

在康麦斯这个小镇上，他还涉猎了有关航空方面的许多新知识。

上世纪末，莱特兄弟便开始了航空研究。他们进行过近千次的滑翔飞行，失败了又重新开始，终于在1903年设计出了第一架有人驾驶的飞机。

1903年12月17日，这架用内燃机作动力的飞机，在美国的基蒂霍克试飞成功。

这次试飞虽然飞行时间只有59秒，飞机距离地面也不过260米，毕竟是人类航空史上的首次。

陈纳德心中暗暗自许，有一天他也要飞向天空。

3 洛蒂·巴恩斯

1903年。陈纳德10岁。

父亲续弦。继母是陈纳德在当地的吉尔伯特小学的教员，洛蒂·巴恩斯女士。

还在她嫁给陈纳德父亲之前，陈纳德就已经同她很要好，他们经常一道出去骑马，旅行，到郊外野餐。她成长于路易斯安那州卡尔本附近的农庄。因此，她也酷爱大自然。

继母常常鼓励陈纳德，去过他所热爱的生活，并激发他应当怀有远见和大志，成为一个有为的人。

她谆谆教导说：

“仅仅在打猎捕鱼的技巧上比其他孩子高明，这算不了什么。你应当在学问上做同龄儿童中的佼佼者。”陈纳德再次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母爱的力量。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可敬的继母，5年之后突然去世了。这件事使陈纳德一生都耿耿于怀。

他曾无限深情地说：

“那时我年甫十五，重又感到可怕的孤独，并且在以后的时光里，再也找不到一位那样使我全身心地钦仰敬爱的人。”童年时代那种无羁无束、放浪形骸的生活，加上继母所给予的同情和爱的教养，把陈纳德的一颗童心塑成了有点与同龄孩子格格不入的天性。

于是，逐渐养成了他的自信、自强、自作决断的性格。他宁愿自行其是，做小伙伴中的首领，也不愿接受比他大的孩子的指挥。这一点也正是他后来喜欢出人头地的萌芽。对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样的行为，他总爱挺身而出，扶弱锄强。

他具有一种好胜的禀性，在竞争中从不服输，不甘落后。他总是告诫自己要比别的孩子强，要跑得快，跳得高，游得远，潜得深。

钓鱼要钓最大的，打猎要比别人射得准。

读书要比别人读的多。

下地干农活要比别家的孩子更卖力。

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要名列前茅。

校垒球队里是出色的选手。

篮球队中是最优秀的中锋。

足球也要踢得最好。

……

总之，他要求自己事事都要独占鳌头。

一种凡事爱做领袖的冲动，不时涌入他的头脑。他经常下达指令，让那些能力较次的孩子去完成。一旦获得成功，他很少沾沾自喜，或是自傲，而是继续进入下一个游戏。

然而，他的天性中也有不足的一面：害羞，对他人的批评极其敏感，在大孩子面前缺乏自信。

假如让他全权去主理一件事情，其结果往往是十分圆满的。

他精力充沛，思虑过人，对任何问题都能当机立断，并且见诸于行

动。因而他尤其看不惯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同他们格格不入。

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对他以后的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他常因没有及时详细地向上司阐述他的计划，而使得一部分上司觉得他不够稳健，认为他是个易于冲动的人。他们对于像陈纳德这种能够临危不迫，而且妥筹善策，迅速采取行动的人，完全缺乏足够的认识。

继母洛蒂·巴恩斯去世的那年，陈纳德 15 岁。时为 1908 年。

陈纳德中学毕业了。

虽然还未到读大学的年龄，可是陈纳德却长得又高又大，父亲不愿他虚度年华，于是给他虚报年龄，15 岁报了 18 岁，把出生年份改成了 1890 年。父亲希望儿子不再在田里做农活，考上大学，拿个学位，将来做名教师。

是年考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恰值陈纳德家族此时家道中衰，连读大学的学费都成问题。

幸好当时美国南方的家庭比北方守旧，他们那种敬老慈幼的人情，似乎同我们中国有不少相像的地方。

外祖父威廉·华莱士·李医生替陈纳德交了学费，这样他才顺利地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还是在陈纳德 5 岁时，他的亲生母亲因肺疾而病歿，他和弟弟都住在外祖父家。兄弟俩还得到过姨母露蕙丝·蔡斯的悉心照料。

陈纳德对她同样十分敬重和挚爱。

正如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中所描写的：

“他们一同读书，散步，并且垂钓，孩子般的享受每一时刻。我们第二个孩子出世时，即命名为雪狄雅·露蕙丝，乃是以我姐姐雪狄雅（静宜姊的教名）及将军的姨母露蕙丝二人之名为名。”

姨母露蕙丝·蔡斯，同样给了童年的陈纳德以无私的母爱，这在塑造他的性格与影响他以后的命运方面，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4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坐落在路州首府巴吞鲁日。

军事训练是美国大学的必修课，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也不例外。陈纳德入学没几天，他被派到高年级同学宿舍值班，任务是把守宿舍大门，不让没带通行证的同学随便进出。

一天，当陈纳德在宿舍大门口煞有介事地把守时，住在二楼的高年级同学看到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便想捉弄捉弄他。

他们把一盆又一盆的冷水从窗口往下浇，直把陈纳德淋了个落汤鸡似的。

这接二连三的当头冷水，激起了陈纳德的无名之火，但是他尽力克制，仍然从容地在宿舍门口迈着方步，扛着枪，一言不发。

中午，吃饭铃声响了。

一群饿狼似的高年级同学，从楼上冲了下来，准备到食堂吃饭。

就在这时，陈纳德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出来挡驾了。他横眉怒视，双眼喷射出复仇的目光。

这些高年级同学都被他这副样子给震住了，一个个无可奈何，只得

返回宿舍，一直饿到下午。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下一轮值日生，换了陈纳德的岗，才算解了这些挨饿同学的围。

事后陈纳德自己也感到有些后悔，他说：

“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点……”

陈纳德从小就喜爱渔猎生活，尤其在初夏，这是在邓萨斯河里捕鱼最理想的季节。可是，这时大学还没有放暑假。为了急于到河上赶捕鱼的季节，他想方设法在大考结束，得到学分之后，找点错事来干，好让学校记过，把他开除，以求得早一个星期离校。

下个学期秋季开学时，他又再想法子入校。

由于陈纳德在中小学接受的教育，不允许他选修其他科目，而只能主修农科。当时，他又无意要做一个农人。翌年，他报名投考西点军校和海军学校。当他在安纳波利斯参加入学考试，看到那阴暗的灰墙校舍，顿时他想当海军上将的热望不觉冷了半截。经过两天汗流浹背的考试之后，有位好心人告诉他说：“即使你侥幸被录取，还得在这样的校舍内攻读两年，然后才可以正式受训呢。”

这种刻板的生活，看来对于一个过惯了无羁无束生活的“野孩子”，实在太不相宜了。

于是，陈纳德在最后一场考试中，故意交了白卷，接着他给家中老父拍了一封电报，声称落第，便乘下一班火车打道回府了。

5 “陈纳德，你这一生休想做军人”

初夏到邓萨斯河上去捕鱼，是对陈纳德难以阻挡的一种巨大诱惑。

又是一个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陈纳德为了尽早离校，去赶捕鱼季节，他发现自己还差三个缺点才可以受到被学校开除的处分。

学校规定学生在校不得饮酒。

他自告奋勇偷出校门，替那些酒鬼同学去买酒，虽然那时他因家贫从未尝过啤酒的味道。而他惟一的希望是，能够遇到学校的守卫，同他发生冲突，藉此受到记过处分，达到离校的目的。

可是，老天不作美。

当陈纳德手提着买来的酒，大模大样地返回校舍时，竟然没有遇到一个守卫。他的违规行为自然也就无人向校方报告了。

失望之余，他仍不死心，又出去找守卫，结果还是未获成功。

最后，他只得在期末的军训列队检阅时，故意将裤脚筒高高卷起，装扮出一副怪模怪样来，好让值班军官给他记过处分。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理想。结果是弄巧成拙。

碰巧那位值班军官是一个很傲慢的中尉，他让陈纳德出列，然后当着全体学员的面斥责陈纳德：

“陈纳德，你这一生休想做军人！”

陈纳德没想到这次天真的行为，几乎断送了他自己的前程。

值班军官后来又把他对陈纳德的坏印象，传给了一个名叫沙尔门的上尉。后来在陈纳德第一次申请加入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时，由于他的这

次行为而受到阻挠。

沙尔门上尉在陈纳德的评语中写道：

“该申请人未具备成为成功的飞行员的必要条件。”

像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陈纳德追求着光明，希望创造新的世界。

同时，他又神往于历史所载的英烈事迹，时常以母亲的伯父，即那位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名将李将军，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恨不身为古人，好驰骋疆场，一显男儿身手。

当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博览会上，见到那架摇摆不定的寇蒂斯双翼机时，愈加增强了他投身于航空事业的志愿。

然而，沙尔门上尉的一纸评语，竟使陈纳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他说：

“沙尔门的名字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6 “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由于父亲指望儿子将来能够做名教师，不再做农民，于是陈纳德转学师范。

191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师范学校，度过了最后一年的大学生生活。

毕业时，陈纳德年仅18岁。

从此，他取得了担任教职的资格。不久，路易斯安那州雅典镇的一所乡村小学，聘请他担任该小学的教师。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入学较迟，虽说是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却都是些高头大马的大人，好几个学生甚至比陈纳德的年龄还要大。

他们见是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大人来做老师，马上联合起来跟他捣蛋。他们高声谈笑，不用心听课，根本就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他上第一节课，刚把一切安排就绪，转身擦黑板时，一块橡皮擦投到他的头上。他回转身，教室里的男孩子全都咧着嘴对他笑。

“谁掷的橡皮擦？”陈纳德问。

沉默。

“我认为在背后打人，不需要什么胆量。我看得出，不论是谁抛的，他没有足够的勇气站出来承认。”陈纳德面带微笑，轻蔑地对全班学生说。

再次沉默。

突然，从最后一排爆出一个大嗓门嚷道：

“我掷的！”

这是一个又壮又高的男生，看上去比陈纳德还高出一个头，满脸浮现出挑衅的笑容。

陈纳德心想若不把这个领头的顽皮学生制服，将来肯定无法留任。

第二天，一清早上课时，这些学生又来给他过不去。陈纳德缓缓走向后排，昨天那个闹事的学生举起了拳头。这位年轻的教师瞅了他一眼，接着心平气和地对着他的学生说：

“来，我们到外面去一试身手！”

他们两人来到校园的一角，摆好阵势，准备一较身手，其他学生也

跟着走到外面看热闹。

那个男生虽然个头比陈纳德高大，而且由于经常做农活，体格很结实，但是陈纳德却学过拳击，坚强有力，动作轻巧而灵敏。

两人只不过打了一两个回合，那个淘气学生便仰卧草地，彻底被击败了。

众人喝彩。

陈纳德一摇身便成了他们的英雄。为首捣乱的学生服输了，从此不再淘气、破坏课堂纪律了。

事后陈纳德经过调查，发现这群学生原先已经撵走了好几位教师，那些教师因为受不了这些淘气学生的起哄，全都挂冠而去。

于是他当即决定组织一个棒球队，利用体育运动来调剂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时间。

下课后他教他们练球，并鼓励他们同其他校队比赛。结果把三角洲地区的所有球队全都打败了。后来，这个球队竟然以6：2的成绩，将门罗镇的半职业性球队也击败了。

通过对学生的循循善诱，这些本来爱捣蛋的顽皮学生，一个个都能安心读书了，而且非常尊重这位只有18岁的年轻老师。

陈纳德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导师。

后来他在航校做教官时，对于学习飞行的学生也是训导有方。经过他教导的学生，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出人头地的。

然而，他对于那些不具备飞行员品能的学生，也能及时发现及时指出，劝他们趁早改行，以免误人前途。

一位当年接受陈纳德的忠告改行后成了一家大公司老板的学生，后来对陈香梅说：

“陈纳德将军劝我不要学习飞行，我当时很气愤，但后来我想假如我做飞行员大概早就死了。我今日的成功该感谢你的丈夫。”

乡村学校在春季就结业，以便那些学生能够及时回家帮助耕种，一直要到秋收以后，学校才开学。

因此，陈纳德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猎，去垂钓，自得其乐。

第二章 从军

1 飞向达拉斯

不久，陈纳德和一个名叫内尔的同乡姑娘结了婚，接着有了两个孩子。

乡村教师菲薄的待遇，难以维持家庭开销，于是陈纳德不得不外出寻找收入较好的差事。

在密西西比州的比路色商科学院，他担任过英文教员。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青年会，当过体育教练。1916年，他还在俄亥俄州阿克朗城的汽车工厂任过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陈纳德才得应征入伍。同年8月，他在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士官学校受训。经过3个月的训练，于11月成为一名陆军中尉。

陈纳德的第一份差事，是被派到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特拉维斯要塞第90师服务。

在距离特拉维斯要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机场，称做凯利机场，它是由棉田改造而成的。这个机场是通讯队用来训练飞行人员的地方。

陈纳德早就有志投身于航空事业。因而当凯利机场征求志愿飞行员时，他立即跑去报了名。

接着，他在凯利机场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先后三次请求学习飞行，却因他的年龄偏大而遭到拒绝。不过最后一次请求终于获准了。

为了实现飞行的梦想，陈纳德利用一切机会，向几个乐于指导他的教练请教飞行原理。

查理·李昂是一位老练的教官，经常在课外指导陈纳德掌握飞行技能。

另外一位年轻的机师，劳尔夫中尉，也时常给予陈纳德独自驾驶飞机的机会。

不久陈纳德被调到另一个机场去检查飞行工作。他的工作是检查一切进出的飞机，登记飞行钟点。有时遇上飞机飞行的钟点不够，他就乘机跳上飞机，消磨掉这个飞行钟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行事业还不太发达，关于飞行方面的严格规定根本就来不及制订。有一个机械士曾假冒飞行员，趁大家正在吃中饭的时候，突然偷偷驾了一架飞机，不料此公不懂飞行技术，当他准备在勃鲁克斯机场降落时，竟和一个大水桶相撞，这才被人发觉，可是在提审他时，审判官却又找不到一条法律来制裁他的这种行为。

有一次，陈纳德也私自驾了一架袖珍型飞机，从容不迫地飞向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盘桓了一个星期，这件事竟然没有一个人知晓。

由此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

2 “这一个还没有死呢”

1918年秋天，陈纳德被派到长岛的米契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

10月里的一个雨天，陈纳德奉命随部队行军至港口登船，开往法国。

离开目的地尚有一半路的途中，忽然停止前进，且由原路折返，原来“停战协定”正在酝酿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返回米契尔机场时，陈纳德旋即奉命赴弗吉尼亚州的兰黎机场，执行特别任务。

此时，兰黎机场已经发生猖獗的流行性感冒，该病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于是只得把飞机从机棚中移出，以便容纳越来越多的患病士兵，当病人奄奄一息的时候马上就被抬出去，而将床位让给另一些新病人。

接着灾难不幸落到了陈纳德的头上。

他在一个住有 102 名病人的机棚里接受检疫，下午被抬到一个小房间里，这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度过最后几小时的地方。而与他邻床的一名军官就是在当日的黄昏时分死去的，进来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对他作了一番检查后，就把他抬了出去。

陈纳德不禁毛骨悚然。

恍恍惚惚之中，他清楚记得他们离开这间小房间的时候，医生同护士的对话，那个医生吩咐护士把门锁上。护士抗议道：

“这个还没有死呢。”

“他明天早晨之前就会死掉的。把门锁上吧！”那位医生这样的回答。

翌日早晨，陈纳德竟奇迹般地活着。

原来是劳尔夫中尉救了他的一命。这个劳尔夫中尉，就是陈纳德在凯利机场学习飞行时，曾多次让陈纳德独自驾驶飞机的机师，后来成了陈纳德的好友，此番他已从凯利调至兰黎担任宪兵副司令。他藏有许多没收来的名酒，昨晚来看陈纳德时，顺便带了一夸尔的波旁牌酒。陈纳德依靠这一点酒，战胜了死神的威胁，很快得以痊愈。

不久陈纳德接到调令，乘火车回到圣安东尼奥的凯利机场飞行学校。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数月后，劳尔夫中尉不幸在一次飞行中罹难。

陈纳德遥望北方的晴空，向他的朋友、救命恩人劳尔夫中尉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到凯利机场，陈纳德首次正式飞行，险些被淘汰。

在接受正式飞行训练之前，陈纳德已经偷偷地独自飞行了 80 个小时，这使他染上了一些不良的飞行习惯。及至正式训练时，这些不良习惯便暴露无遗了。

而陈纳德的教官包理康，又是一个鲁莽顽固之徒。他对于见习生在飞行时出现不正确的地方，从不加以解释，只是暴跳如雷，把驾驶盘抢过来，以示其不满。陈纳德警告他说：

“如果下一次再这样做的话，我将拒绝驾驶，让你一个人去控制飞机！”

一次，在练习飞机迫降时，包理康因一时气急，又来那一套。陈纳德果然立即离开岗位，包理康只得独自一个人进行操纵。起初，包理康还以为他会平静下来重新操练的，可是陈纳德仍然无动于衷。于是，飞机不受控制地急转直下。

至此包理康意识到这个学员竟然同他一样地固执，只好自己设法使飞机降落。

飞机一着陆，包理康就迫不及待地向机航组跑去，写下了一纸淘汰陈纳德的建议书。

机航组给了陈纳德最后一个自新的机会，将他交给了一位优秀的机师爱里逊。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陈纳德时来运转了。

爱里逊非常通情达理，而且在航空界很有点声望。他在倾听了陈纳德的申诉后，觉得陈纳德受了委屈。于是在一次见习飞行时，飞行了一小时后，爱里逊指示陈纳德降落。爱里逊从着陆的飞机里跑下来，叫陈纳德独自飞行。

让一个曾经受到申斥的学员单独驾驶，这在飞行训练中是不常有的事。这使陈纳德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陈纳德后来兴奋地回忆说：

“我第一次真正的对天空发生了喜爱，应该归功于爱里逊先生。前此我所学的不过是容易的因袭的老法子。自从爱里逊把飞行表演的技术教给我，我就着了迷般的去学习，有如鱼之得水了。爱里逊本人对于飞行技术表演有经验，但对于这种比较冒险的尝试，他倒没有多大的兴趣。我呢，自始即乐此不疲。坐在飞机上，天旋地转，其味无穷。我把凡是爱里逊所晓得的都学习了，当 1919 年春天，我正式从飞行学校毕业出来的时候，我对于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很满意——我已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了。”

1920 年，陈纳德退伍了。

然而，27 岁的他对于航空飞行却始终未能忘怀。不久他申请加入新近组成的空军机构，这年秋天被录取，成为该组织的 1000 名空军军官中的一个。

这个空军机构不断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扩大为规模可观的陆军航空队。

1921 年夏天，陈纳德驻防于得克萨斯州的艾灵顿机场。

那时所用的却是一些外国飞机，如法国的斯巴德小型飞机，英国的 SE—S 型机。这是因为美国工厂当时还不能制造出一种可与法英各国相匹敌的战斗机。

这些外国飞机的机身，全都漆上了星条旗的标志。

经过短期学习后，陈纳德加入了亨特少校领导的第 94 战斗机队。亨特少校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升为少将，后来在英国指挥第 8 战斗机总队。

接着是四个月的飞行训练。

开始演习各种队形作战的方式，例如长时间的编队飞行巡逻，对敌作战，分成小队俯冲猛攻敌机，等等。

就这样，他们每天几乎飞遍了整个得克萨斯州。

渐渐地，陈纳德感到这样的飞行很不对劲，假若面临着实战场面，照这样的演习，很可能会全盘皆输。

有一次，为了使情景逼真，实行作战演习。陈纳德想到一种使敌机

难于咬尾穷追的战术，他让祖·康农驾驶 SE—S 型机，攻袭史特斯和他的斯巴德型机。

当祖·康农驾机俯攻时，陈纳德和史特斯的飞机翻了一个身就向上升起，正在预备居高飞出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史特斯忽然改变了主意，使机身在空中旋转着。康农为了紧追，竟撞在史特斯的斯巴德型机上，这样一来，两架飞机的机翼便成了碎片，纷纷向四处飘坠。

史特斯立即采用迫降法，安全着地，自己没有受伤。

康农的飞机全部解体，从高空失了魂似地向下掉，碎片纷纷飞下来。

由于那时他们的飞机上还没有装上降落伞，所以当康农抱着飞机残骸倒在地面上的时候，陈纳德料想康农是断无生还的了，他立即回到机场，请求派出一辆枢车，而不是一辆救护车。

奇怪的是，康农竟然还能勉强走到了医院的大门。他的肋骨断了，下巴伤了，整个脸孔伤得不成人样了，然而他却得幸生还。

康农后来是美国在意大利第 12 航空队的司令。史特斯担任了美国驻日第 7 航空队的司令。

陈纳德的战术从此搁浅。

直到 1923 年，他奉调夏威夷，才有机会重新研究新的航空战术。

3 夏威夷

清洁的沙滩。浅滩水中，成群的热带鱼五彩缤纷。

碧绿的海水，翻起白色的浪花。

海滩上，椰树成林。

1887 年美国在珍珠港建立了燃料供应站，1911 年改建为巨大的海军基地，此后逐渐扩大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的最大海空基地之一。

陈纳德就在珍珠港中心的福特岛上，担任路加机场第 19 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

路加机场后来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中，成了日本空袭的主要目标。

陈纳德第一次做了指挥官，一家大小都随他住在这个岛上。他的最小的儿子罗伯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日光浴使陈纳德的皮肤变为棕色，身体长得又黑又结实，唇上留了一道黑色的小胡子，穿着一身白制服，何等的威风。军人生涯加上天伦之乐颇使他感到心满意足：“回顾当年在夏威夷的生活，可说是我在空中最快乐的时光。”

自从来到夏威夷，两年以来，陈纳德几乎每天都在指导全队的训练飞行，研究各种新的航空战术。

那时候他们训练所用的飞机，主要有 MB—3 型双翼和波音式双引擎机。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使得那些反对发展航空的陆海军官员们心怀嫉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那些升平的日子里，高射炮的炮手们自视甚高，他们自以为能够击落空中任何一架飞机，而且炮兵指挥官的军衔普遍高于空军军官。因此，所有的军事训练都要依照炮兵的准则，

而炮兵队的人员就藉此颐指气使空军队员。

陈纳德哪能咽得下这口气。

他费了很多时间练习驾驶轰炸机。

一次，当第 19 战斗机中队在欧湖岛演习的时候，陈纳德和他的好友赫金伯加合作，拖着靶标给地面上的炮手射击。此时，陈纳德在空中有意把机翼一转，全队飞机立即向下俯冲，袭击沙滩上的高射炮阵地。当机队飞临沙滩上空之际，那些高射炮兵纷纷找地方躲藏，乱成一团。

机队在空中往返地飞着，陈纳德趁机驾驶他的轰炸机，特意追逐炮兵上校指挥官。飞机离地面很近，连那老头上校的光头都看得清清楚楚。

看见炮兵上校在沙滩上滑稽而又狼狈的情形，陈纳德笑个不止。

当他回到福特岛的时候，机场上出现了骚动。高级司令部对于这种突如其来侮辱表示愤慨。陈纳德若无其事地问：

“你晓得是哪个干的吗？”

基地司令回答说：

“不晓得，不过，据炮兵上校说是那个可恶的、长着又大又黑的胡子的法国人干的！”

由于这件事，陈纳德禁飞了一个星期。

不过，这是值得的。

陈纳德后来回忆说：

“多年之后在汉口，我们就用同一办法对付日本鬼子的炮手，派出装有炮位的米琪尔轰炸机和战斗机，向日本的炮位、探照灯和栈房区大肆轰炸扫射。”

赫金伯加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他在和平时期就荣获过两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在 14 航空队时代曾任陈纳德的参谋长，其后又以少将身份担任了第 10 航空队的司令。

1925 年。

海军方面让机队进行一种编队作战的训练，模拟航载机进攻珍珠港，由空军负责保卫。

他们要求在激烈的空战时结集飞机，以便集中火力，与敌人作殊死战斗。

陈纳德对这种演习方式很是反感，他认为不应集中，而应当把力量分散。此时只要稍为玩一些花样，打几个旋转，或者飞在敌机之上，就足以使敌机飞行员不寒而栗，因为两机相撞的危险性实在太大了。

于是，陈纳德召来了机队中两个年纪最大而最保守的飞行员，把他的理论及作战方式详细地解说给他们听。这两个飞行员终于同意试验一下。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他们发现这种战术可由三架飞机编队来执行，便完全赞同陈纳德的见解。

接着他们偷偷地练习着，终于有一天在路加机场作出了出人意外的表演。此后，凡是飞行员都希望参加这种练习，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

一天下午，当陈纳德机队在欧湖岛处巡逻时，突然，他们发现海军轰炸机在他们巡逻的上空飞行，似乎要去轰炸珍珠港，一如十六年后日本之偷袭相仿。

这些海军轰炸机也发现了他们，以为他们飞得过低，不可能发动攻

击。不料，陈纳德机队竟以整个编队一齐上升，运用他们练就的新战术，紧紧衔着海军轰炸机的机尾，大开油门，从容追击，将轰炸机冲得七零八落，不成队形，而他们自己的队形却毫不紊乱。

这次编队攻击演习使海军大为吃惊。

“假如那一次不是演习而是真的行动，那么海军轰炸机真要被我们全部消灭，还不明白是谁在攻击他们呢！”陈纳德后来回忆这次演习时说道。

在夏威夷，当时还没有设置警报系统。

是陈纳德首次创立了一个简单的警报机构。

他让两名士兵在机场的水塔上看守，终日以望远镜向四周瞭望。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用播音机发出警报，使机队人员有充分的时间来作好准备，以便驾机迎击。

一个星期六的早晨。

水塔警报系统传来消息：一架海军侦察机向海上飞来！陈纳德立即起飞实行攻击。他衔尾穷追着，两架飞机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陈纳德的螺旋桨即将撞到海军侦察机的机尾时，那个驾驶员简直慌了手脚，只见海军侦察机直往下冲，不一会就失去了控制，最后坠入海中。

海军司令非常愤怒。

因为那个海军飞行员携带的文件，被陆军救护人员看见了，其中有一份是海军定于星期日发表的文告，宣布在演习期间航舰上的飞机对抗陆上防御飞机获得全胜。海军飞行员不仅受了重伤，而且受到了上级的处分。当演习结束之后，海军方面派人来查究时，陈纳德根据他所采用的飞行战术，拟写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颇得上级好评，竟然还引起了华盛顿当局的注意。

陈纳德晋升为上尉。

1925年这一年，在东半球的中国，故都北平的协和医院。6月23日，诞生了一个女婴。

她的家世、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居然与陈纳德有许多相似之处。日后她走进了他的生活，陪伴着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女婴取名陈香梅。

先人原籍福建，至曾祖父时迁入粤之南海。祖父陈晓云，曾是秀才，后弃学经商，得有所获。家居广州，因营业关系，常往来于港粤之间。

祖父少年得志，30岁出头在五羊城里已经红得发紫，不幸后来投资证券，起落之间，竟于数日之内宣告破产。遂坠楼自杀。

祖父去世那年，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才13岁。祖母含辛茹苦，设法让子女接受教育。陈应荣自英美学成归来之后，做过北平英文日报的主笔，在北大当过教务长，并在辅仁大学教英文，后来又转入外交部。

外祖父廖凤书，少年时与祖父陈晓云相识为至交。早年便将长女廖香词许与陈应荣，当外祖父担任中国驻古巴公使时，他们在古巴京城完婚。

陈香梅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

廖仲恺即是外祖父的胞弟，因而陈香梅叫廖承志为舅舅。后来母亲病逝于香港，父亲在美国续弦。陈香梅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4 “毛瑞斯祖母”

1926年，陈纳德完成了在夏威夷的演习任务后，奉调返回得克萨斯州，在勃鲁克斯机场，担任飞行教官，随后又担任了初级训练班主任。

他通过夏威夷的飞行演习，逐步建立起他自己的理论。然而，陈纳德无法说服他的上司们，却只赢得一个“急进的陈纳德”的绰号。

空军部队的首脑人物一致认为，战斗机与驱逐机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而且参谋本部也将驱逐航空术置于次要的地位，他们对火力猛烈的轰炸推崇备至，赞不绝口。

为了使别人弄懂他的理论，陈纳德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他的见解。

他认为，如果辅以先进的侦察术，战斗机仍然可以中途拦截轰炸机，不管轰炸机的装备如何完善，战斗机完全能将其击毁。

他一而再地说教：

“侦察——中途拦截——击毁。”

他的理论依然不为人所注意。

后来，连杂志社的编辑们也都开始怀疑了。他们在陈纳德的文章之前，不得不加上一段按语：

“作者的见解并非代表杂志社，或者代表空军部队的官方意见。”

陈纳德的理论还包括建立一种警报系统。

有了这种警报系统，防御的飞机便可以及时起飞拦截，从而摧毁来袭的轰炸机。

可是，这个理论在当时并没有为美国空军战略家所接受。只是后来陈纳德亲自利用这一警报系统，制服了中国上空的日本飞机的时候，他的理论才得到了证实。陈纳德早期创立的警报系统，现在仍然为美国地面搜查部队所采用。

尽管陈纳德在空军军事方面，屡遭挫折，但也有令他开心的时刻。

有一年在得克萨斯州的布莱斯基地，举行飞行演习和空军特技表演。

吸引了大批的人群前来参观。

人群中传说：

有一位人称“毛瑞斯祖母”的老太太，坐着50年前的有篷马车来到得克萨斯州。她扬言要在入土之前，坐一次飞机。这位老太太穿着一身旧式长衫，头上扎着一条挡风的大红丝帕，步履蹒跚地来到准备作特技表演的驾驶员们跟前，请求捎上她。

这些驾驶员一个个连连摇头。

最后，有一个驾驶员同意载她飞一程。

此时全场轰动，人群欢呼雀跃。

驾驶员和机师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老太太扶上了那架有双座舱的飞机。

飞机发动了，马达轰鸣。

“毛瑞斯祖母”挥手向呐喊着的人群致别，全场又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

突然，飞机向一边倾斜，驾驶员被摔了出来，手足朝天，仰卧在地上。

人群骚动。

有人在大声喊着，叫老太太赶快跳出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已经直冲向狭长的跑道，忽然以一个疯狂般的角度，直升上去，几乎撞上一根悬挂着的干杆，又掠过一簇树枝。

飞机飞得更高了，它在蓝天盘旋，翻着跟头，接着在半空中俯冲下来。

只见飞机直往下坠，就要擦着地面了。人群中发出一片惊恐的叹息声。

瞬息间飞机又奇迹般地攀缘而起，擦过跑道，直升蓝天，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跟头、旋转，以及离奇古怪的花样动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不仅普通观众，就连训练有素的空军官员，也都带着惊愕的表情，痴痴地翘首观立着。

“可怜的、饱受惊吓的老太太！”人群中不时发出一阵阵同情的唏嘘叹息。

突地，飞机朝着跑道俯冲下来，以一种优美的着陆姿态，紧急降落在地面。

此时，“毛瑞斯祖母”从机舱内跳下，也不见有人搀扶，手足麻利地脱去长衫，取下丝头巾、眼镜。

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竟是一位身着军装的空军飞行员。几乎凝固了的空气之中，不知是谁带头呼喊：“陈纳德！”于是，万众欢腾，潮水般的人群，涌向陈纳德，将他簇拥着……

当时美国的航空事业尚处于襁褓时期。美国空军隶属于陆军部之下，因而陆军一些将领对于倡导飞行的官员都有点不满，认为这是不足道的玩意儿。

1928年。得克萨斯州的勃鲁克斯机场。

担任飞行教官的陈纳德，又在开始他的降落伞技术试验。他把双座机排成一个V字形的队形，让每一架飞机的机舱后座配一名伞兵，而他自己则驾驶一架三引擎的运输机，机内装满了各种配备，飞在V字形机队的中央。

机队飞到目的地上空的时候，伞兵立即跳伞，运输机上的弹药、枪支、食品等供给，则用降落伞直接下投，正好投放到地面伞兵的中央。

陈纳德颇感得意。

可是，当陆军参谋总长森马卢少将来勃鲁克斯机场，检阅这种跳伞演习时，他还没有看完全部演习就扭过头来说：“别再搅乎这些没有意思的把戏吧。”

言毕，他就抽身走开了。

这无疑给了陈纳德当头一棒。

事隔几个星期之后。

来了一队由巴干诺夫将军率领的苏联军事考察团。军部命令陈纳德为他们表演降落伞技术。

于是，陈纳德率领机队重新表演了一番。

在苏联考察团乘坐汽车离开机场后，他们中的一个留下来了。此人自称是苏联驻美贸易公司的代表。

起先，这个代表特地来访问陈纳德，并送给他几箱伏特加酒、鱼子

酱、朱古力糖和雪茄烟等礼品。

随后，话锋就转到了正题。

“你愿不愿意到苏联去训练降落伞部队？”来者问陈纳德。“算了吧，这是不可能的。”陈纳德回答说，“我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这些降落伞部队只是一种附带表演而已。”来者接着说：“我们才不这样想呢。如果你考虑好了，可以写信给我，告诉你的条件吧。”

陈纳德那时在空军已经干了九个年头，月薪 225 美元，还有飞行津贴，以及其他配给品和一套住房。

更主要的是，他早就预感到美苏两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友人，他不愿意把他的技术传授给苏联人。

于是，他在给那个苏联代表的回信中，故意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

签订五年合同，每月薪金 1000 美元；

提供汽车与司机和其他杂费；

此外，有权驾驶任何苏联空军飞机；

要有上校军衔。

不久苏联代表回电表示同意，并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启程。这时，陈纳德反而觉得为难起来，只好以迁家需要花很长时间为由，作为缓兵之计，以便搪塞了事。

谁料他们仍然死盯不放，缠了他数月之久。

最后，直至陈纳德把他们的来信原封不动退回，这件事才算了结。

数月之后，军部竟然下令停止这种演习：

“不准再作降落伞训练，我们要在还没有人受伤之前停止这种无聊举动。”

5 《防御性追击的作用》

1930 年。

陈纳德有幸被保送进入空军战术学校。

这所学校设于弗吉尼亚州的兰黎机场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名空军驾驶员克莱顿·比斯尔，是这所战术学校的老师。他传授的空战概念，仍然是老一套的“黎明巡航”和“混战”的西线式战术。

比斯尔甚至建议，战斗机在抵御轰炸机的进攻时，战斗机可以从上面投下一个连着锁链的球，以此撞坏轰炸机的推进器，达到阻击轰击机的目的。

实际上，比斯尔的战术，根本就不适宜于抵御那些新型的轰炸机，而陈纳德总觉得不对劲，可一时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不久，新式的“马丁 B—10”型轰炸机出现了。其时速达 235 英里，且配有五门小炮，而“波音”厂的 P—26 型战斗机，时速为 225 英里，只配有二门小炮，自然难与轰炸机相抗衡了。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里奥·杜赫将军，极力鼓吹“轰炸至上”的理论。

杜赫主张，将那些远距离飞行和运弹量大的重型轰炸机，分布在各个机场。一旦有敌情出现，各个机场的轰炸机立即以纵队方式，一批批地对准目标飞去。他认为，地面武器无法及时形成对付这些轰炸机的防

御网。如此经过 3~4 天的连续轰炸，被攻击的国家就会不惜代价求和。而且欧洲许多军事专家也断定，轰炸机一旦进入空中，将是无法阻挡的。很快这种理论便成了美国空军推崇备至的“圣经”。那些爱好轰炸机的热心斗士也更加疯狂起来了。许多曾在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活跃过的战斗机好手，却不约而同地改习轰炸机了。

陈纳德一直认为，这种理论只是一派胡言而已。根据他在夏威夷的飞行演习经验，陈纳德深信，轰炸机固然是空军力量中的一个支柱，而一个良好的空军是不能没有战斗机的。在未来的战争中，战斗机肯定会像轰炸机一样，扮演重要的角色。

不过，他认为，要抵抗敌机的攻击，必须配备灵活而有效的自卫武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要驳倒“轰炸至上”理论，就必须从空战理论上加以研究。

于是，陈纳德着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战纪录文献。

他发现一个至少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就存在着的军事原理：在所有的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交战双方的火力差，并不等于火力单位数目的差异，而是火力单位数目差的平方。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由两架战斗机编队的机组攻击一个目标，其结果不只是二对一的优势，而是四对一的优势。他断定，两机小组是最容易运动的并能集中火力攻击轰炸机或敌人的战斗机，同时又最能保护每一个进行攻击的驾驶员。

在这方面，早年德国的空军名将波尔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运用了这一军事原理。他曾主张两架战斗机编组作战，因而可以说他是发明战斗机战术的鼻祖了。

波尔克于 1916 年 10 月因飞机失事丧生。

1917 年的春天，他的弟子里却杜汾，运用他的那套理论，创出了著名的“飞行马戏班”。

他们在空中大显身手，飞机穿梭般地飞来飞去，娴熟的飞行技术无疑使协约国的飞行员感到吃惊。

里却杜汾的“飞行马戏班”可以说是第一个真正使用编组作战的空军部队。

后来，戈林掌握德国空军，却十分轻视里却杜汾的编组作战战术，让“飞行马戏班”采用个别“混战”的战术，结果很快便被对方歼灭了。

另一方面，陈纳德认为，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现代战斗机作战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果没有一系列准确的情报，让战斗机了解到敌方高速飞行的轰炸机所处的位置，而妄图起飞拦截的话，这无疑是大海捞针，谈何容易。

1931 年，当空军举行为期两周演习时，由于情报工作的滞后，而延误了战机。

敌方轰炸机群从来特机场起飞，攻击某目标，而防空人员组成的情报网，只提供了一道这样的命令：

“据报，敌轰炸机群已于上午 9 时飞抵某处上空，速即起飞，并予痛歼。”

驻地战斗机接到命令，赶到目的地时，敌机早已完成任务返归了。战斗机因没有发现敌机，也只好颓然飞返。

于是，官方评判员法兰克少将作出结论说“由于轰炸机的速度增加，

体积不断扩大，战斗机根本无力担任截击任务了，所以，空军拥有战斗机队，无异是空有其表”。然而，奇怪的是，担任第一战斗机大队队长之职的罗伊斯少校，在这次演习中甚至连轰炸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后来竟然擢升为少将，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还担任了要职。不久后，亨利·阿诺德将军（当时仅是个中校，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将军级指挥官），在太平洋沿岸主持了一次空军演习。

他率领好几个轰炸机中队，从圣迭戈起飞攻击马区机场。担任守卫的战斗机队必须起飞迎击。

但是，当时严格的军事条例规定，战斗机队一定要在机场列队，等待司令机升空发令，然后才能编成队形。就是在这一刹那之间，敌方轰炸机队早已发动攻势，完成任务而离去了。

这样造成了一种战斗机无法截击现代化轰炸机的既成事实。

阿诺德将军从这次演习中，也得出了一个结论：战斗机在战时是无济于事的。

空军战术学校采取了阿诺德将军的报告，作为教材加以研究和教学。

一贯勤于思考的陈纳德，终于克制不住了。

他一口气写了一篇内容长达 8 页纸的批驳文章，批评阿诺德的结论和建议。

阿诺德看了后，写信让学校方面查问；

“这个混蛋陈纳德是谁呢？”

陈纳德仍然坚持己见。幸亏，陈纳德在空军战术学校毕业的时候，随校迁入亚拉巴马州的麦克斯韦尔机场，并且担任了讲授战斗机战术的高级教官。

然而，从此他便成了空军高级将领们的眼中钉。两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空军演习，于 1933 年在诺克斯炮台举行了。

整个演习计划，全部是由空军部队的军官们设计的，其中没有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参与。

轰炸机队的驻地是在俄亥俄州的曼敦。

战斗机队的驻地则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轰炸目标定于诺克斯炮台的陆军根据地。

演习时双方的条件是：

1. 轰炸机队不拥有战斗机；
2. 担任守卫的战斗机队则没有轰炸机；
3. 战斗机队可以建立一个情报网。

战斗机队依靠情报网，夜以继日地截击轰炸机，并且频频发动各种攻势。

演习仅仅进行一半，轰炸机队的驾驶员们便高叫“条件不公平”……

这次演习的结果，取得了两大共识：

1. 如果担任守卫的战斗机队能够及时起飞，列成阵容，又如果有充分的时间，起飞前往截击区域，则战斗机队是可以截击轰炸机队的。

2. 深入敌方领土轰炸，是需要战斗机护送的，这样可以减少重大损失，甚或不致使轰炸的任务归于失败。陈纳德后来曾经尖锐地指出：“在这次演习中，我们获得了两个主要教训。但是，实际上还获得了技术方

面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和其他次要的教训。“作为空军部队台柱的轰炸机队驾驶员们，他们只知鞠躬尽瘁于杜赫的轰炸理论，其他一切完全加以漠视。“他们没有理会这次演习的教训，更不重视战斗机在战时的重要性。

“最可怜的是漠视这些教训的空军军官们，在 1942—1943 年间都肩负着统率空军的重大责任，害得许多没有护卫的美国 B—24 和 B—17 型轰炸机队，都在欧洲上空被击落而致丧生。“他们应该向这些空军勇士们负责，可怜后者至死还坚信着这个错误的理论。

“这些军官们竟然因为这个空军的成就而荣获了奖章；事实上，在第一年的作战中，这些空军便差不多全部被打垮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平时这样漫不经心地搞空军，早已有所不满。

美国当局组织了一个联邦飞行委员会。对空军的实力进行定期性调查。

空军战术学校有五位军官，志愿前往华盛顿，出席联邦飞行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作证。

这五位军官是：

奥尔斯，一位主张猛烈轰炸的先锋，后从事德国境内的空战。

第二位是华尔克，他在所罗门岛的拉布尔上空作战殉职。第三位是李乔治，后成为秘鲁国际航空公司的老板。第四位是威尔逊，后担任西南太平洋区空军司令的参谋长。第五位便是陈纳德。

当他们进入华盛顿的会场，准备在联邦飞行委员会执行会议上作证时，似乎感到官方已经设下圈套。

其他四位军官的发言，都注重于战略空军的理论与实践。陈纳德的题目，却带有一定的危险性——《1934 年的演习》。他所提及的 1934 年的演习，是由当时陆军部参谋总部的吉尔本将军所主持的。而吉尔本将军正好也在会议席上就座。当吉尔本将军听完陈纳德的发言后，猛烈地敲击台子，并用手指着陈纳德猛吼。

几个星期之后，军官表册上陈纳德的名字便被删去了。这本表册上的军官名单是准备保送进入堪萨斯州的那所指挥参谋学校的。

这就意味着，陈纳德的陆军生涯将从此告一段落。因为一个军官如果没有获得这所指挥参谋学校的正式核准，那就没有希望提升为指挥官或任何高级官员的。在空军战术学校期间，陈纳德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研究英德两国所发展的警报网制度方面，对本国举行的多次飞行演习，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总结。经过夜复一夜的修改补充，终于提出并完善了他自己的理论。

他的理论包括一种警报制度的建立，以便使处于防御地位的战斗机，可以及时起飞拦截，最终摧毁来袭的轰炸机。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中写道：

为了使人人都懂得他的理论，他润饰他的故事，常常工作到深夜。但，显然的，没有人了解。

他一再地说教，像狄摩西尼斯（古希腊之演说家及政治家）面对着大海讲演。

他依然不为人所注意。直到 1935 年，他那辉煌的，富有预言性的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出版了。

6 三人飞行小组

有一次，空军战术学校的校长寇里少将，看到海军的几架飞机在空中表演技艺，寇里少将熬不住了。

于是，他便和陈纳德商量，准备组织一个空军竞技队，将他们打垮。

在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陈纳德很快便组织了一个“三人飞行小组”。

他的僚机是两名军官驾驶员：一个是红头发、满面雀斑的卢克·威廉森，另一个是身体壮健的比利·麦克唐纳。他们驾驶着高翼的波音 P—12E 式战斗机，在基地上空翻跟头，旋转，反翼飞行……按照书本所载的每一种技艺去做，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精彩的表演令观众目不暇接。当晚，“三人飞行小组”在一间小酒吧里饮酒高歌，尽情欢庆合作成功。

接着，“三人飞行小组”经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凯利机场，到达麦克利夫兰的全国航空竞技场。进行巡回表演，所到之处，观众场场爆满。1935 年，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参加军官考试，由于空军中高级军官自己缺乏飞行能力，而且十分妒才，这两位优秀的飞行员竟然被淘汰了。

同年春天，“三人飞行小组”在迈阿密作临别飞行表演。就在这次表演中，有些参观者看中了他们。

其中一个在当时中国空军的毛邦初。

此人是由莫斯科训练的飞行员，后来领导了中国空军，曾改名为毛彼得。

还有一个是罗伊·霍勃鲁克。

他后来来到中国担任飞行教官。

其后罗伊·霍勃鲁克给陈纳德写信，请陈介绍几位飞行员到中国当教练。

这样，陈纳德首先推荐了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1936 年 7 月 11 日，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以及一些空军地勤人员，搭乘加拿大的太平洋邮轮“俄国皇后”号前往中国。

送走他的两位朋友后，不久陈纳德被调到第 20 战斗机大队。

此时，陈纳德的健康每况愈下。咳嗽不已，胸闷、气喘，而且经常出现低烧。

“骆驼牌”卷烟常不离手，越抽越咳。

上司为了以防不测，在陈纳德执行飞行任务时，不得不配上一位副驾驶。

及至 1936 年秋天，陈纳德被停止飞行，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在堪萨斯州的美国陆海军医院的病床上，陈纳德度过了近半年的时间。

他思绪飞奔。

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曾经亲眼见到密西西比河的急流把一只好端端的小船冲为碎片。

一些童年时代的好友不幸死于乱枪之下。

有些人因感染黄热病而惨死的情景。

还有不少人至今仍在棉田中挣扎着过日子。

气管炎，低血压，听力衰退，一齐向他袭来，令他灰心沮丧。

妻子很少在他身边。

八个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不再需要父亲了。

空军示意要他退休，也不需要他了。

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飞行理论，可是也不为当局所赏识。他已经 44 岁了，却一事无成，命运的安排，是否该回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乡下，度过自己的晚年。

数月来，在中国的朋友，卢克·威廉森、比利·麦克唐纳、罗伊·霍勃鲁克，经常给他来信，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信中述及中日之间日趋白热化的紧张气氛，日本几年来已不停地向中国北方蚕食。

一些美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西方人士，已经在中国被聘为教官，训练中国飞行员。

陈纳德从来信中了解到，中国在成长，她正在挣扎着，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

但是在中国空军训练问题上，美国教官和意大利教官分歧很大，致使中国空军在 1937 年春天时仍未取得实质性成绩。陈纳德推测，中日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章 中国

1 为中国干杯

过医护人员数月时间的精心调理，陈纳德逐渐康复。在他出院的那一天，一封贴着中国邮票的信来了。是罗伊·霍勃鲁克寄来的！

他们曾经在得克萨斯州的勃鲁克斯机场一起呆过，还是亲密的朋友。

霍勃鲁克去中国起先是担任飞行教官，不久后便担任了中国中央信托局的机要顾问。

这封长达 5 页的来信，实际上是一封推荐陈纳德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的信。

第一页的顶端，是罗伊·霍勃鲁克的笔迹：“空白的地方是让你写上你的姓名、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等内容，我填写了几个空白处。这是我写给委员长（蒋介石）的信的副本。”

霍勃鲁克在该填写陈纳德名字的空白处，都已填好了陈纳德的名字。

他在信的开头，详细地介绍了陈纳德的资历：凯利机场的优秀飞行员；

米切尔机场第 46 战斗机队的“备受敬仰”的副官；珍珠港路加机场第 19 战斗机中队的“美国空军最优秀”的中队长；

麦克斯韦尔机场空军战术学校的战斗机战术高级教官；不仅具有实际飞行经验，还出版了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

迈阿密飞行表演“三人飞行小组”中的“空中魔术飞行师”；

……

陈纳德一边读着信，不时地发出笑声。

虽然霍勃鲁克的推荐信中偶有溢美之辞，陈纳德却感到很舒心，因为所言事实基本相符。

这笑声是他在病床上躺了 6 个月后，第一次最开心的笑。陈纳德接着往下读：

“如能将陈纳德少校作出妥善安排，也许可以说服陈纳德少校辞去其在美陆军航空队的任务。

“此前，陈纳德曾同霍勃鲁克讨论过由陈纳德担任顾问的可能性，因此，有关工作的条件事先已商定。“陈纳德要求全面负责和管理先进的追击训练，并能在选购军备、零部件和所有追击机和设备的仪表方面有表达意见的机会。

“他想请曾经在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共事过的两位老友，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做他的助手。

“他要求成立一个飞行情况报告部门，负责收集和传送情报给战斗机和轰炸机司令部。

“他还要求有权印发所有训练手册，供学员、中队指挥官、战术单位和战斗机单位用的教材。

“此外，他还要求有权酌情为中国高级军官开办一所类似陆军航空队的高级学校。

“如果他能得到上述东西，他将考虑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服务两年的合同并可在合同期满后续签。

“他的年薪为 1.2 万美元。来到中国和在公司期满后回到美国的路费均由中国方面提供。

“一旦伤残或死亡，他家可得一年的薪金。如他去世，他的遗骸将运回家乡。

“这次为期 3 个月的考察旅行的费用，由中国政府负担。之后，要是陈纳德同意担任顾问，他得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休。

.....”

这封信说个没完没了。

陈纳德却不嫌长，因为这封信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逐字逐句地读完这封信后，心头不禁一热，暗自说道：“霍勃鲁克这个好小子，真的没有忘记朋友！”

霍勃鲁克还给他传送了另一封信，是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写来的：

陈纳德先生阁下：

.....如果您愿意来华的话，中国政府将根据您提出的条件，尽量满足您的要求.....您可获得 1.2 万元年薪，此外还有津贴、专车、司机、译员，并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每年享受 1 个月的带薪休假。您来华和回国的所有往返路费均由中国政府承担.....但您必须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伍.....

一旦伤残或发生我们所不愿见到的意外（死亡），您的家眷可领取一笔抚恤金（1 年的薪金），遗骸将由中国政府负责运回您的家乡.....

您先作为期 3 个月的考察，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航空委员会提出关于中国空军所需的所有咨询，您的考察费由中国政府负担.....

中国航空委员会

秘书长 宋美龄

早春三月，阳光明媚。

陈纳德呷了一口“威士忌”，之后又去摸烟。

宋美龄信中明确地写着：

“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飞机”！

没有什么能比重返蓝天更为重要的了。他拿起“威士忌”，加满了一杯，将酒杯高高举起，冲着蓝天，高呼道：“为中国干杯！”

两年的时间似乎太长了，他无意考虑签订一份为期两年的合同。

而 3 个月的考察时间，看来不算长，他认为他完全有把握向中国当局提供关于中国空军战斗机师所需的一切咨询。3 个月之后，便是七八月份。那时，再回到路易斯安那州，打野鸽子的季节开始了，在这之后是打野鸭了。陈纳德倒在躺椅里，满意地笑了。

2 “加菲尔德总统号”邮轮

1937 年 5 月 8 日，下午。

陈纳德登上美国多拉尔邮轮公司的“加菲尔德总统号”邮轮。

随着响亮的汽笛声，“加菲尔德总统号”离开旧金山码头，缓缓驶向浪涛滚滚的太平洋。

他不太适应乘船。

当海轮摇晃着驶向大海时，他感到有些头晕，欲吐。他打开银色打火机盖子，点燃了一支“骆驼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接着，他缓步走上甲板，站在栏杆边。

一群海鸥在空中飞翔。几小时前，它们就一直跟随着。天高任鸟飞。

回想起过去的那些年头，当他初次驾驶飞机的时候，当他和妻子新婚燕尔，有了孩子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也许会跟以前不同了。如果能够陆军航空队建功立业，全家人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同时又受人尊敬。可是，一晃20年过去了，不仅没有功成名就，还落下一身病伤。

上个月自空军退伍，匆匆回到路易斯安那州金德，安顿好家眷，马不停蹄，旋即跨上这艘去中国的邮轮。到底为哪桩？陈纳德自己也说不准。

落日西沉。

海上刮起一阵西南狂风，将陈纳德从回忆中吹醒。他在栏杆上掐灭了烟头，良久，才慢慢吞吞地向船舱走去。12号客房。

陈纳德使劲脱去了外套，转身，将它挂在门后的衣钩上。接着，他弯下腰，从床底下拉出一只沉甸甸的皮箱。在褪了色的蓝地毯正中，打开箱子，掏出一瓶美国威士忌酒，小心地将它置于小木桌上。又从金属洗脸池上面的医药箱内，拿出一只玻璃酒杯，将琥珀色的威士忌酒倒满了一酒杯，一饮而尽。

然后，他把箱子推回床底下，坐到台灯前，打开公文包，从中抽出一个绿皮本。

他翻开这本新的绿皮护照。

扉页上印着一行印刷体英文：

“本签署人美国国务卿恳求所有有关人士准许持照人安全和自由通行；如有需要，请给予美国公民克莱尔·李·陈纳德法律援助和保护。”

下面的文字是：

“本护照于1937年3月26日在华盛顿经我授予并由美国国务院盖章。”

正页上的内容是：“持照人特征：身高5英尺9.5英寸，头发黑色，眼睛棕色；辨别特征：前额上有疤；出生地：得克萨斯州康麦斯；出生年月：1890年9月6日；职业：农场主。”

再下面是陈纳德的草书签名。

想到他自己的职业——“农场主”，不禁笑了一下：“得克萨斯对于农场主来说，真是一个鬼地方！”30年前，为了报考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因年龄未到，父亲作主替他虚报年龄，把出生年份改成了1890年。于是，将错就错，护照中的出生年份就这样沿袭下来了。他合上护照，将它放进公文包。

燃上一支“骆驼牌”香烟后，他把背靠在直直的木椅上。不错，他再也不会是单枪匹马了。一年前，他的两位好友卢克·威廉森和比利·麦克唐纳，已经在上海以南的杭州当飞行教练，教中国学员飞行。

这次，麦克唐纳知道陈纳德要来中国，他将专程去日本神户迎接，

并同陈纳德一起到中国去。

这是一次海上长途旅行。

估计要有一个星期到檀香山，途中经由日本神户，再有 10 多天才能到达上海。

第三天快要过去的时候，陈纳德已习惯了船上的生活，他可以毫不蹒跚地在甲板上到处走动。

在邮轮的餐厅里，他很快便结识了几名前往夏威夷海军基地服役的海军军官。

他同他们一起打桥牌。作为一名陆军航空队的军官，他多年来一直爱玩牌。在飞机起飞前往往要等待，而等待的时候却是靠打牌来消磨的。5月13日。

乌云翻滚。大海变得很不平静。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船长举行晚宴，还有舞会。可是天公不作美，正如陈纳德在日记中所写的：

“晚上想跳舞，可船摇摆得厉害。”

以前，他是从不写日记的，但是一想到这次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种种情况，他在旧金山买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以便每天记下一些琐事。

这天，他睡得很晚。

翌日，邮轮抵达夏威夷。

陈纳德上岸，重访早年呆过的路加机场。

1923年，他在这里担任过第19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这次，他又有机会见到了一些老朋友。他们在机场附近的杨氏饭店，开怀畅饮。

清晨6时。大雨如注。

邮轮离开夏威夷，驶向日本神户。

他斜靠在船舱内狭小的铺位上，随手掏出那本翻旧了的《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的书来。这是他多年来心血的结晶。1933年他在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机场当空军战术教官时，便着手写这本书，及至1934年脱稿后，交给他的上级，希望能够对他的理论引起重视。然而，结果却是不了了之。1935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的《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出版了。

这本积他在航空队20年之经验的书，对中国空军是否有指导作用？中国的空军又是个什么样子？

5月27日，星期四。“加菲尔德总统号”在夜色朦胧中驶入日本神户港。由于时间很晚，陈纳德没有上岸。他倚着栏杆，观望着这座灯火辉煌的港口。一小时后，他返回船舱，就去睡了。第二天早上。

陈纳德同在启程时新结识的海军少校拉尔尔夫夫妇，一起驱车去名古屋游览。

名古屋是日本在公元710年建立的第一个首都。他们参观了庙宇中巨大的佛像，和古老的木质结构建筑。东方文化使陈纳德感到神秘而又陌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想象中的日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都戴圆锥形的帽子，种着稻田。

他原以为日本男人都穿日本和服，实际上街上许多人都身穿黑色西服，只是一些老年人和妇女确实还都穿着和服。下午，他们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回到神户。

5 时半，比利·麦克唐纳如约来临。

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先在船上喝了一杯，决定再去游览神户。

比利为了迎接陈纳德，特意先期来到日本。

“我的旅行证件上写的职业是杂技团经理。”比利告诉陈纳德说。

“我的‘职业’也不见得比你好多少——护照上写的是‘农场主’。”陈纳德笑着说。

“如果写上中国空军的教官，恐怕就拿不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签证了。于是，非得弄出一点名堂来不可。”比利进一步解释道。

他们一边说笑着，缓步离开海轮，进了一家光线暗淡的小饭店。他们要了日本啤酒和素鱼烧——一种生鱼片。陈纳德第一次品尝异国菜肴，吃得津津有味。

晚饭后，他们到处溜达，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警察来阻拦，似乎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回到船上，午夜已过。

次日凌晨 2 时。

邮轮在内海中穿行。在浓雾弥漫中，沿着本州和四国海岸，绕过许许多多的小岛。

在驶近广岛湾时，太阳出来了。

从远处望去，岛上的村庄星罗棋布。大部分房屋都是用松木和宣纸建筑的。

邮轮在内海的西端，经过下关，径直向中国东海驶去。翌日，“加菲尔德总统号”朝着世界上最都市化的城市——上海港驶去。

黄浦江的江面上，停泊着英、美、法、日等国的海军舰只。岸边是高楼大厦。天空烟云弥漫。

三个“空中飞人”——陈纳德、比利·麦克唐纳和卢克·威廉森，在异国他乡的上海码头大团圆了！

鲜花，彩色小旗，军乐声……

在人群的簇拥下，他们来到了大都会旅馆。

陈纳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那里为一个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3 端纳

第二天，尚有余醉的陈纳德，又被拉去市内观光。接着，又去了虹桥机场，拜访那里的一位中国将军。然后到新雅饭店吃饭。

这顿饭一直吃到第二天星期三，大概是陈纳德一生中吃的最长时间的一餐饭。

当晚，陈纳德就宿于派克饭店。

突然，电话铃响了。

是罗伊·霍勃鲁克从南京打来的。罗伊在电话中告诉陈纳德，蒋夫人星期四要接见他。

星期四的午后。

罗伊驾车来饭店接陈纳德，然后他们驶进一幢位于旧城区法租界内

的高墙房子。警卫将他们引进一间光线不亮的内室等候。

正当他们在闲谈时，一个穿着印花布衣的年轻女人，轻飘飘地走了进来。

陈纳德以为是罗伊的朋友，没有在意，依旧坐在那里。只听得罗伊说了一声：

“蒋夫人，请允许我介绍陈纳德上校。”

陈纳德才为之一震，并为自己一时失礼感到很不好意思，连忙站了起来。

宋美龄作了一个“请随便坐”的手势。

主客寒暄一番之后，宋美龄立即把话转入正题。“陈纳德先生，我最近负责领导中国空军，因此，我非常需要先生咨询，希望你能给予合作。”她说。

“非常愿意为夫人效劳，我会尽力满足夫人您的要求。”陈纳德点头回答道。

陈纳德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将自己关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的想法，向她和盘托出。

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宋美龄要他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写下他的想法。并且建议他视察一下中国空军的设施、现状和作战能力。次日。

罗伊对陈纳德说：

“您如果想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须取得端纳的支持。”

陈纳德起初只听说端纳是澳大利亚的一名记者，蒋总统的私人顾问。除此之外，别无所知。

罗伊接着告诉陈纳德说：

“事情远非您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端纳可是一个‘中国通’啊！”

端纳 1875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里斯峪。中学毕业后做排字工人，后到报馆做记者。

经友人介绍，端纳于 1902 年到香港，在《中国邮报》任职。

3 年后，他兼任《纽约捷报》驻香港通讯员和《远东杂志》主笔。1906 年任《德臣西报》的总编辑兼社长。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端纳为了采访新闻，只身来到上海。不久，他便结识了宋耀如。由于宋对西方文化谙熟，他俩一拍即合，几次促膝晤谈之后，端纳就成了宋家的常客。1912 年元月 1 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曾负责起草对外宣言。

1928 年秋，端纳到东北，应聘成为张学良的幕僚。1933 年 4 月 16 日，端纳陪同张学良去欧洲游历。由于有端纳的教习和陪同，张学良此次海外游历自然很是成功。出洋归来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杭州设宴欢迎张学良。席间，端纳主动向蒋介石陈述时政，宋美龄在一旁担任翻译。端纳大有毛遂自荐之意，谈话持续了 4 个小时。结束时，宋美龄对端纳说：

“你何不来替我们做事？”

1934 年。一次，端纳和张学良随同蒋介石到西安视察。端纳一边旅行，一边施展其才能，深得蒋宋二人的欢心与好感。回到南京后，端纳便成了蒋介石的顾问，与宋美龄更是形影不离，后来还住进了蒋介石的官邸。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

端纳考虑到他同张和蒋的特殊关系，决定出面斡旋。13日中午，端纳秘密飞离南京，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在洛阳。翌日，他又飞了一个半小时，抵达西安。

端纳在听取了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目的和经过的叙述之后，他对张学良的主张深表同情和支持，并且愿意说服蒋。当日晚上，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端纳把宋美龄的信交给了蒋，接着说：

“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西安的。我来后已和张汉卿将军谈了话，可以告慰蒋先生的是，张、杨两将军对蒋先生并无加害之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样的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拥护蒋先生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主张，而且英、美方面也表示赞同。”

端纳接着用手比划着说：

“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成这样大大的伟人；要是不接受，今后将变成这样小小的矮人。中国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的一念。”

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食言而肥，把张学良软禁了。这使端纳感到自己被愚弄，被出卖了。

端纳凄然地对宋美龄说道：

“夫人，我要走了。汉卿是我的学生和好友，我在西安保证他不会受到惩罚，现在我食言了，我无法与一个不讲信义的人合作，请你替我向委员长辞掉顾问这个差事吧！请你转告他，他这样做不仅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公愤，使他的威信受到极大的损害，而且伤害了西方朋友的感情，他的政治前途将是暗淡无光的……”

此后，端纳经再三挽留，虽未离开中国，却是顾而不问，很少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1940年，端纳辞去顾问职务，赴南洋群岛游历。翌年，端纳在菲律宾为日军所俘。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美军从集中营救出。后又辗转至上海，1946年11月病逝。著有《中国的端纳》一书。

百老汇大厦，端纳的寓所里。

陈纳德紧紧地握着端纳的手，说：“端纳先生，我特地来拜访您，您不介意我的冒昧打搅吧！”

“哪里哪里，我请都怕请不来呢，你说对吗，罗伊先生？”端纳对站在一旁的罗伊·霍勃鲁克说。

陈纳德一开始就被这位气色很好、黄头发的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完全给迷住了。

“我正是来请教端纳先生的。”陈纳德态度诚恳地回答说。端纳从孙中山创建民国开始，谈到蒋介石如何上台及其出身，详细地介绍了宋耀如一家：

宋耀如原籍广东，英文名为宋查理，他在美国接受教育，原是南方浸礼教会的传教士，后在上海发行《圣经》和做推销商，这两种事业都做得很成功。

宋的儿子宋子文的发迹史。

宋耀如的三个女儿：霭龄、庆龄和美龄。宋美龄和她两个姐妹都在

美国接受教育。宋美龄 9 岁时就在佐治亚州生活，同她的南方同学一起长大，后又在麻省的韦尔斯莱学院就读。“难怪宋美龄的英语如此流利，而且带有极浓的美国南方腔。”陈纳德一边听端纳的叙述，一边心里想道。端纳还谈到了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财富，说他是从在山西开设许多当铺时积累起来的。

他谈到宋庆龄嫁给当时已患病在身的孙中山，宋霭龄嫁给极其富裕的“孔爸爸”，以及最小的妹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的内幕情况。

端纳还介绍了各军阀以及其中一些可能忠于中央政府的军阀。

他还扼要介绍了少帅张学良绑架蒋介石，蒋介石被释和少帅的政治流放。

最后，端纳总结说：

“蒋介石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物，必要时，他会狠毒异常，甚至不择手段。

“至于蒋夫人，尽管她是妇道人家，却像钢铁一样坚强。她同蒋介石一样，在政治上，权欲极强。

“而你只要跟他俩人打交道，其他人都是听命于他们的。”这番忠告，对于陈纳德来说，简直如同金玉良言。后来，陈纳德在中国期间一直遵循着端纳的这些忠告。端纳可算是一位奇怪的外国人，他流连中国，可是不爱吃中国饭，也不想学中文。他在以后的岁月里一再帮助陈纳德。陈纳德曾经说过：

“要不是端纳的帮助和鼓励，我很可能随时会离开中国乘船回国。”

4 中国空军还没准备好作战

6月8日，星期二。

陈纳德一行飞往南京空军基地视察。

他发现，中国士官生飞的是一些意大利 BR—3 式飞机，波音 P—26 式飞机和寇蒂斯鹰式飞机。中国空军不论在设备上，还是在训练技术上，都是极不正规的。

主要的问题，还是意大利人的训练方法。

他们只教一些初步的飞行课程，结果驾驶员除了起飞和降落之外，其他的项目几乎不能做。

陈纳德又前往洛阳航校考察，发现这里的情况更糟。

他在日记里写道：

“意大利顾问团并不向中国政府领取费用，而是以庚子赔款中意大利的一份来支付的。中国向意大利大量订购军用飞机，以数百万美元计的价款，刚好利于意大利扩充发展航空工业，以便准备战争。

“意大利尽管在中国航空界掀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他们在加强中国空军实力方面，实际上是一无所成的。

“他们在洛阳创办的航校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空军学生只要学完正式驾驶员的训练课程，不问其能力如何，都能毕业。

“这种教练方法，与美国人的教练方针，恰好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因为美国人的方法是在初级训练中便淘汰不合格者，不予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以毕业证书。

“中国的空军学生，乃系由中国上层阶级的家庭选拔出来的；当他们被美国人创办的航校淘汰时，便引起他们的家长对蒋介石的抗议，使他困扰万分。而意大利人的方法，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却毁了中国空军。

“意大利在南昌创建飞机装配厂也是一个奸计。其装配出来的许多菲亚特式战斗机，已经证明在作战中是一种害人的陷阱。至于那些萨伏亚马奇蒂式轰炸机，则完全是一堆废物，至多也只能当作运输机使用。

“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离奇古怪的办事方法，也是意大利人订下来的。从来没有一架飞机因任何原因而在正式簿册上加以注销过。有些飞机已全毁，已经折毁或者完全是废物，可是仍然写在可用飞机的登记簿册上。因而，从登记表上看，中国空军的实力大得惊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

陈纳德在洛阳听到日本正式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他当即决定留在中国。并且从洛阳致电蒋介石：

“一、我从未逃避过战争；

二、经过这几年来在课堂中空战理论的争辩，我希望给它们一个在实战中的试验机会；

三、我认为现在中国对日之战，是一个美国也将卷及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所以，我觉得在战争的早期中我对日本认识愈多，能给予更多的损害，则最终对于我自己的祖国的贡献也愈大。”

两天后，蒋介石拍来了电报：

“感谢您的自愿投效，我已接受了，请即速赴南昌，主持该地战斗机队的最后作战训练。”

经过南昌基地的作战训练，陈纳德发现，这些由意大利人训练出来的飞行员，真是个个洋相百出。

有在空中掉下来的，有在着陆时发生坠毁的。有一天，竟有5架飞机在着陆时摔坏了。

陈纳德说，在南昌的作战训练，是他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一个噩梦。意大利人不仅葬送了年轻的生命，也葬送了本来可以同日本人相抗衡的中国空军。

他在日记里写道：

“中国空军还没准备好作战。”

几天后，陈纳德同中国空军司令毛邦初一起，被召到庐山牯岭避暑胜地去开会。

蒋介石开门见山，问毛邦初：“空军有多少飞机？有多少飞行员？能不能打仗？”毛邦初浑身是汗，毕恭毕敬地站着。

宋美龄站在陈纳德的旁边，迅速地翻译着蒋介石与毛邦初的对话。

“委座，91架。”毛邦初战战兢兢地回答说。“航空委员会的记录不是说有500架吗？还有400架呢？”蒋介石开始来回踱步，边走边咒骂着。

宋美龄停止了翻译。最后，她用英文向陈纳德耳语说：“委员长威胁说要处决毛将军。”

蒋介石停止踱步，并转向陈纳德，问：

“你的调查结果如何？”宋美龄用英文翻译。“毛将军的数字是对

的。”陈纳德轻声地说。蒋介石朝他瞪大着双眼。

“继续说下去，告诉他你了解的情况。”宋美龄敦促着。陈纳德开始告诉蒋介石在最近视察中所看到的情况。他谈到意大利人所造成的损失，和中国空军的糟糕局面。他说，应该按美国方式来训练驾驶员，以及需用何种型号的飞机来对付日本人。

他谈到要搞一个地面警报网，并且还要建立新的简易机场。

等他说完后，蒋介石站起来望着他，慢条斯理地点了一下头，进入了小屋。

宋美龄也点了一下头，笑着对陈纳德说：

“谢谢你，你说得很对。”

毛将军没有被处决。

陈纳德因此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尊重，并从此建立了同蒋介石和宋美龄之间的良好关系。在以后的交往中，他从未丧失过这种尊重。

7月26日。

陈纳德将早已想好的合同写成文字，寄到中国航空委员会：

事由：航空委员会与陈纳德上校签署的合同条款

主送：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1. 从南京回到这里时，我会见了霍勃鲁克先生，谈及我与航空委员会合同条款事项。他告诉我，在我离美前，他已于1937年5月27日致你们的信中提出了已取得一致的合同条款。他把信的副本给了我。我已接受这些条款。蒋介石夫人和孔博士也接受。

2. 霍勃鲁克先生信中第6段包括了合同中未明确提及的惟一内容，即“与美国航空顾问协会签订的合同中所包括的其他使双方满意的合同内容”。虽然我不了解上述引语中谈及的内容，我希望将下列附加条款明确无误地写入合同：

每月薪金1000美元，不交税也不作其他扣除。月薪在每月的第一天发，直到该月最后一天不再发薪。薪金存于上海大通银行陈纳德名下。发薪金之日应从美国出发那日起算，至离开中国之日终止。我是1937年5月8日从旧金山搭乘“加菲尔德总统号”启程的。我已收到第一个月的薪金1000美元和旅费600美元。

中国政府将提供一架由陈纳德少校指定的飞机作因公出差、示范飞行、教学以及为维持熟练飞行之用。这架飞机由中国政府提供服务与维修，费用不由甲方负担。甲方在为了上述目的受聘期间对飞机的损坏和损失一概不予负责。

如有正式命令或指示要甲方由居住的工作地点出发，甲方应有权享受批给外国航空顾问的旅差补贴。此规定适用于从抵达中国之日起到离开中国之日止。从美国到中国到和从中国到美国的旅差费已在本合同第一款中取得一致。

此合同可由任何一方在书面通知对方后90天加以取消，不论何方取消合同，甲方应取得到通知期最后一天的全部薪金，并得到按本合同第一条规定的旅差费（即从中国回美国的旅差费）。

注：有关我薪金免交所得税或免作扣除的规定已写在合同内，因我已接受所发给我的薪金——每月1000美元作为我能考虑的最低纯收入。这一协定是在所得税法通过前达成的。交税会使已商定的薪金锐减。如无法不交税，应在我薪金中补足上交的税额。

3. 在考虑此事后，我已得出如下结论：合同应予立即签订，以免任

何一方产生误会。如任何一方想在我在中国视察军用飞机的商定期期满后取消合同，则可行使取消权来加以实现。请求你立即拟定合同，交航空委员会批准并由我签署。

4. 我的地址（如有变化，将另行通知），杭州中央航校。

谢谢航空委员会成员在我最近访问期间所给我的礼遇。

最诚恳的

克·李·陈纳德空军上校

5 “血腥的星期六”

1937年8月13日。星期五。

日本陆海军对上海的中国守军不宣而战。

大量的日本炮弹往这个大城市里倾泄，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倒在血泊之中。

到处是烧焦的泥土，焚烬的房屋，残缺的尸首……满目疮痍。

中国守军仍在坚守阵地，不断进行反击。

“请求空军支援。”一封封加急电报发往南京。南京。空军司令部。

“地面部队要求空军支援，该怎么办呢？陈纳德先生。”宋美龄问。

陈纳德没有立即回答。他正在思索着：

“去轰炸，去扫射中国守军的前沿阵地？不行，那简直是大材小用……那么，对中国守军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呢？对，是日本的军舰！空军的作战目标，应该是日本的军舰！”“夫人，我想我们应当来个瓮中捉鳖。”陈纳德脱口而出。陈纳德接着陈述道：

“一旦上海开战，便立即封锁长江，将停泊在长江中的日本军舰和船只全部击沉。”

宋美龄点头称是。

一个周密的空军作战计划形成了。

不料，行政院的机要秘书是个汉奸，将这一计划偷偷告诉了日军。日军50多艘舰船立即向长江下游出逃，很快便逃出了江阴要塞封锁线的控制范围。

于是，不得不重新制订作战计划。

对于在美国陆军航空队里有过20年战术训练的陈纳德来说，此时的确是如鱼得水。

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很快就设计好了。

他决定用寇蒂斯鹰式飞机去对付日本轻型巡洋舰上的俯冲轰炸机，把诺思洛普轻型轰炸机用以对付设在“出云号”重型巡洋舰上的日本海军司令部。

这些日本舰只全都停泊在黄浦江上。

站在上海市区和临江地区形势图前面的陈纳德，大口大口地往外喷出“骆驼牌”香烟的烟雾……

此刻，他想到了那些训练较差的中国年轻空军人员。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战斗，其中大多数是由意大利人训练的。这些空军人员求战心切，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作为一个受过训练、久经考验的战士去打

仗是一回事，把年轻人派去送死又是一回事。

陈纳德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

然而，战争是残酷的。这样做是不得已的。

8月14日。星期六。

中国空军几乎是全线出击。

这天，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8批76架次。集中轰炸了上海日军各重要军事目标，使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陈纳德亲自派去轰炸日本舰艇的驾驶员，由于缺乏经验，造成了大灾难。

这些驾驶诺思洛普轻型轰炸机的驾驶员，只经受过7500英尺高空的飞行训练，以及用固定速度进行轰炸的战术训练，因而不了解高度和速度的变化会大大改变炸弹的命中点。

由于当日阴云密布，驾驶员决定低空投弹。他们在滑行时便开始投弹，结果大大偏离了目标。

炸弹没有击中海关码头，却打中了国泰旅馆和汇中饭店，损失惨重。

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舰只，除了“出云号”以外，还有其他日本轻型舰艇，英国的巡洋舰“坝伯兰号”，以及美国的巡洋舰“奥古斯特号”等外国舰只。

少数几颗炸弹震碎了“奥古斯特号”上的玻璃，而“出云号”却丝毫无损。

这天夜里，陈纳德在日记中写道：

“空袭甚差。丁（纪徐）领导的第5组几乎炸沉了英国的‘坝伯兰号’。该舰本来并无必要呆在长江口。第2组朝外国租界又扔了两颗炸弹。虹口着了火。第4组在杭州附近打下了几架日本轰炸机。日本人袭击时丧失了12架飞机。”

后来，8月14日这一天，也被人称为“血腥的星期六”。

8月14日，是一个胜利的日子，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当晚，南京政府忽然下令停止进攻。原来，上海的外国使团建议上海作为不设防城市，结果失去了进攻的有利机会，使日军得以大举增援。

8月17日，中国守军又奉命全线总攻击。8月18日，中国守军又接令暂停进攻。

如此攻守举棋不定，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将日军逐出上海的，最后反而导致了上海的沦陷。

日本人在空袭上海后的第二天，便开始了对南京的首次空袭。

日本的机队从云层中钻了出来，滑到云层下，向机场扔下大量的炸弹。

南京城到处响彻着空袭警报声，成千上万的人在大声惊呼：“飞机来了！”

陈纳德蹲在南京首都饭店附近的交通壕内。

直到空袭停止后，陈纳德爬出交通壕，抖了抖身上的尘土，把手伸进衬衫口袋，掏出一支“骆驼牌”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感慨万分地说：

“这就是战争！”

中国空军利用有限的空中力量开始反击。

陈纳德将他多年积累起来的作战战术，传授给中国最优秀的战斗机驾驶员。结果，日本人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对南京进行连续 3 天的空袭中，一下子损失了 54 架轰炸机。接着在日本人第三天夜里企图空袭南京时，中国驾驶员又击毁了 7 架日本轰炸机。从此日本人再也不敢夜袭南京了。不久，日本间谍机关终于发现他们在南京空袭中失利的原因。原来有美国人在暗中相助，指挥着中国空军。日本领事馆照会美国政府，要求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立即撤离。

美国国务卿考·赫尔发布命令说：对于参加外国军队当驾驶员的美国人，将处以 2000 美元的罚款，和长达 3 年的监禁，还要除去美国国籍。

陈纳德和他的助手们均被列入归国之列。但他拒不执行，他还让人转告领事馆：

“只要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在某一天全部被驱出，那时我就会乐意地离开中国。”

陈纳德只好东躲西藏，以免被捕。尤其是在端纳的帮助下，仍然为中国空军出谋划策。

陈纳德在日记里写道：

“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被认为在匿名作战！难道我不敢用我的真名来表示愤恨这场侵略战争吗？对于我为什么 20 年来如一日地献身于（美国）空军，我实无心再作申明。现在，我更毫不犹豫地要负起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对一个和平民族的侵略的反抗责任。”

夏去秋来。

不觉 3 个月过去，陈纳德发现他同中国空军签订的合同早已过期。

他想起了他在美国的家，他的妻子内尔和 8 个孩子。他坐在南京首都饭店房间内的写字台旁，铺开信纸，准备写家信。

正在这时，走进来一个人。

6 首次远征日本

来人名叫罗亚尔·伦纳德。

罗亚尔是一位洒脱的黑头发飞行员，1923 年初曾经在凯利机场当过陈纳德的学生。后来，他离开陆军航空队，转入商业航空界。和陈纳德一样，罗亚尔也是应邀来中国的。到中国后，他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飞机驾驶员。除了送蒋外出活动以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一直在南京待命。因此，罗亚尔几乎每晚都要到陈纳德的房间来。

罗亚尔这晚刚从香港返回，随手递给陈纳德一份《南华早报》。

这是一份 1937 年 10 月 8 日的报纸。醒目的标题是：《美国谴责日本侵华；放弃中立政策，支持国联；日内瓦举行九国会议》

罗亚尔指着报纸说：

“你看，美国人终于回心转意了，实事求是地对付日本人了。”

陈纳德一边看报纸，一边慢慢地咕哝说：

“是时候了。看来他们终于明白这里发生什么事了。”罗亚尔走到放酒的壁柜前，把威士忌倒入两只玻璃杯中，说：

“我们应该为此干一杯！”

陈纳德喝了一口，问罗亚尔：

“你打算对这里的事怎么办？你想不想呆下去？”这位黑头发的飞行员望着陈纳德说：

“嗨，你想回家吗？”

陈纳德坐回到椅子上，喝了一小口酒后，说：“我有妻子和8个孩子，说真的我有点想回到路易斯安那州去，在秋天打一下猎。可是，这里又有那么多事要做。我花了那么多劲，搞了那么多训练，事后又要走，而让这里的人泄气，那我觉得有点像是在逃走了。我的合同早已到期，我没去管它。你的合同办了没有？”

罗亚尔点了一下头，笑着说：

“日本人在上海扔炸弹的第二天，蒋夫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们那里。我到了后，她问我一件事：‘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经历这场战争吗？’我说愿意。我们握了手，这就算说定了。我们再也没有谈过延长合同的事，我反正每月照拿薪金。”陈纳德燃着了“骆驼牌”香烟，慢慢地吸着，又吐出一圈一圈的烟雾。他说：

“我想，我也要这样做。我现在每月也是照领薪金。”罗亚尔说：

“你会的，这是这里办事的规矩。”

他俩沉默了片刻。

接着陈纳德转向罗亚尔说：

“谢谢，我想我会呆一阵子的。”

他随手拿起正在写的那封信，将它撕掉。

12月12日，南京沦陷。

1938年初。

南京政府虽然已经迁都重庆，但航空委员会仍然设在武汉。

陈纳德奉命来到汉口机场。

汉口机场一片泥泞。

机场只有几段鹅卵石铺的跑道和滑行道。主跑道约长1万英尺，但并不怎么宽阔。

残雪和积水，经常深过膝部。飞机不得不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免陷入泥潭。日本轰炸机一有机会就轰炸汉口，使中国空军不断遭到惨重的损失。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扩大，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为了给日本侵略者以有效的打击，1938年3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

5月19日。深夜。

中国空军两架“马丁”远程轰炸机，从宁波前进机场起飞，直冲夜空。

翌日凌晨。

满载“纸弹”宣传品的飞机，进入日本长崎市上空。随后飞遍九州全岛，沿途撒下20万张传单。

当时制定这一计划，主要是考虑到能够远征日本本土的飞机很少，空军的兵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考虑到用“纸弹”攻心，散发传单，劝导日本停止侵略，比用炸弹炸死一些无辜的平民百姓效果更好。

这些传单是：

中国农民协会告日本农民大众书。

中国总商会告日本工商业者书。
中国总工会告日本劳动者书。
中国外交协会告日本政党人士书。
中国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告日本人民书。
传单的内容分别如下：

我们中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作着怎样的罪恶……

日本兄弟，在诸位之中，有开始反对战争，理想着正义和平的人，也有为军阀宣传所欺骗而歌颂战争的人；但，不管是哪一种人，想来一定都因贵国的言论被统治，要了解时局的真相是困难的。所以，试作以上说明，希望诸位详加考虑。

日本国民诸君：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这样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了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罢了。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日本工人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代表到空军司令部表示了慰问，并且赠送了锦旗。

中共中央委员会赠送的锦旗上写着：

“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的锦旗上写着：

“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第四章 飞虎队（上）

1 昆明

38年10月25日。

汉口失守。

宋美龄面对失败，仍想保存一部分空军，以便日后能与日本空军作战。

她从香港打电话给陈纳德，让他去湘西的芷江机场，筹建一所航校。

10月下旬，陈纳德和随从人员赶到芷江。

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土机场。

只有3架鹰式飞机，几个中国士官生在接受训练。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没有电，晚上的照明仅靠一盏油灯。吃的是中国的乡下饭菜。好在陈纳德还能够适应这种条件，他并没有挨饿。

最糟糕的是，训练工作开始不久，士官生便将仅有的3架鹰式飞机摔坏了两架。

于是，陈纳德又给正在香港的宋美龄打电话。

宋美龄命令他去昆明。

宋美龄在电话里告诉陈纳德：

“尽力把航校办起来，学校能招募多少年轻的中国士官生，就培养多少。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仗还是要打下去的。”10月27日。

他们离开芷江，前往昆明。

陈纳德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10时30分离开芷江。细雨濛濛。昨日难以弄到汽油，动身晚了些。我发了火，但我想路上肯定会好起来。下午5时去镇远过夜。路途遥远，路又难走。”

第二天的旅途也不轻松。他在日记中说：

“晨6时35分离镇远。下午5时抵贵阳。在贵阳以东65公里处折断了车簧。脾气还没好。在政府招待所宿夜。”第三天的夜间，陈纳德决定改乘飞机，飞抵昆明。位于中国西南高原上的昆明，一年四季气候宜人，也是一处度假胜地。

城内大多数建筑物是一二层的泥石结构楼房。成千上万幢这样的楼房，坐落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两旁都是胡椒树和桉树。

街上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狭窄的人行道上，小贩们在叫卖蔬菜、肉食和各种干货。街旁的商店又狭又黑，全是各种调料、香木和食品。

人力车在行人当中穿行。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叫卖声、锣鼓的啾啾声，交织在一起，喧闹不堪。

然而，陈纳德却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对这里的一切，他感到兴奋，感到耐人寻味。他爱吃昆明饭馆里辣辣的四川菜，如同他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辣味很浓的法国菜一样。

当时，法国人已将昆明以南的印度支那炎热潮湿的森林地带，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他们从海防和河内修建了一条通往昆明的窄轨铁路。

昆明城的西北面，是一片延绵的丘陵地带，与世界上最壮观的喜马拉雅

拉雅山相连。

昆明机场离城大约 8 英里，位于昆明与滇池之间。

滇池湖东边有一个红岩崖，十分醒目，成了机场的一个标志。它曾帮助驾驶员起飞和降落，人人都对它很熟悉，并称之为“老秃子”。

训练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昆明航校的这批新的士官生，同以前那些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士官生不大一样。他们是为了用空军抵御日本人而来学习飞行的，他们经历了从东部城市的撤退，饱受了战争的磨难。

这时，日本人已经开始逐日轰炸重庆了。

陈纳德根据他早年在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建立警报网的经验，着手在中国的东部沦陷区到西部的边远地区，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这一系统是一种最有效的预报来犯敌机的方法。

当一架敌机离开基地时，靠近该基地的中国特工人员立即报告。然后，下一个目击者又将敌机的动向传递下去。全中国如法炮制。当敌机飞抵拦截范围以内时，战斗机驾驶员由于提前得到情报，便可及时出击了。

陈纳德是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军事战略家。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主要充当步兵的侦察工具。直到 1939 年，飞机才刚刚开始战争中发挥作用。日本人懂得，建立强大的海空军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只想哪天把中国炸得厌烦了，于是中国人准备向他们求和。陈纳德很快就洞察到了日本人总的意图。他认为，在一个没有几条铁路和几乎连一条柏油公路也没有的大国打仗，发展空军力量是最好的对策。

生活开始安定下来后，陈纳德进行了一些社交活动：他同美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在昆明一起吃饭；他在法国俱乐部，同一些飞行员共进晚餐；

他不时去重庆，与端纳促膝畅谈。

天气晴朗的时候，他同比利·麦克唐纳和其他教官一起去打猎。

在滇池岸边，他们一小时之内便打了十几只野鸭。司机把猎物摊在车盖上，在午间的阳光照耀下，蓝翅膀的野鸭在发光。陈纳德高兴地笑了。

他转向麦克唐纳说：

“这弥补了不少思乡之愁，只要有这样的飞禽可狩猎，我便能忍受各种不习惯。”

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昆明是我的行动主要基地，也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记得我刚到昆明时，这不过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小城，只有法国人建筑的从安南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便于他们每年夏季，到这凉爽干燥的地方来避暑。

一到夏天，昆明湖里浮满了在水上起居的船户们，在过去的几世纪中，昆明亦有了些转变，那些以蓝头巾包着头的土著民族，常赶着成群的骡子，载着些盐、锡以及鸦片，穿过了狭窄的山道，来做买卖。

在昆明，用石子铺成的街道上，破旧的马车隆隆作响。还常可看见水牛、小车

和成群肥猪，在街头的树阴下经过。榄青色的树丛中，法国乡村式的小屋，这里那里，三三两两，到处可见，火车的叫声与人力车的铃声，是常可听到的交响曲。

在郊外，当潮湿的雨季来临时，田里都长满了绿色的稻秧。冬季，则代之以大豆、麦子和金黄的花朵。

2 他一直牵挂着中国

根据陈纳德与中国航空委员会签订的合同规定，1939年10月，陈纳德获得休假一个月的许可。

路易斯安那州的金德。

金色的秋天。邓萨斯河上空，一群一群的水禽，来回飞翔。沼泽湖边高大的柏树，在黑色的湖水衬托下泛着银白色的光辉。

陈纳德被家乡的优美景色所吸引。可是，从他抵达旧金山起，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里与东方相比，似乎缺了些什么。

所有的人都到哪里去了？行人，骑车的人，还有人力车，都到哪里去了？

在美国，好像见不到步行的人。

他和妻子内尔开车到拐角处的商店，采购所需的物品。内尔显然已经发胖，体重增加了许多。陈纳德不在家的期间，她似乎并不感到寂寞。身边这一大家子人使她老是忙个不停，从教堂事务到学校里的家长会，还有许多社交活动等待着她去参加。

他们最大的儿子杰克，已经26岁了。他是密歇根州塞尔弗里奇空军基地战斗机队的一名少尉。

陈纳德坐飞机去看望了杰克一家子，和他的第一个孙子。孙子取名克莱尔·李，快两岁了。

接着，他和杰克去底特律，见到了他的次子，24岁的麦克斯。

麦克斯是泛美航空公司的站长。他的妻子此时正有身孕6个月。

随后，陈纳德和杰克又乘飞机去纽约州的布发罗市，参观了寇蒂斯赖特飞机厂。这家飞机厂正在生产新式的P-36战斗机。

转眼间，圣诞节到了。

三儿子查尔斯从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回来了。家里人都叫他“扁鼻头”。他也有21岁了。陈纳德见他成了一名大学生，打心底感到高兴。

四儿子佩特森也带着妻子，从他的工作单位阿姆斯特朗橡胶公司回家来了，佩特森刚18岁，虽然陈纳德对儿子过早结婚，没有念大学有点意见，但是他和内尔都对这桩婚事很高兴。五儿子大卫16岁，还在上学，他像陈纳德一样，酷爱打猎。

六儿子罗伯特14岁，1925年出生于夏威夷。他告诉父亲，他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大女儿佩吉·修，已于1937年结婚。这次，她同丈夫和1岁多的儿子，也特地回家，同陈纳德夫妇一起欢度圣诞节。家中最小的路易丝，年仅11岁。她有一双闪闪发亮的蓝眼睛，很爱笑，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全家人都拿她当逗趣的对象。

圣诞节这一天，陈纳德的家中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孩子们都聚在一起。

各地的亲朋好友也来串门。

壁炉内，炉火熊熊。

客厅里，充满着家人和朋友的欢声笑语。

可是，陈纳德此刻却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思绪，他在想那些燃烧的城市，那些中国飞行员所驾驶的老式战斗机从空中掉下来的情景。

当他看到满桌的精美食品时，他想到了中国的农民和他们可怜的口之物。

他一直牵挂着中国。

他开始同周围的人有些话不投机了。

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美国不要卷入战争，更不希望远道去帮助“一帮支那人”打日本人。

陈纳德则坚称，美国应立即参战。他预言，日本人要在太平洋发动战争。

可是，他的观点却一直遭到嘲笑和怀疑。

刚过完年，陈纳德就打算回中国了。

孩子们起先见到父亲回家时的高兴心情，现在开始慢慢地淡化了，他们又投身到各自的朋友、活动、工作和学校中去了。

妻子内尔也为她自己的生活安排好了：去桥牌俱乐部和同学校打交道。

1940年2月初。

陈纳德告别家人和朋友，飞离美国。

2月12日。天气寒冷，阴霾。下午3时，陈纳德乘坐的班机抵达澳门。

当日晚上8时30分。陈纳德经过半小时的飞行后，从澳门到达香港。

宋美龄和端纳在香港启德机场迎接陈纳德。

这使陈纳德感到意外的惊喜。

陈纳德回到昆明，继续训练士官生。

由于昆明雨天很多，每次下雨，用草皮和泥土修建的跑道和滑行道就变成了粘泥。飞机无法在这样的泥沼中起飞、降落。这样，实地飞行训练不得不经常被取消。学生们在田边的小泥屋里上课，陈纳德在黑板上画出机炮和炸弹的弹道，向学员讲授枪炮和轰炸的理论，以及战斗机的作战战术。

天气晴朗时，他会驾驶一架笨拙的双翼机，为学员们作示范表演。

驾驶杆，方向舵，节流阀，这些都成了他的第二本能。飞机在晴空中做翻滚动作，旋冲……一系列的特技动作，使得中国学员和美国教官瞠目结舌。

10月12日，陈纳德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要他去面见蒋介石。

第二天，他正想订中国航空公司班机去重庆，日本人出动了30多架轰炸机，来轰炸昆明的航校机场。

早在4月份，日本人就打算把昆明航校从地面上抹掉，企图阻止中国训练出一支空军队伍。

这次空袭也是日本人企图扑灭中国空军力量的继续。正如陈纳德10月9日从昆明写给内尔的一封信里所说：“现在，日本人派出最好的歼击机来支援轰炸机。他们已两次轰炸过昆明，尚未造成很大破坏。这两

次，轰炸机都在 2 万英尺以上高空，并且逆风投掷炸弹。但是，这座城市迟早会遭殃，因为它们不久就会飞得很低。”

陈纳德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蒋介石的官邸。宋美龄把蒋介石的话翻译给陈纳德听：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美国驾驶员和美国飞机帮助中国打仗？”

陈纳德问：

“需要多少？”

蒋说：

“500 架就可以了。”

一阵沉默。

陈纳德耸了耸肩，说：

“要弄到那么多架飞机是不可能的。”

他接着解释说：“我曾经参观过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飞机厂，发现光满足英国订货就难做到了。不过，惟一的可能是弄到一些稍微落后和过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比起目前所拥有的飞机，那肯定要强得多。”

蒋介石没有回话，不动声色地坐着，听完陈纳德的解释。5 天以后，陈纳德再次接到让他去重庆的命令。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对他说：

“你的工作是尽力弄到更多的美国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驾驶这些飞机的驾驶员。你同毛邦初一起去，而且马上动身。”

随后，蒋把一叠书面订单让陈纳德带去美国，并向驻华盛顿的宋子文报告。

这使陈纳德吃惊不小，但他没有丝毫的流露。

3 东瓜机场

飞机在太平洋诸岛屿之间不停地飞行。

发热，剧烈地咳嗽，犹如刀割心肺，使陈纳德难以忍受。但他感到更加难受的是，他在中国的 3 年半时间，没做多少工作，觉得他是不应该拿薪金的。他手下的上百名学员，要么被日本人打死，要么在训练中失事身亡。中国空军就像不存在似的，徒有虚名。

飞机遇上一股气流，颠簸了几下，稍后又恢复了平稳。陈纳德不禁觉得，此次去美国弄飞机和驾驶员，前途渺茫，因为美国第一优先考虑的是欧洲的战事，况且他认识的美国高层人士不多。

1940 年 11 月 1 日。

华盛顿 V 街，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陈纳德在昆明时就已经结识宋子文，并且成了密友。此次老友重逢，格外高兴。宋子文在得知蒋介石的意图后，很快为陈纳德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并对陈纳德说：

“钱的问题我会考虑。你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尽快列出一张供应品的项目表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措，陈纳德的梦想开始实现，他觉得很兴奋。

1941 年 7 月 8 日，下午 4 时。

陈纳德坐上飞往中国的飞剪式班机。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班机降落在昆明机场的一条简易跑道上。

烟雨濛濛。

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正在抢修昆明机场。按照这种速度，修筑机场的计划看来是难以完成了。

陈纳德从昆明飞往重庆。

宋美龄告诉陈纳德说：

“由于征集志愿队员的时间迟缓，志愿空军又赶上了昆明的雨季，加上昆明机场尚未完工，政府决定同英国驻缅总督协商，让美国志愿空军连同飞机一起进驻缅甸，并劳驾您去缅甸组织志愿空军的训练。”

“夫人，我们在缅甸何处机场训练？”陈纳德问。

宋美龄回答说：

“缅甸的东瓜机场。”

东瓜机场。

它距离仰光约有 170 公里，以铁路计算是 166 英里。它有一条 4000 英尺的沥青面跑道，可供训练之用，至少要比昆明机场的泥土跑道强得多。

机场附近有一个小镇，称为东瓜镇。镇上有一些中国和印度商人开设的铁皮屋顶的小店铺。镇中心仅有一条泥土路，四周为柚木林所包围。

7 月 14 日，美国驻仰光领事馆通知陈纳德，一共有 68 架 P—40 飞机已经抵达，第一批 30 名美国空军人员也随即到达。

天气闷热，潮湿。

陈纳德赶往仰光港码头迎接。原来这批志愿人员是由路德教会教长弗里尔曼率领的。弗里尔曼的中文说得很流利，1937 年在汉口时，他就与陈纳德相识。当时他曾向陈纳德建议，他可以担当美国志愿队的随军牧师。

弗里尔曼后来对他们在码头相会时的情景回忆说：

“那天，陈纳德站在码头上，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粗制滥造的冒险家式的服装：防蚊鞋，军官衬衫上别着中国军衔，破旧的空军帽，以突出他的好斗的相貌。只要看他一会儿，就会得到一个不拘小节和不讲排场的印象，再加上一种敏捷的、颇有把握的、绝对权威的神气。我想，船上的人没有一个以前见过他。我在船栏边望着这一排人，他们默默地瞪大着眼看他。我可以看出，至少在那时，陈纳德完全能够控制住大家。”

摆在陈纳德面前的至少有三件事要做：

尽快使东瓜这个又热又潮、长满臭虫的基地，能够充当战斗训练和作战的地方；

准备充裕的飞机零件，使 P—40 机能不断飞行；训练这些不同性格的志愿人员，使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动作。

一个月后，8 月 15 日，第二批志愿人员抵达仰光。当时，陈纳德正在重庆参加军事会议。他设法在 8 月 21 日回到了东瓜。

不久，他便发现这里的士气十分低落。

地勤人员和驾驶员一直在营房周围转来转去，酒喝得很多，还不断地发牢骚。

5名驾驶员，还有好几名地勤人员，向陈纳德递交了辞职书。他们都是以“情况有误”为由，而要求回美国。陈纳德果断地接受了他们的辞职，让他们打点行李回去。之后，陈纳德召集了一次全体人员会议。

在会上，陈纳德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瞪着那些满腹牢骚的志愿兵。他那张久经风霜的脸上满是怒火。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喝了一口水。接着，他严肃地宣布：

“所有留下来的人，都得按合同办事，如不履行任务，则处以罚款，严重者给予不光荣的开除。

驾驶员立即开始60小时的飞行训练，人人都得出席地面上的听课，共两门课程，每门72小时。次日早晨6时即开始。”

台下一片寂静。

志愿兵们心里都明白，在这里，陈纳德是说了算的。9月初，情况稳定了，训练也开始认真起来了。然而，热带丛林的闷热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严格的训练，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一些人无法适应。在开始几个月的训练中，有23人辞职。他们大多是由于酗酒，完不成任务或不服从命令而被陈纳德解雇。这些人回到美国后，给陈纳德造了不少恶劣的舆论。而且。有关辞职的消息还传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耳朵。

因此，陈纳德不得不在10月21日发出一份电报，向华盛顿作出必要的解释。

美国华盛顿特区

海军部海军作战部部长

先生：

来信附上的表格可惜无法说清那些破坏合同离开志愿队的人的原因。这些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少数。我认为，他们要么过于乐观，要么过于鼠目寸光，未曾料到他们为之志愿服务的条件会是这个样子，尽管事先曾向他们作过详细的介绍，在抵达缅甸后，他们完全丧失士气，一蹶不振。我很高兴让他们离开。我不用指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内丧失士气会大大影响这些人的军事价值。

第二类人都是一些更聪明的合同破坏者，特别是驾驶员。我认为，他们的动机各异，但一般说来是不可置信的。我认为，有几个人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他们将美国志愿队当作一个逃避在国内服军役的手段。但至少有一人按其自述，是为了偿还债务才参加美国志愿队的，因此，一积累了足够的现金后，就回家去摆脱其窘境。还有一些人看到最后可能要实战，就无法去面对考验了。

在那些破坏与我们所签合同的人之中，当然还有一两个确实因家庭有困难或健康不佳才走的。但每一位参加美国志愿队的人都曾被明确告知，他加入的是什么组织；军役是怎么回事，因此，即使退一步来说，在他们觉得这一冒险不完全对他们胃口的时候，很难为这些领取美国志愿队薪金的人找到什么借口。

你的十分诚挚的

克·李·陈纳德

1941年10月21日

缅甸 东瓜

随着时间的推移，雨季慢慢南下，机场逐渐变得干燥。11月底。陈纳德一边看着在深秋天空中俯冲和翻滚的机队，一边感觉到，他们可以

作战了。

他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可以在几周内调往昆明。

4 首战告捷

按照作战需要，陈纳德把志愿队编成 3 个中队。第一中队，大多是由前美国陆军驾驶员组成。中队长，罗伯特·桑德尔，得克萨斯州人，个儿不高，皮肤黑黑的，是一个顽强而勇敢的驾驶员。该中队的每一架飞机，都画着一只大苹果，亚当在围着苹果追夏娃，因而也称为“亚当和夏娃队”。第二中队的队长是杰克·纽柯克，纽约市郊人，27 岁的战斗机驾驶员。该中队叫“熊猫队”，可是飞机上没有画熊猫，每架飞机却画了一个驾驶员的漫画像。

第三中队，由前美国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驾驶员组成，命名为“地狱里的天使”，每架飞机上画着一个裸体的天使，姿态各异。中队长阿维特·奥尔森，是一个 25 岁的加州洛杉矶人，瘦长个儿。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

日本派出由 6 艘航空母舰和数十艘军舰组成的特遣舰队，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由于疏忽戒备，美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次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国正式对日宣战。

12 月 9 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陈纳德在接到日本进攻珍珠港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志愿队进入战备状态。

缅甸东瓜基地营区告示牌上，贴着一道由基地指挥官陈纳德签发的命令：

美国志愿队

缅甸“A”点

1941 年 12 月 8 日

9 时 45 分

1. 日本已向英、美宣战
2. 本司令部将每日 24 小时处于戒备状态，并将抗击敌人的敌对行动。
 - (1) 第三中队是冲锋队。
 - (2) 第二中队是支援队。
 - (3) 第一中队是预备队。
3. (1) 备战的飞机全副武装并装满弹药。
 - (2) 本司令部所有成员均得随身携带武器。

在这道命令的旁边，还贴着另一份报告：

报告主送：所有有关人员

1. 本司令部任何人均不得向指挥官请假而擅自离开本岗位；
2. 一旦响起空袭警报，一切行政和作战人员应收集一切重要文件将之转移到安

全地区。如有普通警报，文职人员应上主要通道，搭乘驶过的交通工具。如有紧急警报，所有人员均应撤出楼宇，进入丛林，平躺卧地，并使用一切可用的掩体。

3. 随时密切注意敌人的空降部队。

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陈纳德焦急地等待着重庆的命令。

12月10日，陈纳德下发了第三道战地命令：

战地命令

第3号

地图：仰光部分

1. 据说敌人已攻占曼谷，其地面部队据传正向滇缅公路挺进。

2. 关于中队的安排不变。

3. (1) 第二中队到指定地区进行侦察性飞行。

起飞时间 11时30分。

(2) 第一中队为侦察飞行提供巡逻保护。

(3) 其他在地面的单位将从12时起待命，直到下岗。

指挥官令

滇缅公路是中国抗战时期取得国外援助的重要途径。陈纳德奉命派遣第三中队飞赴仰光敏加拉洞机场，协助英国人，阻击入侵的日本人，以便全力守卫滇缅公路。

数天后，重庆来电，命令陈纳德的志愿队进驻昆明，时间由他自己决定。

当时在冬瓜基地周围，经常有日本间谍出现。于是，陈纳德为了欺骗日本人，想出了一个小小的计谋。他在基地四周的告示牌上贴出命令：

两个中队在12月17日清晨飞往昆明。

消息很快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空军的歼击机在滇缅公路的上空——志愿队的必经之路，从那天清晨开始，等了整整一天，才发现上了陈纳德的当。

当夜，东京电台竟然还得意地广播说，美国志愿队20架P-40飞机已被歼灭。第二天下午，陈纳德就命令第一、第二中队撤离冬瓜。傍晚，冬瓜基地的设备和其他人员，由中国航空公司的3架运输机悄悄运往昆明。飞机在昆明机场的着陆，是依靠汽车灯光和几百名修筑跑道的民工手持油灯完成的。

在经历了缅甸丛林的暑热和潮湿之后，再生活在晴朗干燥的昆明机场，真使人有隔世之感。

20日清晨。

陈纳德早早起了床。他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骆驼牌”香烟，然后两眼盯着作战图，思索着。

凭着多年的经验，陈纳德深知，日本人一旦了解志愿队到了昆明，他们是肯定会来偷袭的。

这时，他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中国空军第五总队司令兼美国志愿队参谋长，人称“王老虎”的王叔铭打来的。

“日本飞机已在老街地区越过云南边界，正向西北飞行，请你注意，目标很可能就是你的志愿队。”王说。陈纳德小心地放下耳机，情况完全如他所料。他开始发布作战命令。派出第二中队用4架编队去拦截敌机，另一个4架编队在昆明上空作防御性巡逻。第一中队的16架飞机在昆明偏西方向上空待命。

这3批飞机升空后，陈纳德站在作战室墙上的形势图前，仔细倾听着每隔几分钟收到的电话。

“鲨鱼翅蓝色呼叫基地。东西60英里处发现敌机，我们准备进攻。”

“鲨鱼翅红色向基地报告，鬼子在东南方向80英里处，准备进攻。”昆明碧蓝的晴空上，飘浮着厚厚的积云。

机场和城里早已响起空袭警报。

一场激烈的空战过后。

第一中队全部安全返飞。

第二中队除了一架飞机迫降在机场东边的稻田里，驾驶员雷克托受了点轻伤以外，其余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上。驾驶员们兴奋极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陈纳德好不容易把他们弄到汇报室里，听取有关空战的详情。

汇报尚未结束，中国空军侦察电台向陈纳德报告说：进袭昆明的10架日本轰炸机，其中6架被志愿队击落，残骸均在中国境内发现；逃跑的4架中，3架损于途中，只有1架逃回河内机场。

昆明首战告捷。

中午时分。昆明市长亲自率领一个几百人组成的慰问团，来机场慰问。

身穿花衣服的小女孩，将紫色的布条系在驾驶员的脖子上。腼腆的姑娘，把一束束鲜花放在年轻人的手里。小伙子们把土特产作为礼物分赠给每一位志愿队员。

陈纳德觉得嗓子发紧，热泪不禁涌出……

5 仰光空战

缅甸首都仰光城郊的敏加拉洞机场。

昆明首战大捷的次日清晨，驻扎在敏加拉洞机场的志愿队第三中队，发现了第一批日本轰炸机，共有27架。这些敌机似乎也发现了他们，慌忙将炸弹扔在英国皇家空军的前进基地上，立即调头逃回曼谷去了。

稍后，一架日本摄影侦察机在2.5万英尺高空飞临仰光，拍摄港口和机场。

中队长阿维特·奥尔森立即向昆明基地的陈纳德报告。陈纳德在复电中说：

“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的区域地面重要军事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3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

果然不出所料。

12月23日，日本人出动54架轰炸机，在12架97式战斗机和8架零式战斗机的掩护下，袭击仰光。

奥尔森从警报室跑出来，他边跑边喊：

“敌人来了，立即起飞！”

15分钟后，志愿队的15架P-40战斗机，英国皇家空军18架水牛式战斗机，几乎同时升入1.8万英尺的高空，严阵以待。

美国战斗机的机头画着鲨鱼的笑口和利齿，而机身却画着裸体的天使。

日本轰炸机群的驾驶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飞机。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就遭到志愿队的猛烈攻击。敏加拉洞机场的上空，到处是嘈杂的空战声，子弹爆炸时发出的桔黄色火焰，敌机中弹后留下的一股长长的袅袅黑烟。连机场地勤人员也忘记了隐蔽，纷纷跳出掩体，来观看这场精彩的、无与伦比的空战。第二批日本轰炸机，尽管受到重创，却仍然在战斗机护航下，瞄准敏加拉洞机场扔炸弹。一连串炸弹把机场炸得到处是坑坑洼洼。

顿时，敏加拉洞机场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战斗机边飞边向街上扫射，子弹在人行道和建筑物上弹跳。

一艘停泊在港口的美国货轮，也参加了战斗，船上的机枪手向一架日本轰炸机开火，直把它打得一头栽进海港。空战终于结束了。

双方损失重大。

志愿队损失6架飞机，牺牲一名驾驶员，另一名下落不明。

英国皇家空军损失11架水牛式战斗机。

英国人以后报告在仰光附近找到了32架日机残骸，其中7架是英国空军击落的，另外25架则为美国志愿队所击落。奥尔森及时向陈纳德报告了仰光空战的战况。陈纳德立即复电：

发往：东瓜

1941年12月25日

东瓜戈耶特收转仰光奥尔森：请再坚持几天，去A点领取弹药，视需要保存飞机。入夜休息时疏散人机。祝贺你们旗开得胜。对两名优秀驾驶员的损失深表惋惜。请将遗体 and 财物交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或美国领事馆以便安葬。希林一队在归途中迷航，一死一伤。所有飞机均丢失。请报所有参加第一次战斗的驾驶员名单以颁发奖金。如可能，将尽快调动你。祝全体人员圣诞节快乐，也祝你和全队快乐。如电话线被切断，请于今日将此电用飞机转给奥尔森。

陈纳德

仰光空战大捷后，第三中队队长奥尔森派希林等3名驾驶员，将3架寇蒂斯截击机从敏加拉洞机场运往昆明。不料3架飞机在夜间飞行途中迷航。希林的飞机由于引擎熄火，他在迫降时受了伤。另一名驾驶员也在迫降时受了伤。还有一架飞机撞在梯田上，机毁人亡。

仰光的空战愈演愈烈。

12月24日，日本空军再次派出80架飞机袭击仰光，被美国志愿队和英国皇家空军击落19架。

12月25日，圣诞节。

中午 11 时许，日本空军 60 架轰炸机由 30 架战斗机护航，分成三批偷袭仰光。

美国志愿队 12 架 P - 40 战斗机和英国皇家空军 16 架水牛式战斗机迎战。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空中激战，共击落日机 45 架。在空战中，英国皇家空军丢了 9 架飞机，9 名驾驶员没有一人损伤。

陈纳德收到圣诞节仰光战报后，向奥尔森队长发出下列电文：

西瓜的戈耶特收并烦转奥尔森：“谨对圣诞节凯旋后两名失踪的驾驶员归队表示祝贺。一有运输机，即派去增援。请告曼宁，在新的作战单位抵达后，你队是否需要撤至昆明休整。如需要，请让 2~3 名志愿队驾驶员和地勤人员至少再留数日。”

请将 2.2 万发 7.92 弹药装进子弹带；如可能，从眉苗再要 7.5 万发。

陈纳德

这次空战，对于仰光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人从此停止了对仰光的日间轰炸。

就连一向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英国皇家空军大队长曼宁上尉，也突然间改变了态度，并且满口答应了陈纳德的要求。自从 12 月 30 日昆明首战告捷之后，中国新闻界开始称美国志愿队为“飞虎队”。

后来仰光上空的连续空战，吸引了全世界报刊的注意。直到 1942 年 1 月底，陈纳德开始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休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上尉，一跃而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人物。从此，大批由美国和欧洲来的记者，经过印度蜂拥而来。他们深入到仰光，东瓜机场。又翻山越岭进入昆明，采访坐镇于昆明的陈纳德。

陈纳德事后写道：

“怎么会从 P—40 飞机机头上的鲨鱼得出‘飞虎’这个名字的，我永远也闹不清。不管怎样，我们发现自己被人叫做‘飞虎’总有点感到意外。”

6 史迪威

过度的劳累，使陈纳德的气管炎再度复发。

他躺在昆明基地的指挥所里，不断地咳嗽，体温继续上升。

他硬撑着，坐起来，在写字台旁，提笔给马格鲁达将军写报告。马格鲁达是美国空军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前些日子在重庆开会时，马格鲁达曾向陈纳德要过一份关于美国志愿队战况及其现状的正式报告。陈纳德答应回昆明后再写的。

次日，马格鲁达给美国陆军部发了一份电报。

1941 年 12 月 27 日

华盛顿陆军部

阿诺德将军

自从 12 月 20 日以来，据陈纳德报告，美国志愿队已摧毁了 13 架日本战斗机和 14 架双引擎轰炸机，打伤的敌机更多。请务必立即向美国志愿队派人机增援。如

欲利用日寇所遭惨败，时机十分重要。请优先考虑下列建议以确保美国志愿队在此地区连续作战。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因素。第一，紧急派遣 54 架飞机装上中东的武器飞往加尔各答；第二，为上述飞机配备 25% 的战斗零件；第三，立即每月派 15 名战斗机驾驶员到加尔各答作后补和替换用；第四，尽快提供两个中队的轰炸机交上述战区使用。

马格鲁达

虽然马格鲁达将军想尽力帮助志愿队，陈纳德总感到放心不下。1942 年新年刚过，陈纳德便收到宋美龄从重庆发来的电报：

发自重庆

至陈纳德

你能否速来参加有关将美国志愿队编入美陆军航空队事，请告。

蒋夫人

果然是有事了。

陈纳德心里清楚，如果志愿队合并或者编入美国陆军，这将意味着中国空军丧失了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同时，这也与创办志愿队的初衷不符。

他借口生病不能启程，给重庆方面复了一电。

下电请转蒋夫人：“因气管炎复发卧床。鉴于问题复杂，我认为，美国志愿队不宜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志愿队眼下的地位更能发挥作用。驾驶员均一致愿受我领导和蒋委员长的监督。我愈后是否仍需我来重庆。美国志愿队祝您新年快乐。”
顺致敬意。

你的最诚挚的

克·李·陈纳德

美志愿队指挥官

不久，马格鲁达将军非正式地告诉陈纳德，美国志愿队将成为美陆军航空队的一部分是势在必行的事。

1 月 20 日，陈纳德致函马格鲁达将军。

他在信中写道：

“美国志愿队编入航空队，会引起志愿队的战斗力的破坏，很可能长达 4—6 个月之久。

“就个人而言，我的愿望是想迅速和决定性地打败敌人，为此，我愿以任何身份效劳。

“鉴于我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及日方的战术和其总的态势，我认为，最好的安排是将我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将级军官和中国空军指挥官。

“我身负这一重担，就既能领导美国志愿队，又能领导将来派往中国的任何陆军航空队的作战单位。我仍然继续负责中国的飞行训练和对中国空军单位的作战进行领导。我可以监督用租借法设备对中国空军单位进行过渡性和单位性训练。”“鉴于我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我不相信，

到这里来的任何一位其他陌生军官能像我那样出色地办理这些事情。”
同日，陈纳德还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夫人：

随信附上我刚写给马格鲁达将军的信件的副本。在该信中，我力求用明确无误的言辞总结一下美国志愿队当前的地位以及一旦它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可能具有的地位的情况。我不想佯装谦虚，我还表明了我相信我能对盟军事业作出最大贡献应处的地位。请参阅我给马格鲁达信的副本。

陈纳德

正当美国志愿队的补给遇到麻烦的时候，陈纳德收到一份宋美龄的来电：

日期：1942年2月3日（15时）

收到：1942年2月3日（16时）

从 PXM 发来

致：陈纳德将军

加密：在美国志愿队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后，你出任驻华空军指挥官，受委员长领导。你的军衔是准将，任务是协助中国人训练中国空军。你希从美得到哪些工作人员和助手，请速复知。

夫人

陈纳德看完电报，顿时觉得精神好多了，欣喜万分。他摸出一支“骆驼牌”卷烟，燃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因为他终于得到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承认，也获得了中国当局的信任。

然而，美国陆军部的马歇尔和阿诺德将军，对于陈纳德被提升为准将颇为恼火，他们决定限制陈纳德的权力。为此，他们挑选了比斯尔做陈纳德的上司。比斯尔在美空军战术学校时是陈纳德的老冤家，曾经讥讽过陈纳德的空战理论。

更使陈纳德烦恼的是，美国陆军部接着又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早在1月25日在美国就知道，美国志愿队将成为美国陆军第23战斗机大队，而且置于他的领导之下。

这样，这两个个性极强的领导人，远隔太平洋就开始了后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气。

第五章 飞虎队（下）

1 陈纳德请求停发薪金

迪威像多数步兵军官那样，认为战斗机的作用不过是观察罢了，再多也是完成一些攻击地面的扫射任务。另外，英国人还经常要求志愿队的战斗机护送英军的轰炸机，进入防范严密的敌占区。

这些任务的危险性极大，因为距离地面很近，很可能为敌军击落。

久而久之，穷于应付的志愿队驾驶员，终于疲惫不堪了。1942年4月中旬。

驻扎在垒允的志愿队驾驶员决定集会抗议。

陈纳德立即从昆明赶赴现场。“我们参加志愿队是为了打仗，也不在乎保卫机场或飞一些高空飞行任务，以便有机会打击敌人战斗机。但是，我们觉得搞扫射任务是在让我们牺牲生命。”

驾驶员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他们的意见。

然后，他们联名签署了辞职书。

陈纳德板着脸听完了他们的发言。

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后，陈纳德平静地对他的驾驶员们说：“先生们，我非常理解你们的请求。我想提醒各位的是：你们的行动要是在大敌当前采取的话，可以被认为是逃避战斗。要知道，根据美国战争条例，逃避战斗的惩罚是死刑。这个诸位都很清楚的。我不想重复。当然，你们现在不着军装，也可以说是老百姓、平民，并不完全像现役军人一样受条例的制约。但是有一点请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

屋内一片沉寂。

一场辞职风波终于慢慢地平息了。

事后，陈纳德了解到，志愿队驾驶员辞职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基地上流传着马格鲁达的一份电报：

昆明美国志愿队指挥部

陈纳德：

顷闻前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聘用的70名地勤人员正按陆军部指示编入美驻澳洲的军队。

马格鲁达

陈纳德也担心美国陆军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于是他接着致电宋美龄说：

我相信，至少90%的美国志愿队人员宁可中断其与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合同也不愿意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原因之一是这些人在参军之前曾要求休假，但陆军部未有表示同意之迹象。如能从军方得到保证，使这些人都编入拟在中国成立的新的第23战斗机大队，那他们或许会考虑参军。

陈纳德同时将该电副本送给了马格鲁达。

4月20日。

宋美龄电告陈纳德，罗斯福总统已向参议院建议，提升陈纳德为准将，他的永久性军衔自4月18日起生效。陈纳德获悉此事后，他立即致电重庆周至柔将军：

我要求中国政府从我被授予准将军衔之日起，立即停发薪金和补贴，并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任何馈赠。

数日后。

陈纳德收到马歇尔将军发给他的一份密电，是罗斯福总统打来的，电文如下：

总统致美国志愿队：

美国志愿队的英勇和无畏及其非凡的作战效力实为全美国的荣耀。人们很了解美国志愿队在物资匮乏及艰难情况下工作的情形。

我们正派遣大量飞机，充实第23战斗机大队的力量，并要在今后的时期内，保持其力量。对志愿队增援的地勤和飞行人员均在来华途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前来。美国正以最大的努力将供应物资运到我们人员的手中。不幸的是，在澳洲西部和印度洋上发生了沉舰事件，造成了飞机的损失，致使增援在此紧要关头姗姗来迟。现在飞机已迅速派去了。

一旦接替人员熟悉了你们的经验和传统之后，美国志愿队队员都应给予休假，以便恢复身心健康。当替代人员受到充分训练之后，我们计划，把挑选出来的美国志愿队老兵召回美国或派往其他战场，以便将其经验和训练传授于新建单位之人员。你们的总统对即将来临的重要作战时刻极其关心。他对志愿队驾驶员获得举世赞赏引以为荣，并期望该队重新装备后迅速恢复战斗。

马歇尔

陈纳德看完电报后，笑了一下。

他心想，舆论的作用竟是如此神奇，就连罗斯福总统也都惊动了。一支小小的非正式部队，本来在总统眼里是无足轻重的，这回却发来电报，表示慰问。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打开抽屉，抽出一封比斯尔寄来的长信。

原来比斯尔早就在策划美国志愿队编入陆军航空队的事比斯尔在信中写道：

1942年7月4日，将定为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最后日期。从该日期起，一切合同将予以取消。取消合同的具体办法是：要么一次性付给一笔款项，要么补足合同规定的薪金与改编后志愿队人员按军衔和级别所领取的薪金之间的差额，此外，再发500美元的旅差费。美国政府已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史迪威将军已得到授权，给予志愿队队员适当的军衔和级别，以表彰他们以前的功劳。你可对这些擢升提出意见。前属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如本人愿意，可参军。

凡属美国公民的志愿队队员不愿编入三军者，回美后，将受制于选征兵役制。以前是预备役的军官而现在为美国志愿队队员的人将重新恢复其职位，回美后将重

召入伍，服现役。

我已命令第 51 战斗机大队从印度调到昆明，归你指挥。该大队有 17 名军官和 215 名军人，但没有飞机，你能否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

陈纳德怕这封信的内容会影响志愿队的士气，所以一直没有公开。

2 怒江阻截战

5 月 4 日。

日本空军派出 50 架轰炸机攻打保山，为正在接近怒江的日军装甲部队开道。

保山是日军与昆明之间的最后一座城市，它位于怒江东侧的滇缅公路上。

日本人的意图是，沿滇缅公路进犯中国，穿过怒江上陡峭的峡谷，攻下昆明和重庆，他们就可直入中国，最后结束这场战争。

这时，驻守在这里的中国第 29 师，在长驱直入的日本人进攻之前就已经撤走了。日本人的装甲部队不久即抵达怒江。陈纳德细心建立的云南警报网，早已支离破碎。在缅北的一些流动警报单位，前些日子已遭到日本人的破坏。

云南的一部分警报单位，因领不到政府的发饷，只好自行解散了。

另外，有一些警报单位则为日本间谍所收买，不再传递警报了。

美国志愿队由于缺乏警报网，从而导致防备不力。日本的炸弹炸毁了保山这座古老的城市，城内到处起火，古老的居民楼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坍塌，街上遍地是尸体和垂死的人。

美国志愿队的一名驾驶员查尔斯·邦德后来向陈纳德报告说：

“我大约在上午 11 时从保山起飞，升高到 1.8 万英尺去袭击轰炸机，敌机共两批，每批 25 架，没有战斗机护航。他们是从 50 度角度方向飞来，大约在我起飞后 30 分钟时，在离中缅边界有一半路的距离上，遇上了第二批，我集中火力，攻打侧面的一架，在我第四次袭击时，它的左引擎爆炸起火并从云层中坠下。我又对侧面的轰炸机用同样的战术打尽了我的弹药，但没有结果。我知道一些子弹肯定打中了该机。由于没有了弹药，我回到中国的保山基地。我低飞掠过机场，慢慢横滚，在城市上空约 1000 英尺盘旋，然后准备放下起落架降落。蓦然，我听到子弹从后面击中了我的护甲板，我回头一看，看到了一架零式战斗机在我的机尾。我的飞机着了火，我即跳了伞。我的脸、颈部、双肩和双手均被烧伤。我的飞机坠毁。”

第二天，日本装甲队抵达怒江西岸。

弯弯曲曲的公路上，拥挤着成千上万名难民和士兵。日本装甲队行进在手无寸铁的难民和士兵之间的公路中心上。

美国志愿队无法做到既打击日本人同时又不伤害难民。于是，陈纳德向宋美龄报告说：

夫人阁下。美国志愿队昨日在保山附近打下 8 架飞机。日本人炸城和机场。一名美国志愿队队员失踪。与保山的一切联络中断，最后一次收到的报告称，5 月 4

日 15 时，日本人在怒江西岸。桥梁被毁。日本人未遇抵抗，因兵民惊恐，沿公路东撤，我认为，形势无望，日本人可乘卡车直驶昆明，除非将公路和桥梁炸毁，并坚决阻击。许多中国卡车仍然在怒江西岸，有被日军缴获之虞。特请委员长核准进攻怒江与龙陵之间的目标。

5 月 7 日，宋美龄给陈纳德的复电；

陈纳德将军：5 月 6 日急电。委员长指示你派出一切可派出的志愿队袭击怒江与龙陵市之间的卡车和船只等。

5 月 8 日，志愿队的 4 架飞机在怒江峡谷上空进行侦察，并且扫射了车队。

陈纳德当日便致电宋美龄：

蒋夫人：美国志愿队轰炸了怒江西岸，第二次出击有中国轰炸机支援，袭击了龙陵附近的卡车。敌人无空中活动，但发现大批敌人的空卡车向龙陵移动。今午将痛击卡车车队。未发现炮兵阵地。

接着，志愿队又出动满载重磅炸弹的轰炸机对怒江西岸的日军装甲队进行轰炸。

5 月 9 日，陈纳德致电宋美龄：

致蒋夫人阁下 昨 16 时 40 分美志愿队在怒江桥以西 5 至 10 英里处进攻日军炮兵卡车队，用的是 0.50 机枪。许多卡车被焚。不少车辆中弹累累。我机全都返回，惟一架为地面炮火所击伤。未遇日机，今晨云层较低，不宜行动。请告地面形势变化。

5 月 10 日，志愿队继续进攻。

志愿队驾驶员弗兰克·希尔后来写道：

小队得到指示只扫射猛锡以西的地方，大约有 1000 辆卡车排列在怒江峡谷的东边，但并无活动。两座桥均被炸掉。在该江西边，见到许多卡车在向猛锡西行，从那里到南面约 20 英里处，可见一些零星卡车西行。从畹町到遮放，有不少卡车和数辆装甲车东行。9 时 45 分左右，我和博尔斯特对东行车队和 10 辆卡车进行扫射，有二三辆起火，这说明它们装着汽油。几分钟后，我们在一条笔直的路上看到了车队的前端，它们显然在等候支援车队。我和博尔斯特每人各进行两次袭击，扫射了整个队伍，几辆车起火。看来在场的只有驾驶员。在扫射了主要车队以东的个别几辆卡车时，我们向云南驿出发，在 10 时 30 分降落。

5 月 11 日傍晚。日本的前进已被阻止。

剩下的一些日本卡车，正在朝南驶向缅甸边界。5 月 12 日，陈纳德致电宋美龄：

美国志愿队昨轰炸和扫射向南行驶的 75 ~ 100 辆日军卡车，车队的后端刚进入

畹町市，而其车首在城南。有 20 辆被焚，不少车辆被击毁。我机受到车队中轻型坦克火力的还击。沿回到怒江的公路侦察时发现，隔了较长时间才偶尔有卡车出现。我认为，在畹町以北没有大于营一级的日军。今晨沿怒江西岸也未发现日军踪迹。

怒江西岸由于遭到志愿队巨大炸弹的轰击，岸边的滑坡几乎把滇缅公路淹没了。

日本步兵和炮兵在西岸筑堤设防。东岸的中国军队则挖壕据守。从此，双方一直在那里相持着。直到 1944 年，日本军队逐步被赶走为止。

3 空袭河内机场

结束了对怒江上的日军轰炸和扫射之后，陈纳德开始筹划对河内机场的空袭。因为据侦察得知，河内机场已经集结了大批日本飞机。

5 月 12 日，6 架志愿队飞机从昆明起飞。他们在河内机场上空，看到了 60 多架日机排列在机场上。

经过一阵猛烈的扫射，摧毁敌方 1 架运输机和 15 架战斗机。

志愿队驾驶员约翰·杜诺万的飞机，不幸被地面火力击中，他的僚机看到他在河内机场上空跳了伞。

这一天，陈纳德正在详细分析空袭河内机场的战况时，忽然接到两封由宋美龄拍来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

陈纳德将军：从周一一起，请派美国志愿队在密支那与八莫之间以及英都和辛博之间飞行，以保护我在辛博附近的地面部队从西向东横渡伊洛瓦底江，并使敌机无法攻击我军，如可能，请一天三次在不同时间每次派三到六架飞机。委员长希此计划能连续执行五日。

第二份的内容是：

陈纳德将军：请派飞机了解密支那和八莫有否敌军，因日军声称他们已占领上述城市。还请派机去密支那与八莫之间的辛博了解我军是否已有单位抵达该处。请要求驾驶员观察敌我在上述城市的军队动向。请告美国志愿队，我感谢他们优异的工作。致意。

对于这两封电报，陈纳德觉得相当为难，又十分费解。一个月前，陈纳德曾致电蒋介石，告诉他不要再把 P—40 飞机作为低飞侦察机来使用，因为低高度飞行容易被地面火力所击中，也容易受到坏天气的影响。

当时蒋介石同意了陈纳德的意见，并通过宋美龄回电说，美国志愿队的飞机只用来同日机作战。

陈纳德心里很清楚，美国志愿队根本无法执行这项任务。但是，他还是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写了一封回信：

中国四川重庆委员长大本营

蒋夫人阁下

亲爱的夫人：

在对形势和各种有关因素进行了周密调查之后，我遗憾地告诉您，志愿队无法执行您五月十二日 927 号来电中所述及的任务，理由如下。

1. 距离太远，从昆明经密支那到辛博再回到昆明共 785 英里路程，而从昆明去英都和去辛博再回到昆明的距离是 897 英里。这两段路程均超出了 P—40 机的航程。如云南驿能用作基地，上述距离可缩减到 500 和 607 英里。在第一种情况，P—40 机只能留在前方约 20 分钟。在第二种情况下，飞机几乎无法回来。

2. 从昆明到英都的飞行条件迅速恶化。低云和大雨成天不停。为此，我认为，在辛博地区的军队不需要战斗机保护。因为日机由于阴雨，无法经常运作。军队夜间行动或在多云的白天行动不会被日本空袭部队发现或遭其攻击。

3. 尽管可勉强从云南驿进行侦察，但利用云南驿作为基地不切实际，可要求整个志愿队执行来电所示的任务，但云南驿并无容纳一个中队的居住条件。那里的警报网很不可靠。它的运作原则是安全第一，也无人试图对情报进行估计。如将空军部队驻在该处，它将被迫整天执行预警任务，或者停在机场上，冒被突然轰炸之险。

4. 保山无法作基地，尽管它位于上述地区的有效航程之内。保山周围的警报系统在该城被炸之前即已失灵。我的一个中队在那里地面上挨过打。自从保山被炸后，没有必要再在那里维持一个可以信得过的警报系统。

5. 美志愿队的飞机和设备均需大修，而飞机均未具备执行如此长久任务的条件。

鉴于本地区天气日益不宜于飞行，我谨建议，一俟重庆准备工作就绪，即执行迁往重庆的原计划。在此期间，我们可对设备进行大修，并由我驾驶员从印度运来新的飞机。

我已开始将指挥部的无线电台和一些设备准备用卡车运到中部地区的新机场，为时约 1 周或 10 天，志愿队便能在该地有效运作。如在指定地区的地面部队的行动能与我空中行动相配合，我深信，将会取得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

恭候您进一步指示并重申我们愿给予最大援助的愿望。

最诚挚的

美国志愿队指挥官

美国准将陈纳德

1942 年 5 月 14 日

陈纳德将这封长信加密用电报发出后，长长松了一口气。他的心情不免有些低落。美国志愿队拥有的飞机越来越少，一些优秀的驾驶员在战斗中不断地损失。5 月 17 日。

美国志愿队出动八架 P—40 机，轰炸河内到老街的日本工厂，并且对老街的日军铁路货车场进行扫射。

驾驶员彼得·赖特向陈纳德报告了这天的战况：

“我们起飞后，沿铁路飞去，一直飞到应炸列车的地点。列车不在那里。我们折向北面，并朝老街前进，因它是替代目标。我们从南到北向铁路货车场俯冲。我是第二个俯冲的，紧随毕晓普之后，他在指挥。正当我在 500 英尺左右高空投掷炸弹时，我看到毕晓普往上升时，他机尾冒出了四英尺高的火焰。他升向左面。翻身横滚，并跳了伞。他的伞立即打开，飞机坠毁在山崖上，并起了火。毕晓普下降在老街城的那一部分即江的西面。他落在城市本部。当他消失在树林里时，他还是活着

的，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他的炸弹，我的炸弹和我后面由霍华德驾驶的飞机都打中了老街货车场内的三排货车。我同霍华德一起，向勐遮前进，他下降了，我又飞往昆明。”

毕晓普那天共打下了 5 架日机，在俯冲扫射货场时飞机中弹燃烧，他跳伞降落，当了俘虏。他被日本人关押了好几年，后来他在由上海押送到华北的火车上跳车逃跑。回来后，他又于 1945 年加入了陈纳德领导的第 14 航空队。

陈纳德通过他多年来对日本空军战术的观察，他确切地认为，日本人仍然以为他会把三个战斗机中队全部驻扎在昆明和重庆附近的基地。

于是，他出人意料地把指挥部设在桂林。而不久前，桂林还遭到过日本轰炸机的轰炸。陈纳德早就了解到，位于广州的白云机场的日本空军基地，是一个实力很强的轰炸机训练基地，那里的士官生经常以桂林为轰炸目标。

4 桂林保卫战

桂林机场。

一条长 6000 英尺，用碎石铺成的跑道，在陈纳德指挥下，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花费了数日的时间，终于完工了。它可供战斗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起飞，降落。6 月 11 日早晨。

陈纳德命令美国志愿队两个中队进驻桂林，几乎是同时，他的指挥部也迁到了桂林。

他在昆明和重庆两地，仅仅部署了六七架 P—40 飞机，用以对付日本空袭。

志愿队进驻桂林的第二天，黎明时分。

桂林城头响起了警报。

城里居民开始疏散，大多数人都去了市郊周围的大溶洞中避难。

志愿队队员个个严阵以待。

陈纳德花费了很大力气重新建立起来的警报系统，此时发挥了它的作用。

广州的监视员在向陈纳德报告：

“日军一个混合机群已从广州起飞，目标很可能是桂林。”陈纳德一支烟还未吸完，只见日军九架三菱双引擎轰炸机，从西南边 1.5 万英尺方向飞来，轰炸机群的上方，有两队战斗机护航。

此时，早已在空中盘旋待命的志愿队战斗机群，立即分成两个小队，迎战日本混合机群。

他们中的一个小队向日本轰炸机俯冲过去，迫使这些轰炸机从桂林上空散开，朝着他们的基地方向返回。

就在追击的过程中，他们连连击落零星敌机。

该小队的一名驾驶员乔治·伯加德事后报告：

“我开始向南 150 度以 1.3 万英尺高度飞行。马斯制斯与我一起，约在东南 75 公里处，我们赶上了一架日本双引擎轰炸机和它上面的一架战斗机。我对 I—97 型机开火。在它转身向我飞来时，我正在对付轰炸机。轰炸机属轻型的，它飞得特别灵活而且很快。该机向下作急剧俯冲

并急转弯。我第一次没有打着它，不得不爬高以便再来袭击一次。当时，I—97 已盯住我们。因为它向我的左机副翼打了一梭子弹后俯冲飞走。我也来了个俯冲急转，向它打了长长的三梭偏斜子弹。这架战斗机跳动得很厉害，斜着机翼，跌了下去。我拉起飞机，看见敌机撞入一个尖峰的边缘爆炸了。我又爬高，选中一架正在山峰中贴峰飞行的轰炸机。每次我从后面盯上它时，它便在群山峻岭中忽隐忽现。当时我的 0.50 口径机枪失灵，大约来回兜了五六次，我才在一个山沟里完全盯在它后面，但它突然来了一个 90 度急转弯，并沿着一个圆锥形山峰作 360 度的垂直翻转，我的速度太快，无法老呆在它后面，当我拉起飞机，降低速度，它又往南飞了。我们离开地面不会高于 150 英尺的，在一次从上面进行袭击时，我右边的 0.50 机枪又管用了。一刹那间，敌机的左引擎着火。它力求维持高度。我则降低速度，不断射击，直到它拖着一个坏了的机翼，无法升高为止。机身在坠地时分成两半，在我盘旋时，看到它的右翼仍在燃烧。地点大约是在苍威以南或偏东南 20 公里处。”美国志愿队的另一个小队，则同日本战斗机遭遇上了。驾驶员鲍勃·尼尔在战斗结束后向陈纳德报告说：“我第一次飞向目标并不顺利，因为射击方向有偏差。第二次袭击正好与 I—97 型战斗机迎面相遇，它冒起了烟。我没有看到它撞毁。我向西南方向飞，又袭击了一架战斗机，它也冒了烟，但没有见到它坠毁。在这次飞行后，一架双引擎战斗机咬住我尾巴，向西紧追了五到十英里，我才与它拉开距离，并与它对着飞，我没有看到我开火后的结果……丢掉这架战斗机后，我继续往南飞，并与一架向西南飞的 I—97 型战斗机交战。它被打坏，但没有见到它坠毁或燃烧。”这场空战历时半小时。

美国志愿队打掉了 28 架日机中的 11 架。桂林城没有受到一颗炸弹的威胁。

市民们欣喜若狂，他们设宴热情款待美国志愿队，并且涌向基地表示庆贺。

整个桂林城沉浸在一片欢庆声中。

陈纳德又制订下一步作战计划。

他将第二中队的一部分战斗机调到衡阳的前沿阵地。其余的 P - 40 机随同指挥部一起，迁往重庆。

6 月 22 日。

驻守在衡阳的部分志愿队战斗机，奉陈纳德之命，飞往汉口袭击日军机场和长江上的日军舰只。

驾驶员查尔斯·索耶在当日的战况报告中写道：“我在 13 时起飞与中队长和鲍姆勒一起爬高到 2 万英尺，并在机场附近盘旋。我们侦察到 14 架 I—97 型机在我们下面 8000 英尺处，我们即发起进攻。我的第一次进攻是迎头痛击敌机，狠狠地打了一梭子弹后，就看到那架飞机引擎里冒出了大量浓烟。接着我俯冲到它下面，没有再见到发生什么情况。稍后，我从后面向其中一架进行了后圆四分之一投影比进攻，该机引擎又冒出了黑烟。但是，我俯冲离开，没有见到它是否坠毁。之后，我又发起了几次进攻，成果不明显。最后，我处于一个能直接从后部进攻的方位上，我从下面扑了上去，而且从后面进攻，大约在 500 码处，我开了火，逼近到 250 码处，该机碎片四飞，浓烟滚滚。它向左转了一个直角。

我正好从近距离给了它狠狠一梭子。它似乎爆炸解体。”

翌日，陈纳德给宋美龄发去一电。电文如下：

致蒋夫人阁下：昨日美国志愿队在汉口以南江上打坏了日军的炮艇，打毁了三只小艇。还在与二十一架日本战斗机战斗中，我们打下一架，也可能是五架。我方一架在衡阳机场被打坏，但可修复，无其他损失。今日天气不好。你可发表上述报道。

正当美国志愿队为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互相庆贺时，史迪威和比斯尔却在紧锣密鼓地为解散志愿队而活动着。

5 “他们该回家去了”

比斯尔遵照美国陆军部的命令，全力以赴拟订美国志愿队编入陆军航空队的细节。最后，他终于得到了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同意。比斯尔来信要陈纳德对解散志愿队提出意见。陈纳德在回信中重申了他的意见。

“每一个志愿队队员应发给 500 美元的回美旅差费。我已为愿留在中国并为第 23 战斗机大队服务的志愿队队员（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官兵）的提升进行了仔细的考虑……由于中国伙食费和劳务费用高，美军人的口粮标准应订得稍高一些。而且应当对拟成立的新大队的行政管理提供支援人员，你知道，我本人并不擅长于行政管理。”

几天后，1942 年 5 月 15 日，陈纳德突然收到总统顾问劳克林·居里的来信。

显然，比斯尔已将陈纳德的信转到了华盛顿。居里来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将军：

自从 1 月 12 日以来，我没有收到过你的来信，但关于你和队里的情况，我听到不少。正如你所知，你和志愿队都在美享有盛名，没有一天不听到有关志愿队的报道。陆军对志愿队态度不错，它的公共关系部已发表了一系列材料，大都是很好的。没有比能使我略尽微薄之力，给你们以协助要更快乐之事了。我十分珍惜你说过的话：

我是志愿队的一位真正的队员。

我对你们无法从此地得到充分支援深为难过。这确实是可悲的。我认为，你不该经历那个危急和士气低落的时期，不必在没有什么飞机的情况下去轰炸曼德勒……

有关洛克希德赫德逊的事尤其使人难受。不仅是因为飞机一拖再拖，迟迟不来，而且也使三十二名驾驶员的替换无法进行。不用说，我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将你们的战斗机的替换从属于轰炸机，但由于我们在打仗，十分抱歉，我对空军没有多大影响好施加。

令人遗憾之至，美国志愿队无法再继续下去。这里的困难似乎难以克服，不合并，你们就会自我消耗殆尽而结束。

还有一些事，我还是不写为好，待我们有机会时再促膝长谈。与此同时，请你相信我始终不渝的友谊和对你的钦佩。

诚挚的

5月26日，陈纳德又收到一封重庆方面的来信。信中说：“蒋委员长已同意解散美国志愿队，并为解决美国志愿队的合同条款找到了办法。大部分合同仍将履行，所有人员都将取得欠给他们的全部余款，并得到一笔回国旅差费。”陈纳德回信说，对这样的解决办法表示满意。6月20日美军成立了陆、海两军种归并委员会，并开始到一些机场同美国志愿队人员谈话。

大多数美国志愿队队员对归并一事并不热衷。驾驶员查尔斯·邦德在日记中写道：

“6月22日，美军归并委员会人员到桂林来看我们，海恩斯上校用DC—3机把他们送来。陈纳德将军也同来，海军有一名成员。他对前海军驾驶员的谈话极其不当。他态度蛮不讲理。我们大家都听了一个陆军上校谈了归并问题，以及我们的其他抉择的事。事后，鲍勃·尼尔和我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这并非易事。但我们决定回家。不呆在这里，良心上不好过，但我还是打算回华盛顿特区去，为自己弄上一个固定的差使。

“今晚，我更敬佩这位老首长了。乔治·伯加德告诉我，在与陈纳德谈话时，陈纳德告诉他，他不怪我们要走的任何人。这使我好受了一些，也许我现在可以安心睡大觉了。”然而，史迪威和比斯尔一再声明，美国志愿队如不接受归并，将不再给予补给。

另一方面，史迪威又向志愿队队员说好话，答应以一个完整的战斗机大队替代在中国的美国志愿队。同时他还答应蒋介石，让陈纳德在这段时间里作为美驻华高级军官留任。但是后来这项诺言没有一次得到实现。

此时的陈纳德，尽管他已尽其所能反对归并，但大势如此，当他看到反对没有用时，也只好放弃斗争，他觉得最要紧的事是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2年7月3日。

陈纳德接到了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正式命令。

美国志愿队指挥部陈纳德将军：

兹命令你解散美国志愿队，并按我们核准的计划解雇志愿队队员。

蒋委员长令

1942年7月3日

重庆

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天上开始下起了雨。美国志愿队工作结束仪式这一天在重庆举行。重庆市民纷纷上街集会。燃放烟花和爆竹，为美国志愿队祝福。

晚上，在林森主席的官邸举行了结束仪式。实际上这是一个告别晚宴。

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将军主持宴会。他一直在负责美国志愿队在华的吃住问题。

参加仪式的有：

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蒋介石等中国军政要员，各盟国使馆代表，美国和英国的军方代表、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志愿队队员。

黄仁霖将军宣布晚宴开始。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支外国乐曲：《阿，小小的伯利恒镇》。

一些美国志愿队的队员伴随着乐曲声低声地唱道：

……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

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于你一身。

……

乐曲终于停止了。

两名勤务兵抬出一个红绸裹着的東西——像是一块牌匾。黄仁霖将军大声宣布道：

“请委员长和陈纳德将军揭幕！”

蒋介石和陈纳德走上前，伸手揭开了红绸。原来是宋庆龄和宋霭龄送给陈纳德的一幅大型油画，上面画着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三人的合影。

接着，蒋介石发表祝酒词。他说：

“中国民众将永远把陈纳德将军和他的一队空中将士当作自己的战友和来自一个友好国家的友好代表。”晚宴上频频祝酒。

黄仁霖将军在宣读美国志愿队的战绩：

“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四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六名被高射炮击中阵亡，三名被敌人炸弹炸死，三名被俘，十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斗机）……”

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之后，由毛邦初将军宣布美国志愿队王牌飞行员名单：R.H.尼尔 15架半；

D.L.希尔 12架又1/4；

W.N.里德 10架半；

W.D.麦加里 10架又1/4；

K.A.杰鲁斯特 10架半；

R.L.利特尔（阵亡）10架半；

G.伯加德 10架又3/4；J.V.纽柯克（阵亡）10架半；

G.H.奥尔德 10架又1/4；

G.R.邦德 8架又3/4；

R.T.史密斯 8架又2/3；

F.劳勒 8架半；

F. 希尔 7 架；
雷克托 6 架半；
J.R. 罗西 6 架又 1/4；
J. H. 霍华德 6 架又 1/3；
J.H. 布赖特 6 架；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午夜。零点钟声过后。美国志愿队已经成为历史名词。雨，仍然在下。

可是，7月4日美国志愿队驾驶员的阵亡人数并没有结束。两名自愿再留两周的驾驶员约翰·佩特奇和阿诺德·尚布林，在7月10日的空战中不幸又阵亡了。

美联社7月14日重庆电：陈纳德在谈他对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感想时，说：

“他们该回家去了，但我对解散一事感到遗憾。这是一个空军指挥员能得到的最好的机会——完全不受拘束地集合和训练一批战斗的官兵。我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

6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美国志愿队解散之前，史迪威曾信誓旦旦，答应要用一支满员的战斗机大队，即由四个中队 100 架飞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来替换美国志愿队。

可是，事实上美国军方只提供了 10 来名没有战斗经验的驾驶员，以及 20 名文职人员和地勤人员。更不用说，提供战斗机、卡车或吉普车、无线电台、办公和维修设备了。

好不容易，七拼八凑组成了一支第 23 战斗机大队，作为新建的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核心。

这种局面正如陈纳德自己所说的；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完全是在战斗声中拼凑而成，是以 1942 年那阴霾的夏天在中国能弄到的任何东西拼起来的。东西极少。作为远在新德里的第 10 航空队的后娘养的孩子，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得不为争抢每一个人、每一个电花塞头和每加仑汽油而奋斗。”

1942 年 8 月 18 日，比斯尔出任第 10 航空队的指挥官。

比斯尔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委派海恩斯上校指挥驻印度的特遣队，陈纳德指挥新组建的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陈纳德早就看到，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从日本到印度支那和缅甸的补给线。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应立即将其切断。

他的更为详细的看法，见之于 7 月 29 日向当时第 10 航空大队的指挥官内登将军发出的一封密函：

事由：收到有关目标的指示——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送：美第 10 航空大队指挥官

1. 约 7 月 24 日的来电收悉。你说密支那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第一个目标事已悉。

2. 如能通过电台从速收到你有关日本人在密支那活动的一切可靠情报事关重

要，为此，我向你提出上述请求，坦率地说，密支那似乎是日本人用来进行其典型的声东击西的地方，其用意是让我们只注意它而不去管日本人在其他地方作出的更为重要的准备活动。当然，日本人在某个时候可能利用密支那。我敦促你能充分使用空中和秘密情报，以便弄清日本人在何时会使用密支那。然而，在我在远东指挥期间，我总觉得，去应急轰炸一个还未动用的机场以防止敌人利用它是不切实际的，诚然，日本人用逐日轰炸的办法阻挠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占用衡阳、桂林地区的机场，尽管我当时并没使用过这些机场。下列事实可以说明日本人使用这种策略是徒劳无益的：当我决定将战斗机和轰炸机调到这些机场上去的时候，我一天也没受到过阻挡或捣乱。

3. 就我对中国的经验而言，保持我们运输路线畅通的最好办法就是遵循一次周密拟订的计划，即：计划将敌机摧毁在地上；在敌机进入我地区时，与其展开毁灭性的战斗。

4. 鉴于上述，我认为，对印中运输线的真正威胁是该线以南的敌人空军基地，特别是那些日本人早就用飞机占领的基地。我相信，他们还在这些机场上不断施工，以便一俟雨季停止时或者提前直接进攻我们的空中航线。我特别是指日本人在猛锡、垒允、腊戍、瑞昌、曼德勒、马圭、东瓜和仰光。正如你所知，这些基地离印中运输线 150 到 600 英里。日本人可能从这些基地使用轰炸机来袭击该运输线的昆明东端或者丁羌两端控制站。敌人也可能从这些基地（或用这些基地作为前沿基地）使用长距离战斗机以攻击我们正在飞行的运输机。清迈和南奔是敌人可以快速飞向中间集结路线的基地。

5. 为了应付这种局势，为了完成蒋委员长通过总指挥部、美国陆军部队和中缅印战区交给我的战略任务，我特敦促采取下列步骤：

（1）在丁羌地区，组织和管理一个有效的空中报告网，能以日以继夜地发出有关来犯敌机的适当警报。

（2）增加每天向我们提供上述第 4 段提及的各基地上的日机和设施的情况，以便我们得到充分的预警并对付敌人的任何空中活动。

（3）经常不断地向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提供最现代化的飞机、人员和补给，以便增援该队，以便我消灭敌人于他们的基地上，防止他们拦截运输线。

我相信，如果能以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到上述我要求的程度，如果上述建议得以落实，我不仅能保持印中运输线畅通，且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如你能告我，你为我源源不断送来最新型的飞机、人员和补给而采取的措施，我将不胜感激。

6. 如果不按我在此信中所建议的精神采取行动，我有责任预告你，我就马上会遇到这种情况：以装备低劣的力量去对付具有巨大优势的敌人。我想重申，我相信，如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变成了一支力量，我不仅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而且也能切断从日本到马来亚的交通线，并在将来轰炸日本本土。

美国指挥官陈纳德将军

内登将军读完这封密函后，终于明白了陈纳德的战略意图。

不久，他便指派罗伯特·斯科特担任第 23 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斯科特是一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上校，具有很长时间的战斗机飞行经历。他在志愿队解散之前曾与队员们有过多次战斗飞行，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接着，内登将军又从新德里调来了亨利·斯特里克兰和梅里安·古柏分别担任陈纳德的副官和参谋长。

古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是波兰空军中的王牌战斗机驾驶员，他还在亚洲和非洲拍摄过新闻纪录片，当过好莱坞的导演。后来，他成了陈纳德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还有四名中国勤杂人员照料陈纳德的起居。一个姓王的厨师；一个司机，也姓王；一个茶房，绰号叫“游艇”；一个餐厅服务员，叫“炮艇”，因为他曾经在美国炮艇上服务过，该艇在 1937 年被日军击沉。

陈纳德还养了一条名叫“乔”的狗。他很喜欢这条狗，空闲时经常训练它如何捕抓鸭、鹅、鹤和鸽子。

1942 年的夏天，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几乎不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力量，只拥有 7 架 B - 25 轰炸机和 40 架 P - 40 战斗机。

陈纳德让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希尔和雷克托分别担任第 75 战斗机中队长和第 76 战斗机中队长。

到雨季结束时，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击落了日军 24 架战斗机和 120 架轰炸机，自己方面损失了 5 架 P - 40 战斗机和一架 B - 25 轰炸机，但飞行员没有损失。

第六章 封面人物

1 老父故世

42年8月里的一天。大雨滂沱。
陈纳德正在制订对海防港的日本船只进行空袭的作战方案。
这时，勤务人员给他送来一封信。
陈纳德拆开一看，信是孔祥熙从重庆寄来的：

亲爱的陈纳德将军：

我和内人顷闻令尊大人去世，不胜悲痛，谨表由衷慰问。我等虽无缘幸会令尊大人，但他必系一正人君子才有你这样一位令人敬爱的儿子。他能尽享天年，并有幸亲睹其子大有作为。希此事能在悲痛之际给你以安慰。

你诚挚的

孔祥熙

1942年8月12日

陈父于7月初去世，而陈纳德得到这一消息，却已是8月中旬了。
望着面前这封信，陈纳德感到喉头一阵发紧，双眼充满了泪水。

他多么想把他在在中国度过的漫长岁月详细地告诉父亲，他还想把他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地呆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原因再次向父亲解释清楚。老人家很难明白他的儿子为什么非要在这块遥远的土地上打仗，为什么不能尽早回家，回到内尔和孩子们的身边。

陈纳德想起了1939年圣诞节时，他回到路易斯安那州金德的老家，探望他的父亲，发现父亲不像是一个已有77岁的老人。老人家还能到处走动，在河边钓鱼，秋天还打了两次野鸭子。

老人家听起中国发生的事情很是专心，但是陈纳德发现他根本没有理解，老人家只是朝着他慢慢地点头。现在，他再也无法向父亲说清楚了。

以往，他一年大概只能收到两三封信，每封信都是父亲一字一字地用心写成的。此刻，他一想到再也无法与父亲通信了，便感到十分茫然。
窗外的雨，不停地下着。

他一边凝视着这封信，一边想起他母亲病逝的时候。那时他才5岁。他和弟弟对母亲的死十分悲痛。

5年后，父亲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家，同一位女教师洛蒂·巴恩斯结了婚。“洛蒂小姐”本是一位农家姑娘，也像陈纳德一样热爱大自然。她鼓励陈纳德念书，要胸怀大志，将来成为一个有为的人。

又一个5年后，继母洛蒂去世，陈纳德感到好像死了亲生母亲一样难受。

想到这两个妈妈的时候，陈纳德不禁感慨万端。这些事在近半个世纪前都发生在远离中国的西方，使人仿佛有一种隔世之感。

大雨遮蔽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脚。公路上积满了泥和水。

衡阳和桂林两地用泥土和碎石修筑的机场，不时地受到日机的轰炸。成千上万名民工组成了抢修队。只要日机一炸跑道，民工们就立即

将弹坑填平。有一天，他们在两小时内就填平了桂林机场的 45 个弹坑。

8 月下旬，陈纳德将中程轰炸机调回昆明机场。准备袭击缅北的日军目标。

雨季慢慢过去。

9 月 19 日。陈纳德派出 B - 25 轰炸机开始袭击缅北的目标。中程轰炸机和战斗机共出击 11 次，袭击了日军的补给库和军队集结地区，在畹町—猛锡地区给敌方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此时，正在缅甸作战的史迪威，却面临着僵局，根本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供发表。

而美国公众一直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例如，日本在瓜达卡纳尔岛登陆啦，阿留申群岛的战斗啦，欧洲的战事啦。正好这时陈纳德领导的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陆续取得了一些空袭战绩，史迪威便拿去发表了。

美联社 9 月 27 日驻华空军随军记者报道 美国驻华空军在经过一个月的寂静之后恢复了对日本人的空中进攻，昨天扫射了云南省西南的行军队伍。在前一天，他们曾袭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这是史迪威中将的司令部昨日宣布的。

这则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有一支偌大的空军在中国作战。殊不知，这支在中国的“空军”只有半打中程轰炸机和 50 架战斗机。坐落在昆明机场附近的陈纳德住所，是一个瓦顶土砖建筑，房屋四周为桉树和胡椒树所包围。

由于食品无法从印度运来，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食用的肉类，都是云南本地养的猪、鸡和菜牛，绿色蔬菜也是本地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更习惯于喝茶而不是咖啡，喝的酒也是当地酿造的啤酒、葡萄酒或白兰地。

但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最为烦恼的事情，是迟迟得不到飞机、零件和补给。

陈纳德的参谋长梅里安·古柏，像陈纳德一样，个性很强，不太注重正统式的方法。

10 月初的一天，古柏和陈纳德谈起了补给问题，愈谈愈觉得气愤。于是，古柏参谋长提笔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少将写了一封私人信，向他倾诉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所处的困境。

多诺万少将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总统将古柏的信在华盛顿传阅。陆军部将此信的内容通知了史迪威。10 月 5 日，比斯尔致电陈纳德说，“你现在的参谋长的军事阅历不足以履行职责。”

接着，古柏便由于“健康原因”被勒令回美国。陈纳德很生气，他向陆军部提出强烈抗议，但是纯属徒劳。后来，古柏奉命调到太平洋战区，任该战区司令部的副官。10 月 8 日。罗斯福派遣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作为他的特使，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2 致罗斯福总统的信

1942 年 10 月 10 日，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威尔基打电话给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司令部，要求面见陈纳德将军，并同他私下谈谈。

当时陈纳德正在白市驿，他告诉威尔基，他要得到史迪威的同意后才能见威尔基。

翌日，威尔基和史迪威驱车来到白市驿。

史迪威告诉陈纳德，可与威尔基谈他想谈的任何事情。陈纳德与威尔基在办公室里促膝长谈。

两个小时过去了。

史迪威一直坐在外间静候着。

10月18日，陈纳德同威尔基再次长谈。

在这次谈话中，威尔基对于陈纳德率领特遣队，在缺乏补给的艰苦条件下，仍然英勇地同日寇进行殊死斗争，深表钦佩，而且“确实感到震惊”。

正是这次谈话，威尔基后来成为陈纳德的有力的支持者。威尔基要求陈纳德直接致函罗斯福总统，谈谈他和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情况。威尔基表示，他可以将信直接转交给罗斯福总统。

陈纳德认为，这很可能是个机会。他对于姗姗来迟的物资补给，对于史迪威和比斯尔千方百计压制在中国的空战，早就深感烦恼。为什么不利用这个良机，向总统一吐为快呢。陈纳德从来就不喜欢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层层向上申诉，即使他昔日在陆军航空队时也是如此。

他认为，只要打赢战争的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使用。于是，他没有用多少时间就写好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这封信很长，全文如下：

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特使

温·威尔基先生：

您告诉我您是美国总统（美国军队总司令）在军、政方面的直接代表。您命令我向您直接汇报一下在华与日本人进行军事作战的情况，我谨遵您所嘱，汇报如下：

1. 日本会在中国被打败。

2. 日本会被这样一支小小的空军打败，它在其他战区会被认为是可笑的。

3. 我深信，只要我有全权指挥这样一支空军，我能把日本人打垮。我相信我能拯救千千万万名美国军人和海员的生命，而美国将付出的代价很小。

4. 我对我所说的是有信心的，这不是带着个人考虑说的。我之所以有信心是基于下列事实：自从1923年以来我一直坚信日本会对美发动战争。我将自己军事生涯中最美好的年华用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任中国空军的非官方顾问已有5年之久，同时，我以此身份，对日作战也有5年之久。去年，我先是指挥美国志愿队，之后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我在中国期间，从来没有超过50架作战的飞机来对付日本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作为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指挥官，我们从来没有在与日本进行的空战中打败过。在我指挥下的这支小小的战斗力量经过核实已消灭了300多架日本战斗机，毁坏敌机约300架。我相信，一共约600架，而我们自己只损失12名美国志愿队飞行员和4名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飞行员。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轰炸机力量最多由8架中型轰炸机组成。我使用这些飞机，对日本人的仓库、军队和船只进行过25次袭击，而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敌人的活动而损失一人一机。

5. 我到中国前，中国空军是由意大利顾问指挥的。在美国参战前，我把意大利人请出了中国（因为我认为我们迟早会与轴心国和日本打仗的）。我自信，我得到了蒋委员长和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信任。如果我有了他们的信任，这是因为（1）已是一位常胜将军；（2）我从不对中国人说假话，我从不许诺去干那种我力不能及的

事。

6. 我现在深信，只要我拥有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力，我不仅能打垮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7. 军事任务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现在它被那些不灵活的、不合理的军事组织和不懂如何在中国进行空战的人所复杂化了。

8. 为了打垮日本，我只需要一支很小的美国空军：105 架新式设计的战斗机、30 架中型轰炸机。在最后阶级（今后几个月内），再要几架重型轰炸机。这支力量应一直加以维持。我们总会有损失，但损失应予以补充。我认为，战斗机有 30%，轰炸机有 20% 的补充就足够了。

9. 我之所以说，我能打败日本是因为那支力量有把握摧毁日本空军，也许半年，至多一年。我是一个职业飞行战士。这是我作为专业人员之所见。我此见的根据是简单的，日本只能生产有限的飞机。我可用空间军事机动手段迫使日本空军按我们选择的态势来与我作战；只要一旦把日本空军固定在这个位置上，我便能有效地将它摧毁。一旦日本的空军被粉碎，我国的海军就能行动自如，麦克阿瑟将军就能在西南太平洋上任意推进他的攻势。与此同时，我可从华东的空军基地确保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没有一国是固若金汤，不易受到空中袭击的。切断日本通往其所取得的帝国的海路并非难事。一旦上述两项目标完成，完全从军事上控制日本是有把握和容易的。

10. 为了有效维持上述这支空军力量，在印度与中国之间一定要建立一条空中补给线。与应完成的任务相比，这条补给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与建立泛美航线的南美航线或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线所要克服的重重困难相比，维持这条空运路线如同儿戏。它只要求指挥有方，管理得法。通过这条航线运送的维持空军的补给供应量也是很小的，所附研究报告说明此事并不复杂。

11. 目前对这条运输线的防卫计划是一种典型的、正统的和僵硬的军事思想的产物。它表明完全缺乏真正运用空中力量的概念，甚至连起码的军事战略概念都没有。我将如同西庇阿·阿夫里卡纳斯保卫罗马（在汉尼拔兵临罗马城下时）一样来维护这条空中路线。西庇阿攻打迦太基，结果，迦太基人无奈不得不将汉尼拔及其军队调回非洲去保护迦太基。同样，我也要以打击日军在西南太平洋上的补给线，接着袭击东京的办法来维护这条运输线。这样，日本空军就会迫于形势回到华东和东京上空去打仗了。日本人没有一支既能在印度、缅甸和云南的运输线上空作战，又能同时在东京上空打仗的空军。历史上没有一名能干的指挥官会采纳目前保护这条运输线的呆板的计划的。南北战争期间，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向南方纵深进军，打垮李将军的补给线，切断李的通讯线，同时格兰特自己把李的军队拖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旦李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被切断，李被打败，南部同盟也就被打败。我打算在中国如法炮制，对付日本人的空中力量。日本人一定会死守香港、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这对守住在日本本土至关重要。我可以依靠世界上最好的警报网，迫使日本空军为保卫它这些目标而战。使用这些技术，我相信，我可以 10 至 20 架对 1 架的比例摧毁日本飞机。要是日本空军不愿走进我的警报网并进行战斗，我会用我的中型轰炸机去炸他们通往西南太平洋的海上补给线。在几个月内，敌人就会丢掉许多飞机，使日本从空中防卫本土的力量变得微不足道了。然后，我就能从株洲和丽水用重型轰炸机去袭击日本。我的空军可以烧掉日本两大主要工业区：东京和神户还有大阪、名古屋三角地带，日本就无法将弹药补充给它在欧洲、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等新占领的帝国。这样，在中国的中国军队和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都有了出路，

麦克阿瑟也可以从他的澳大利亚的根据地前进了，这一切都不需花很大的代价。

12. 在进行这种作战的同时，我会维护这条运输线在云南的东端（昆明、益和云南驿等）的全部地面设施。如果日本通过中间集结路线调动大批空中力量进入缅甸，以袭击印中空中补给线，那么，我可以依靠内部空中联络，退居内线，并又回到我在云南建立的警报网内，到缅甸机场上空去对付日本人，并在那时和那里打垮他们派来对付我们的任何力量。

我的整个上述计划是很简单的。这一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花了5年时间建起一个空中警报网和无线电的指挥系统来这样作战。我对我的成功毫不怀疑。

13. 然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应给我充分的作战自由；我能直接与蒋委员长和驻中国部队打交道。我知道蒋委员长也希望我这样做。要是我在与美国志愿队工作期间后退一寸，我就不会作出那么有信心的声明了。我只是在地面部队逃跑致使我的空军基地暴露在地面进攻之下时，我才后撤。即使那时，我也要为每损失一架美国志愿队的飞机而打掉20架日机。即使那时，要是我有所需的轰炸机和侦察机，我也不会被逼撤退的。

假如我有权只向蒋委员长报告一切，我想在中国进行陆空联合作战。

14. 我重申，这一计划将使中国的地面部队作战顺利，而且肯定会使麦克阿瑟顺利前进，并会支援在太平洋上的海军的作战。而且，这会在战后使中国成为我们持久的友邦。

美国准将
陈纳德

3 陈纳德希望有一支单独的空军

罗斯福总统饶有兴趣地看完了这封信。他对此信印象颇佳，觉得它确实是一篇经典之作。

但是，他不明白陈纳德为什么无法实现其计划。罗斯福将陈纳德的信转给陆军部，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马歇尔立即致电史迪威，史迪威又让比斯尔了解此事。陆军部长史汀生极为恼火。

陆军部的多数首脑对陈纳德的计划反应冷漠。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告诉马歇尔说，他反对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在陈纳德的指挥下独立。

然而，在华盛顿，同意陈纳德见解的仍然大有人在，其中就有罗斯福总统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布金斯，还有劳克林·居里、托米·科克伦、宋子文和乔·艾尔索普等人。

比斯尔从史迪威处了解到陈纳德直接致函罗斯福一事，处处与陈纳德过不去。

11月22日，比斯尔给陈纳德发了一份“机密”电报。

比斯尔在电报中引用了一篇被他称为是“不偏不倚的观察家”的报道，说“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作为一集体的士气表面上看是高的，但这些人对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是不满的。例如，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人员说，‘从印度运来的东西缺斤少两’，‘第10航空队人员靠本国油水过活，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事实上是在中国挨饿’。”

比斯尔接着在电报中，像一个教师训斥小学生那样说道：

“你（陈纳德）应该告诉你的下属，你们从印度得到的给养已经相当不错了。驻印度的人也像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人员那样大发牢骚，因为那里的痢疾和疟疾盛行。”

陈纳德好不容易看完这份标着“机密”字样的电报，他简直难以咽下这口气。

结果还是给比斯尔回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说：

“我的下属对香烟短缺，酒价贵如琼浆，手下人员不能按时轮换去印度和美国，晋升一拖再拖，授勋嘉奖也很迟缓，还有缺少制服、佩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供应以及邮件，发发牢骚，这是很自然的事。”

就这样，从此以后，陈纳德再也没有听到比斯尔谈论此事了。

陈纳德不愿再与比斯尔摩擦下去，他希望有一支单独的常驻中国的空军，希望能够充分享有在中国进行空战的自由。

就在 11 月份，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

纽约，一栋豪华别墅里。

宋美龄会见了大权在握的哈里·霍布金斯。

宋美龄向罗斯福总统的这位“第一顾问”坦率声明，她并不需要史迪威将军，如果史迪威继续留在中国的话，这对中美之间乃至盟国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与此同时，宋美龄高度评价了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美国志愿队和中国空军特遣队在中国的作战行动。她希望罗斯福总统能给予陈纳德独立指挥的权限，以便能发挥其指挥天才。

霍布金斯本来就很钦佩陈纳德，经宋美龄这样一说，他对陈纳德有了进一步的好感。

宋美龄这次出访美国，一方面使史迪威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威信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另一方面，使陈纳德在华盛顿的印象得到了加深。

到 12 月时，罗斯福总统已明显倾向于陈纳德，答应给予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并同意补充 100 架飞机，以便对日本的军事设施和船只展开轰炸。

4 第 14 航空队

1943 年 3 月 3 日。

陈纳德由准将提升为少将军衔。

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将军，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 14 航空队，并且任命陈纳德为第 14 航空队司令。

阿诺德告诉史迪威说，陈纳德领导的第 14 航空队不受比斯尔指挥。

3 月 10 日，第 14 航空队正式成立。

第 14 航空队下辖 4 个大队，即：

第 23 战斗机大队；

第 51 战斗机大队，下辖 2 个战斗机中队；

第 308 轰炸机大队，下辖 4 个重型轰炸机中队；第 341 轰炸机大队，下辖 3 个中型轰炸机中队。陈纳德的司令部仍然设在昆明。

第 14 航空队开张后似乎很不利。

自从 1943 年以来，美国驻中国的空军部队，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艰苦奋斗着。

陈纳德分到的几架中型轰炸机，由于缺少燃料而停止了飞行。这些飞机不得不从桂林、零陵和衡阳撤回，以便进行维修。同时，也可让驾驶员得到休整。

3 月份的天气极坏。

第 14 航空队的飞机大部分都留在昆明和云南驿。

到了 3 月下旬的时候，尽管当时困难重重，缺这缺那的，陈纳德还是设法组织了几次出击，对越南的老街地区进行了扫射和轰炸，使日本人在那里开设的磷矿遭到了惨重的破坏。而那些带着炸弹去袭击的 P—40 战斗机，却没有受到敌机的阻截，全部安全返回。

4 月 1 日。日本空军攻打零陵。

陈纳德立即派出第 75 战斗机中队迎战，不多时便将日机打退了。

4 月下旬，陈纳德又派出第 74 战斗机中队，从云南驿起飞，沿着滇缅公路，对龙陵到腊戍段的日军驻防情况进行侦察，并且顺利完成了扫射任务。

4 月 24 日。几架中型轰炸机从昆明机场起飞，袭击了日本人在缅甸的南渡矿。

两天后，日本空军突然攻击云南驿，击毁了第 74 中队停在该机场的 5 架 P - 40 战斗机，同时还击伤了多架停在地面上的飞机。

几天后，敌方又出其不意空袭昆明。

警报网没有及时侦察到来犯的轰炸机。20 架日本轰炸机向昆明机场投掷炸弹，造成不小的损失，陈纳德的刚从新德里调来的新参谋长，爱德加·格伦准将，也受了轻伤。

第 75 中队的一组 P—40 战斗机，奉命起飞后牢牢盯住了这些敌机，结果他们击落了这批来犯敌机中的 10 架。

4 月下旬的一天，陈纳德正忙于接待一批新到昆明来的下属军官，突然收到史迪威发来的一份电报。

史迪威要陈纳德在当天下午 5 时赶到机场。

原来罗斯福、丘吉尔和各盟国参谋长，筹备定于 1943 年 5 月第一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这次会议的代称为“三叉戟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罗斯福总统收到蒋介石的一项请求：陈纳德应被召回华盛顿去解释一项从中国进行空中攻势的计划。作为答复，美国陆军部让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人都去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

关于这件事，史迪威在他 4 月 18 日的日记中写道：

接着传来了华盛顿的出名和召见。“小人物”打电报给罗斯福说他和陈纳德正在策划一个计划，因此一定要陈纳德去告诉总统此事。是乔治（马歇尔）向我通风报信的。我建议马歇尔召见我、比斯尔和陈纳德。他说，陈纳德反正要去。罗斯福将比斯尔的名字划掉了。乔治告诉我带一个比斯尔的下属人员。然后，我因此事责怪陈纳德，陈纳德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什么新计划，也不想去华盛顿，“小人物”是在谈陈纳德的所谓“6 个月内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的计划。我安排了先坐飞机走的计划，但很幸运，没有预先惊动温（史迪威太太）。我周一（4 月 19 日）会

见“小人物”，情况可能平息一下。一定要在月底到华盛顿，因为乔治·马歇尔此后就要离开。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经常称蒋介石为“小人物”。连陈纳德都感到意外，他说这次出差之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事后，陈纳德写道：

他（史迪威）下飞机时，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

“你的行李呢？难道你不打算走吗？”他咆哮着说。

“上哪儿？”我顶了他一句。

我们俩默默地彼此看了几秒钟。

然后，史迪威要我跟他到机尾后面，到其他军官听不到说话的地方。我最后总算使史迪威相信我根本不知道他要上哪里去。于是，他解释说，华盛顿召见我们，并威胁说，他怀疑，这全是我们背着搞鬼的结果。他要立即回印度，并希望我与他同去。

我完全感到意外。我获准与重庆的蒋委员长会晤并同意在两天内于卡拉奇与史迪威碰头。次日清晨，我即飞往重庆，但蒋委员长并不帮忙。他要我提出中国需要果敢的军事行动、美国的补给和一支不受新德里控制的空军。我告诉他，我们已有了一支单独的空军以及所需的大多数东西，就是要把补给运来。当日下午，我飞回昆明，准时与史迪威在卡拉奇会晤。两天之内飞了 2000 英里。

5 三叉戟会议

1943 年 5 月。华盛顿五角大楼。

代号为“三叉戟”的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里举行。第一天的会议由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主持。据说，这位部长所信奉的格言是：要善于跟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最欣赏的是准时和精确，为此，他曾经为某一炮兵团设计过一面团旗，上面画的便是一只大钟。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苏联人、法国地下组织的代言人、荷兰人、印度人……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或是戎装笔挺。

会议着重讨论、研究了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对策。可是，会议在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及至会议最后几天，亚太战区的战局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在会议上，陈纳德提出了从空中打击日本人的计划。史迪威也提出了他的缅甸战区的作战计划。

罗斯福总统对陈纳德和史迪威的计划都表示同意，可是又感到左右为难。

为难之处在于：美国通过驼峰航线提供的补给，无法满足两个作战计划同时实施，只能保障一个作战计划所需的补给，而另一个作战计划就得放弃。

陈纳德的空中作战计划有蒋介石的坚决支持。史迪威则掌握着中印缅甸战区租借物资的分配大权。结果在会议上形成了陈纳德与史迪威之争。

陈纳德与史迪威展开了唇枪舌战，双方各不相让，有时一方的发言

甚至为对方的激烈指责所中断。

史迪威争辩说：

“驼峰的运输飞行不可能发展到不需要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在利多公路未建好前，应将大部分空运力量让给云南的中国部队，以便支援他们攻打缅甸北部，这是一个应享有优先物资的作战行动。”

陈纳德据理力争，他说：

“缅甸之战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在公路未修好前，中国也许早垮了。在中国沿海攻占一个海滨城市也许是将部队运进中国以备日后去打击日本的较好办法。应作一切努力增加空运，支援第 14 航空队。该队能给日船只和海军力量以重创。发展印度阿萨姆河谷的空军基地应比利多公路要优先搞。”

陈纳德关于阿萨姆基地的看法，立即获得了英国人的赞同。这也许是英国人对曼谷、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长期打算，他们并不准备攻入缅甸。

接着，宋子文代表中国发言。他说：

“中国等不及修好利多公路，应立即增援陈纳德，提高驼峰运输量。”

宋的发言明显倾向于陈纳德。

此时，陈纳德向罗斯福总统面陈他的具体作战方案。

陈纳德首先估计了一下他需要多少架运输机，以便经过驼峰运送补给物资。之后，他分析了当时的战局，说：

“日本人目前并不急于在中国进行空战，而我们应该努力在那里逼使它打空战。”

他接着建议说：“届时，我的飞机可对付日本第 3 空军师。我打算在 8 月下旬用桂林的 B - 25 轰炸机，沿长江，沿中国海岸，在海防和海南岛，进行袭击船只的战役。入秋后，我将派 B - 25 去台湾海峡骚扰日本船只。再晚一些，我打算派 B - 25 重型轰炸机去华东，协助那里的飞机去打击台湾和东京—上海—南京地区。这样，估计到年底时，我们便可以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了。”

他提出了所需的飞机以及补给品的计划：

P—40 战斗机 75 架；

P—51 战斗机 75 架；

B—25 中型轰炸机 48 架；

B—24 重型轰炸机 35 架；

侦察机若干架；

经驼峰运输的补给品，7—9 月份为 4790 吨，往后是 7129 吨。

三叉戟会议拖了好几天。

会议最后谈到了第 14 航空队的计划实力。陈纳德除了有第 308 轰炸机大队之外，还有一支中型轰炸机大队。战斗机单位的实力将增加到 2 个大队。另外，提供给中国的 80 架战斗机和 40 架中型轰炸机，全部归陈纳德指挥。

罗斯福总统不顾马歇尔的反对，旗帜鲜明地支持陈纳德，让陈纳德单独指挥美国驻华空军部队。

事后，陈纳德描述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感受：

我到华盛顿后不久，即去找哈罗德·摩根中校。他刚到那里。他曾是驻华第 11 轰炸机中队的骨干。我硬要他当我的助手。他在开会那个月里是我能得到的惟一助手。在绝密会议开始时，他被挡在门外，我便没有助手出席会议。我们身处五角大楼那些穿着华丽服装的军事显贵的行列中显得十分寒酸。我是美国志愿队中被归并入军队而没有军服的人。我能弄到的是一套战前的橄榄色军服、一件灰色羊毛衬衫、一条黑领带，都不正规。摩根在驻中国空军特遣队里呆了很久，但他只有一条补得不错的中国裤子。我们同史迪威合用一个办公室。他的随行人员比我全部驻中国的指挥部的人还多，太不成比例。史迪威和他的助手穿着熨得笔挺的夏日制服（还加一大堆各种绶带在闪闪发光）坐在一旁。在房间的另一头是第 14 航空队的衣衫褴褛的代表。”

史迪威对会议的看法也有他的记述：

“（华盛顿）接二连三的让步已证实蒋介石的看法：他只要叫喊，我们便会屈服。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罗斯福在我们抵达华盛顿前就决定了在中国的空中行动。这符合英国人的胃口，他们不想参与缅甸之战。干吗他们要为加强中国而战，要是我们能负起打击日本的重担？他们反正会弄回缅甸的。

“结论势必是，丘吉尔把罗斯福控制住了，英国人想找一个轻而易举的办法，找一条捷径，绝不能让人转移了对欧洲大陆上的注意力。李梅之流对太平洋上的战争毫无兴趣。由于总统被催眠术蒙住了，他们可稳坐钓鱼台。

“罗斯福不让我唱我的调，我插了两次话，但丘吉尔老是离题，真没办法。

“因此，一切的一切全都用在空中攻势上了。罗斯福知道不可能每月经驼峰空运 1 万吨物资时，要了 7000 吨，并下令说要在 7 月间运。第一批 4750 吨给第 14 航空队，再送 2250 吨给地面部队。这会给日本人一点破坏，但同时会使地面上的作战努力削弱到可能失败的地步。这样，打下几架日本飞机又有什么屁用。”

6 《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陈纳德在华盛顿参加三叉戟会议期间，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他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我到华盛顿的那一天，正是 4 月 29 日，日本人又到了昆明，那一次我们又因为失去联络而误事，我们那位新任司令官唐·李昂上校和一位飞行员都殉难，我的参谋长格伦将军也受轻伤，汽车场完全被炸毁。当我接到格伦将军的来电时，几乎马上就想回到中国去，可是那冗长的会议把我拖住了一个多月。除了会议忙之外，还有宴会、鸡尾酒会、演讲、被人画像，以及设法摆脱那些慕名来访的人，想写我的传记的作者等等，使我无法分身。我的约会记录中包括了许多要人的名字，如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马歇尔将军、菲律宾总统奎松、罗斯福私人秘书霍布金斯、英国参加华府英美联合会参谋部代表狄尔、美国战时生产局长纳尔逊、宋子文博士、飞机厂商莱特、名专栏作家李普曼、前驻法驻美大使蒲立德、前驻日大使格鲁、海军部长诺克斯、次长福莱斯特、老政治家巴鲁苏、财长摩根索、陆长史汀生以及

大批高级将领。1943年的华盛顿对于那些自前线归来的将军真是极备崇敬，在社交上更是忙个不了。我自己惟一引以自慰的是，当6年前我离开华盛顿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退伍上尉，如今返里，我已是尽人皆知的少将了。同时在陆军部里那些从前反对我的人，现在对我都另眼相看，而且他们对我的礼遇看起来还有点可笑。

正如陈纳德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所承诺的那样，陈纳德开始在7月下旬集中力量攻打日本人的沿海船舰。

陈纳德清楚地知道，海运是日本生命线的主动脉。如果能够炸沉在台湾海峡间来回穿梭的日本油轮和货船，那么敌人就会伤筋动骨了。

到7月底，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下，炸沉了敌方4.2万吨的货物，击坏3.5万吨货物。

8月，罗斯福总统批准了陈纳德为中国空军的参谋长。

中国人在紧靠昆明机场的地方，为陈纳德新盖了一座瓦房，并告诉他，抗战胜利后如果他愿留在中国，这就是他永远的家。

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轻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陈纳德整天埋头于文件之中。

他黎明即起，早饭后第一件事，便是给最紧急的无线电报复电。之后，他要写一大堆信函。

他的秘书汤姆·特恩布尔回忆说：

“将军常做的一件事是在中午吃过中饭后小睡一下。这是他的老规矩，他吃完中饭，舒少校即溜回到译员办公室去午睡一会儿，将军在那里有一张椅子，他老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睡觉。他先抽上一支烟，在掐灭了烟之后，他的脑袋就这样垂了下去。在那个时候，我要么把猎狗乔放在我们那里的沙发上，要么把它放在我的膝部，使它不出声。

“大约有20至25分钟，你一点也听不到那办公室里有什么声音，将军坐在他的椅子上，完全放松睡着了。突然，我会听到他清清嗓子，点燃一支‘骆驼牌’香烟，他深深吸上一口烟，目光远视，那样子仿佛他在使自己渐渐清醒过来。然后，他摇一下身子，站了起来，接着我便去喊醒舒少校，然后我们又恢复原样了。”

秋天伊始。

工作之余，陈纳德最喜欢的就是打猎。他经常去基地附近的湖边打鸽子和水鸭子。他说，最美的早餐是吃烤水鸭，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他的家乡路易斯安那州的狩猎委员会的朋友，会不断地送给他一箱又一箱的蛇肉罐头，他用这些蛇肉做点心，经常犒劳他的下属。

有时，家里人还会给他寄来玉米粉。这样，他又可以使他的部下吃到热的玉米面棍了。

陈纳德十分爱好体育活动。有时，在昆明基地举行垒球比赛，他不是当投手，就是当他部下的裁判。一次，感到吃亏的一队对他的裁决提出异议，用词很激烈，而且报以嘘叫声。他不会动气，从不计较。

到了年底，家里给他来信说，他的6个儿子都在部队各兵种里找到了工作。

杰克是阿留申群岛上的战斗机大队队长，麦克斯在空运勤务部当交通调度员，查尔斯是驻英国P—51机的驾驶员，佩特森是航空队无线电机修员，大卫是空校学员，罗伯特在美国的“赫伦娜号”军舰上。

这使陈纳德感到很舒心。

在陈纳德的办公室里，高级军官和政府显要川流不息地拜访他。

美国各通讯社，欧洲和近东的记者，还有世界各大报纸的采访者，都蜂拥而至前来采访他。

美国各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商，为了取得美国志愿队和陈纳德生活经历的独家报道，而不断地要求陈纳德签订协定。

对于这些要求，陈纳德都一一婉言谢绝。他说：

“现在还要打仗，希望你们在战争结束后再来找我。”

曾经在美国志愿队担任过第23战斗机大队队长的罗伯特·斯科特上校，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

斯科特上校的这本书，谈到了陈纳德在美国志愿队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中的功绩。好莱坞买下了该书的电影版权。而陈纳德对电影中有他的形象并不感兴趣，他认为，史迪威肯定会抓住他参与电影的事，作为批评他本人的一个依据。

11月7日，陈纳德就写信给斯科特说：

“你不满意我同意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一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我感到抱歉。我曾认为，在上次给你的去信中已阐明了我的立场。我仍在忙于打击敌人，不想让我的名字用来去宣传一本书或一部电影，因为书是谈你的事，而不是我的事。我看不出我有必要在银幕上出现超过3分钟。我除了受到日本人的围攻外，还受到其他敌人的围攻。要是把追求出风头的罪名再加在我头上，那么这个罪名就可能具有决定性质的了。但是，考虑到你要求的真诚，我授权你和华纳兄弟电影制片厂将3分钟增加到5分钟。我还坚持我提出的其他条件。”

结果，演员雷蒙德·麦赛只扮演了陈纳德几分钟。

陈纳德在昆明期间，还经常收到前志愿队驾驶员和地勤人员的来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愿意重新回到远东工作。

乔治·帕克斯顿从纽约来信说，他在长岛拉瓜第机场上的美国出口航空公司工作，目前正忙于成立“飞虎协会”，把其他前志愿队队员组织起来，出版一本美国志愿队年鉴。

帕克斯顿在来信中还说，他参与了正由霍茨上尉主笔的《跟随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故事》一书。霍茨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前记者，曾当过空运勤务部的上尉。

12月，陈纳德十分震惊地发现，他是《时代》杂志封面报道的对象。

他的照片端端正正地印在1943年12月6日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上。照片上的陈纳德，看上去面色冷峻，神情严肃，紧抿着嘴，目视远方，若有所思。背景是卡通王吉尼斯为其设计的飞虎队徽标：一只猛虎从天而降，飞翔中的双翼意味着一个表示胜利的V字，落地时仿佛还挟带着风声。

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的巨大宣传力使陈纳德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不久陈纳德便成为世界知名人士。

第七章 恋歌

1 陈香梅

44年，中美空军对日本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中反击战。中国空军第1大队、第3大队、第5大队，美国第14航空队，以及原“飞虎队”的部分队员，共同组编了中美空军混合团，仍然由陈纳德统一指挥。

中美空军混合团驻扎昆明基地。

10月18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立即调回史迪威。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0月19日，斧头砍了下来。马歇尔来电说我‘被调回’。那个土皇帝暂时得逞。魏德迈将指挥美驻华军队。中缅印战区分开。罗斯福就这样后退了。大家都对华盛顿不满。”

陈纳德在昆明获悉这一消息时，却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的对头从此在中国消失了。

事后，陈纳德曾谈到史迪威离开中国时的情景：

“我对史迪威的离开并不感到难过……史迪威的骤然离去为中美开始有效的高级军事合作扫清了道路。变化真不小。史迪威才离开不到6个月，魏德迈和他的主要战地司令官罗伯特·麦克卢尔少将已缔造了一支真正的美中地面部队，史迪威一直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基础。史迪威老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地司令官。他在干这一行时显得最得意，也最有效率。从个人来说，史迪威是位勇将，喜欢战地打仗的艰苦磨练，而且具有率领部队出生入死的罕有才能。这对一名师长来说倒是很理想的性格，但绝不是一位战地司令官应具有的性格。人们常说史迪威是‘军中最好的四星营长’，此话虽刻薄，但不无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女人，一个中国女人，向陈纳德走来。

她就是陈香梅。

1935年初冬，年仅10岁的陈香梅，和她的姊妹们跟随父母，离别了故都北平。

除夕之夜，陈香梅一家在广州同祖母团聚。

春节一过，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就将妻子女儿送到香港，他自己便启程去美国新墨西哥州赴任。

陈香梅进入香港圣保禄女书院。她只念了两年，便完成了初中学业。

1938年，陈香梅考入真光女中，继续念高中。

这年的圣诞节，陈香梅收到父亲寄自美国的一封长信。

陈应荣在信中谈到一个美国退役上尉陈纳德在中国作战的事。当时美国报纸谣言纷纷，说陈纳德在中国匿名作战，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案”，是不允许的。但是，陈纳德毫不畏惧，写了一封信给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的蒙哥马利广知报。他在信中写道：

“中国一直以为美国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同情是无私的。

“中国此时正为太平洋在作战（信不信由你！），而美国的官员和人民，就在日本屠戮上海之始，急切地离开了中国。此种情形，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了解。

“我很奇怪，我为什么竟会被认为在匿名作战？难道我不敢用我的真名来表示愤恨这场侵略战争吗？对于为什么我20年来如一日地献身于空军，我实无心要再作声明。现在我更毫无犹豫地要负起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对一个和平民族的侵略的反抗责任来。所以，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对可以永远直呼我的真名字！”

大概是父亲的这封信，使陈香梅第一次知道了陈纳德这个异国人的名字。

1940年，母亲廖香词因患绝症撒手人寰，之后不久，祖母和二婆相继去世。

1941年圣诞节，香港陷落。

“宝宝，我走了以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妈就仰仗着你帮助照顾这个家了。”

宝宝，这是外公对陈香梅的爱称，母亲也这样唤她。

母亲临终时的嘱咐，又一次在陈香梅的耳边响起。

1942年5月末的一天。陈香梅同姊妹们决定逃离香港。她们在沦陷后的香港苦苦地呆了近半年时间。往事不堪回首。

她们从九龙的天星码头乘船去澳门，再从澳门进入内地，然后去桂林。

一路上风餐露宿，千辛万苦，一个半月后她们终于到了桂林。

然而，桂林也并非和平的绿洲，不久便遭到日机的大轰炸。

经过种种艰难的跋涉后，陈香梅姊妹们又辗转到了昆明。此时，大姐陈静宜已经在第14航空队当上了护士。一日，陈静宜告诉陈香梅说，父亲从美国来信要她们全都去美国。

陈香梅接过信，匆匆浏览了一遍后对她的姐姐说，她宁愿留在中国吃苦，也不想去美国她们的父亲那里，因为她已经18岁了，她相信自己能独立生活。

不久，陈香梅的4个妹妹先搭乘班机到加尔各答，然后再飞往美国。

陈香梅和大姐仍然留在昆明。

这时，岭南大学的一部分已迁至昆明，陈香梅在这里紧张地完成大学最后的学业。

同时，由于大姐的朋友帮忙，陈香梅在课余给一家富商做家庭教师。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陈香梅大学毕业了。

一次偶然的机，陈香梅迈入了中央通讯社的大门，成为中央社第一个女记者。中央通讯社的总部设在重庆，社长是萧同兹先生。中央社昆明分社的主任是陈叔同先生，总编辑是邵翼之先生。

陈香梅上班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人工译码。

那时所有的中文新闻稿件都是以电码传达，每个字都有相应的电码，愈是复杂的字，数目愈大，新闻词汇大约有9000字。这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起初，陈香梅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以后经过反复训练，废寝忘食地强记，到第三周，她便能熟练地掌握3000左右电码，使译稿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往后，在子夜时分就可以完成全部工作。

电码译成中文后，还得校对文稿的内容，校毕再给每则新闻加上标题。

几个月下来，陈香梅对这项工作已经娴熟自如了，而且做得津津有味。

忽然有一天，总编邵翼之先生通知陈香梅说；

“从明天起，你接受采访任务。第一项任务嘛，你去采访第 14 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他明天在总部开个新闻发布会——”

2 第一次采访

1944 年初冬的一天。天气温暖，晴朗。

古城昆明。

这个中国最西南角落的城市，林荫大道上，拥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木轮马车，自行车，人力车，汽车……还有成群的猪和牛，在牧人的驱使下，悠闲漫步；木轮车发出的吱嘎声，汽车的喇叭声，锣鼓声，叫卖声……仿佛组成了一首交响曲。

“我希望你将陈纳德少将和他的部下们，亲切地予以人性化的姿态出现。人们都称他为‘飞虎’，他有一张倔强的面孔，但他却是仁慈而勇敢的。他曾击毁了很多日本轰炸机，而拯救了万千中国人的生命。我要你采访第 14 航空队和全队工作人员的新闻，让我们的人民对他们和他们正在做的一切，有所了解，有所赏识。你的英文已够好了，我想你将不致遭受任何困难。”

坐在人力车上的陈香梅，一直在琢磨着邵总编昨天对她说的话。

人力车夫的脚步放慢了，车子停在一幢泥土色的、古老的石头建筑物前。

第 14 航空队总部到了。

陈香梅跳下车子，掏出崭新的记者证，递给门口的中国卫兵，旋即被准许进入。

会议室里，中外记者围着一张长形的疤痕累累的木桌，舒适地斜靠在椅子上。他们全都是男性，似乎正在谈论着什么。

“安娜，请进。”一位瘦长的男子面露笑容地喊她。

原来是中央社的一位同事，鲍勃冯。

“先生们，这是安娜·陈香梅小姐，我们新来的女记者。你们看，我刚才没有扯谎吧！”他一面向大家介绍，一面让陈香梅就座。

陈香梅觉得一阵耳热，颇有几分忐忑不安。

大家刚坐定，会议室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旋开。一个高挑瘦削、满头黑发的美国军官，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老板！”鲍勃低声对陈香梅说。

“将军！”陈香梅喃喃道。

陈纳德身着飞行皮夹克，两颗少将级银星在肩头闪闪发亮。紧随他身后进来的还有一位中国上校，两个美国军官，一位上校，一位中校。

将军和他的随员们在主位就座。

霎时，会议室里寂静无声。

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开始用美国南方腔调的男中音，慢吞吞地向大家致意：

“午安，先生们！”——

“以及女士！”他似乎发现了在场的陈香梅，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这时，陈香梅发现，过去在新闻照片上看到的陈纳德，只是他的若干形貌，并无传神之处。而此时她看到的是一张遍布深刻皱纹的脸孔，一对深沉的棕色眸子流露出坚忍的神色，一个倔强的下颚，看来强韧而果决。她对他的瞬间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陈香梅被陈纳德深深地吸引了。

她记起来了，最近有一张报纸在谈到陈纳德时说：丘吉尔第一次看见陈纳德时便问他的随从副官：“那个美国准将是谁？”

副官告诉丘吉尔，那是“中国的”陈纳德。

丘吉尔惊叫道：“这样的一张面孔！感谢上帝，幸亏他在我们这边！”陈纳德开始介绍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在中国战场的战况。接着，回答中外记者的各种提问。新闻发布会结束了，陈香梅还痴痴地坐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却寥寥无几。

“安娜，你的笔录并不多。如果你写稿时需要帮忙，请来找我。”鲍勃冯说。

“谢谢你，鲍勃。”神不守舍的陈香梅答道。

陈香梅起身，正要离开桌子。

陈纳德将军大步流星地向着她走来。

“是陈小姐？陈香梅小姐？”将军一边问，一边伸出他的右手。

“是的，将军。”陈香梅连忙伸出小手，紧紧握着将军温暖的大手。

“刚才何登中校告诉了我你的名字。你父亲陈应荣先生最近来信给我，问及你姐姐静宜的近况，他还提到我可能不久就会看见他另一位千金。”

陈香梅一颗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了。

“我真高兴见到你，将军。静宜姐曾告诉我不少有关你和第14航空队的事。”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假如你不急于赶回去写稿，跟我们一同吃杯茶好吗？”“我准备写篇特稿，我有时间的，我很喜欢喝点茶。”于是，他们离开会议室，进入隔壁一间较小的房间。小房间里，已经坐了几位中国和美国军官。陈纳德一一加以介绍：

何登中校，新闻官；金特莱上校，第14航空队的军医；

舒伯炎上校，将军的翻译；

“陈小姐的父亲，我在旧金山时认识的，曾托我照应他的女儿，”将军解释说。

“听来仿佛是件战时最佳任务嘛，”何登中校调侃道。众人哄笑。将军也笑了。

“我请陈小姐来喝茶，是为了使她明了，我们是友善可亲的，正如我们有工作能力一样。我认为，倘若她喜欢我们，她必会为我们写出一些好故事，而且都是事实，”陈纳德说。“我要尽力为之，将军，我十分满意我的工作，而且，我还相当年轻，又是晚辈，新闻从业员似乎无需太拘泥形式，请叫我安娜吧。”

陈香梅刚说完，何登中校就接上话茬，打趣地说：“我想要喊你‘亲

爱的安娜’。”

众人又一次哄笑。

回到办公室，陈香梅一下子难以平静下来。直到下午 5 点半钟，她才写好第一篇新闻稿。

当她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缕奇异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仿佛一个挥不去的影子，不时闪现在她的面前；又仿佛春天走进了 19 岁姑娘的心房，吹来了崭新的希望与期待。

3 “将军，您找我？”

邵总编过来告诉她，说她姐姐静宜来电话让她去一下。来到静宜的住所，陈香梅便兴冲冲地告诉姐姐说：“静宜，我今天见到他啦。”

“谁？”静宜睁着圆圆的大眼问。

“陈纳德将军。”

“啊！他人很好，是不是？”静宜漫不经心地答应着。这时，陈香梅察觉出气氛有点不对头。

静宜的宿舍似乎很乱。衣橱敞开着，地毯上放着两只皮箱，一只橄榄木做的褐色军用箱，像是在收拾行装。“告诉你吧，爹地来信也希望你到加州去，你考虑过这件事吗？”静宜右手举着一只浅蓝色的信封说。

陈香梅接过信，仔细读了起来。

父亲在信中几乎是在下“最后通牒”，如果她执意不去美国，父亲将会断绝对她的任何经济援助。

陈香梅果断地摇了摇头说：

“我想过去美国这件事，但是我现在不想去，我愿意留在这里，为战争稍作贡献。”

静宜没有开口。陈香梅接着说：

“再说，我到底学的是新闻，也被训练成一个女记者。同时很幸运获得一份很好的工作，并被派到一个很吸引人的部门——陈纳德将军和第 14 航空队。如果为了在美国那个不可预知的前途，而骤离此地，对我而言，乃是一桩愚蠢的事，因为在那儿的新闻界中，我需要与当地的美国人竞争。”静宜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我了解，我一点也不责备你。我也希望你不要怨我。人，常常要作出妥协和让步，我不想太伤爹地的心。唉，因为你一定不会走，所以我一定得走，懂吗？”姊妹俩说到离别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

“陈纳德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安娜。”

静宜试图改换话题。她接着说：

“因为有他，整个团体变得生气勃勃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和勇气，决定了一切。我非常钦慕第 14 航空队的每一个队员，而陈纳德却是一朵火花，一份感召。”

“正是如此，我也被他震住了，险些写不出一个字！”陈香梅抑制不住地插了一句。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爱上他了。”静宜狐疑地看着她说。

陈香梅两颊绯红，喃喃说道：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不知道……”

冬去春来。

陈香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席社交活动。她在这些非正式的场合，同陈纳德将军有了更多的接触，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里写道：

这些简短的谈话，在一种社交的气氛中，常使将军表现得更为轻松。为适应这种场合，我们并不局限于谈论本行，而是一般性的事物。他的学识、理解及智慧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我一直珍惜我们的接触。但从1944年至1945年，我与陈纳德将军从无“约会”一类的事。

4月的一天。倾盆大雨。也许是天意，中午时分，陈纳德收到了陈应荣从美国寄给他的一封信。

原来，陈应荣在信中恳请陈纳德，说服他的女儿陈香梅去美国。

信的结尾写道：

“说来惭愧，对生性倔强的小女，为父的是一筹莫展了。我从静宜处得知，她崇敬您，而且一定会听您的。在此，让我先谢谢您。”

陈纳德看完最后一个字，他笑了。

难道陈香梅真的会听他的？

他有些冲动。

立即接通昆明分社的电话，邵总编告诉他，陈香梅外出采访了。

他忙问去哪采访了。

邵总编说，这时间大概采访完了，上老城墙根排档茶铺吃过桥米线呢，记者的中饭多是这样打发的。

他放下电话，连忙吩咐司机，开车去老城墙根寻找陈小姐。

雨不停地在下。此刻他的心却怦怦乱跳。他又燃着了一支“骆驼牌”香烟。

“将军，您找我？”陈香梅已冲进了办公室，不安地问。陈纳德怔了一下，指指桌上的信，说：

“喏，你父亲给我来了信，你先看看，坐呀！”陈香梅急忙抓起信就读。原来却是老调重弹！她凝视着窗外。

窗外是一片茫茫烟雨。

良久，她转过身来。

一只猎犬跟随陈纳德的身后，摇晃而行。

“乔，这是安娜。”陈纳德俯视着他的小猎犬。这只狡黠可爱的小动物，走到陈香梅的跟前，带有近似人的表情，抬头望着她，同时用一种试探性的友情，摆动着它的小尾巴。

“陈香梅小姐，你如果不想去美国，就不要去，”将军对她说。“你已不是小孩了，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啰，我的境况跟你一样，家里人都希望我回美国，可是，自己的事自己抉择，我不违心。我想，我懂得你。”将军继续说道。陈香梅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

她边啜泣边说：

“可是……父亲不懂得我……更不懂得母亲……母亲去世的情景……我永远无法忘记……”

将军微微弯下腰聆听着，时而点点头，说：

“我也一样。5岁时，我的生母吐血而歿，呵，我忘不了那悲惨而鲜明的一幕。15岁时，我的继母又弃我而去，她是那样地健康、开朗，可是疾病也夺走了她。安娜，我历经了两次丧母的苦痛，人生，有时是怨不得谁的……”“你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将军改换了话题，问陈香梅。“屈指算算，整整六年半呢，从1936年到香港，1942年逃离香港止。”她答道。

“我自从1937年来华后，曾多次到过香港，喂，为什么我在香港总没遇到你？”他说。

“也许遇到过，可我们相见不相识。”她笑着答道。

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

4 离别

自从史迪威离开中国后，罗斯福总统任命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职务。魏德迈于1944年10月31日到任。

魏德迈不像史迪威那样对人冷嘲热讽，关系紧张。他既讲策略，又注意小节，待人坦诚，也很公正。因此，他和陈纳德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当魏德迈和陈纳德在1944年11月向日军发动攻势，以便夺回在中国的主动权的时候，陈纳德领导的第14航空队，一共拥有17473名人员，535架战斗机，109架中型轰炸机，47架B—24重型轰炸机。下辖36个战斗中队，分属第68混合联队、第69混合联队、中美混合联队、第312战斗机联队。

截至1945年5月15日，第14航空队在半年的空战中就歼灭日机1634架，我方仅损失16架飞机。

到了6月，敌方已处于全面撤退的状态。

然而，陈纳德所面临的困扰，除了正面的日本人以外，还有背后来自华盛顿的。

史迪威回到华盛顿以后，他便竭力说服马歇尔将军，他和中国官方之间的摩擦，皆应归咎于陈纳德。

陈纳德此时已得悉有人正在活动，想要调动他。而他却忙于战事，无法予以置辩。

6月20日，魏德迈在成都召集所有在华的美国将军参加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很严格，规定“只能耳听”，不能作记录。

魏德迈将军宣读了阿诺德的特别信件。

信中说：

“陈纳德将军在中国已呆了很长的时间，以最少的资源打一场防御战。补给不足和由此产生的游击式战争应变成一场现代化的打击风格和进攻性的空中力量。我坚信，彻底改变你们战区的作战方法并转而采用现代化的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你若同意陈纳德将军及早从中国战区撤出，我将不胜感激。他应利用现在给身体上不合格的军官的退休优待（即他们的薪金不必交所得税），否则，他会回到退休军官的行列之中，其军衔将保持退休时原封不动的状况。”

原来这次秘密会议的目的就是请陈纳德走路。

在此之前，马歇尔已于6月8日寄了一封信给魏德迈。马歇尔在信

中明确表示，让斯特拉特迈耶领导中国战区的空军。

魏德迈只得执行命令，别无选择余地。

陈纳德此时对这场把戏已毫无兴趣。7月6日，他提出了辞职请求。斯特拉特迈耶立即批准，同时任命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

陈纳德辞职的消息，如同晴天一声霹雳，震惊了中国朝野。

告别仪式在重庆举行。

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中记叙了这次告别仪式：

“陈纳德将军在重庆所接受的告别仪式，是过去甚至以后所无法比拟的。估计约有两百万的人民塞满战时首都的街道。他们在窗前，在凉台向将军挥手欢呼。将军的座车无法穿过群众拥阻的街道，司机关闭了引擎，由人们用手来推动车子。“这一天，重庆疮痕累累的建筑物上都饰以五光十色的旗帜——丝制的，鲜亮的，书有口号或标语的旗帜，许多绣有飞虎的徽标。

“群众将汽车推到一处广场前。那儿有一搭好的木制高台，缀满了旗帜及飞虎徽标。将军穿过松柏树枝和鲜花扎成的拱门，从善意的拥挤里走上高台。

“整个早上直到黄昏，千千万万的人群行经将军前。许多人送他中国卷轴、绣花锦旗以及其他礼品。大家都循外国习惯与他握手。

“晚间，官方酬谢饯别宴上，蒋委员长以青天白日大勋章授赠陈纳德将军，这项授勋对外国人士而言，尚属首次。魏德迈在陈纳德将军胸前的殊勋金十字勋章旁，别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

告别重庆后，陈纳德访问了第14航空队的主要基地，白市驿、西安、成都、陆良，最后是昆明。

在昆明，黄仁霖对陈纳德说：

“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那么博得中国的人心。”

黄仁霖还告诉陈纳德，从昆明到机场的路已正式改名为“陈纳德路”。

7月31日，陈纳德接到了美国空军司令部发来的命令：

事由：命令

致：陈纳德 01090USA 第14航空队司令部 AP0627

1. 从1945年8月1日起，你被解除中国战区第14航空队 AP0627 的职责以及不再担任中国战区的职务。你将按第14航空队所颁发的旅行命令回到美国。抵美后，向美国空军司令部报到。

2. EDCMR 1945年8月10日

3. 你回美时，可优先搭乘 CI—US - I—10623—AAF。

魏德迈将军

在第14航空队的驻地，最后一个送别晚会还在进行。队员们一个个争取时间，向陈纳德倾吐惜别之情。晚会临近结束时，陈香梅起身同将军告别。

“我请王司机送你回家。”将军边说边陪她去停车场。“将军，明

天我到机场给你送行。”陈香梅说。“好的，可是那里也许不是最好的道别处。”陈香梅望着将军，信任地走上前去。将军伸开两只手臂，拥抱她，柔情地吻她。

将军告诉她说：

“我要回来的。”

第二天，8月1日。陈纳德登上C-47运输机，向前来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飞机在碎石跑道上疾驶，不一会就腾空而起，飞向远方。

5 重逢

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扔了第二颗原子弹。

陈纳德是在路易斯安那州金德老家，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他感到非常兴奋。

几天后，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陈纳德想到自己不能参与最后的胜利，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在《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我满怀怒火和失望离开中国。8年来，我的惟一的抱负是打败日本人。可现在，我被剥夺了参与最后胜利的权利。在战胜日本那一天，我多么渴望能登上停泊在东京湾里的‘米苏里号’，观看日本人正式承认他们的失败。”

回到家里不久，陈纳德就感到很空虚，无所事事，坐卧不安。

他的几个儿子都在部队。他的妻子内尔，差不多独自一人守着老屋，只有大儿媳与她在一起。她的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堂和慈善事业上。

陈纳德回到家时，总觉得内尔对他很冷漠，而且话不投机，甚至格格不入。想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很少写信。起初，内尔的来信多半是谈论孩子的事。等到孩子一个接一个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之后，即使连这样的消息也没有了。而陈纳德在中国呆得愈久，给内尔写的信也愈少了。

时间一久，他俩都感到在一起生活挺别扭的。

一日，内尔探了一下陈纳德的口气，问他是否有离婚的可能。陈纳德表示同意这个想法，同时建议她去询问他们的家庭律师，看看能否让律师起草一份令双方都满意的文件。

过了一段时间。

内尔告诉陈纳德，他们的离婚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家庭律师要他俩出席法院的裁决。

解决的办法是，每月从陈纳德的退休薪金中付给内尔250美元。此外，位于康科迪亚教区拉文林区和康苏洛种植园内的几块土地、建筑物及其设施，均归于内尔。陈纳德则保留了拉蒙别墅的一半利益及建筑物，内尔在有生之年仍可使用该建筑物，除非她再嫁人。他同意不修改他的退伍军人人寿保险金（1万美元）的受益者（内尔），还给了她1万美元现钞和两张2年内可兑换的5000美元的期票。对于他俩共有的存款、股

票、债券、一些额外的人寿保险，全都归内尔所有。

他在文件上签完字。之后，他坐上一架去华盛顿的飞机。此时，他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又成了一个单身汉，虽然穷了许多。

在华盛顿，陈纳德探望了不少熟悉中国、来自中国的朋友。他打算重返中国，成立一家航空公司。

正好，这时他的老朋友惠廷·威劳尔从菲律宾回来。俩人一拍即合。

原来威劳尔曾经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职员，他在这个公司里与宋子文和其他美国人一起，为创建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做了不少工作，后被派到中国，又帮了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很大的忙。因此，这次他们重新合作到中国搞空运，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1945年12月，陈纳德和威劳尔一起离美赴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话分两头。

自从陈纳德将军离开昆明后，陈香梅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8月末的一天，昆明分社陈叔同主任突然把她叫进办公室。

“你喜欢到上海去吗？”

“喜欢，我当然喜欢这趟旅行。”

“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长期的调职，总社准备在那边成立分社，要我在昆明分社选择一位记者，我已经选了你。而且你也晋级了。”

“谢谢，我很高兴，太谢谢您了。”

自从陈纳德将军离开后，陈香梅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抗日战争业已过去，静宜姐去了美国，陈纳德也远在美国，昆明已无可留恋。陈香梅多年未谋面的外祖父母也都在上海，这下又可以见到他们，或许可以与他们同住。陈香梅越想越高兴。

3天后，她搭乘第14航空队的一架C-47运输机，向东飞去。夜幕深垂时，飞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1945年，圣诞节的第二天。

陈香梅正在翻阅报纸时，一条简短的美联社电讯突然映入她的眼帘：

陈纳德少将已在旧金山搭机，首途上海。他拒绝向新闻记者透露此行的任务。

“他终于回来了！”陈香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3天后，陈香梅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江湾机场，准备迎接陈纳德的到来。

陈纳德缓步走下飞机，一眼就发现了记者群里的陈香梅。他俯身向前，在陈香梅的耳边低语道：

“安娜，今晚同我一起吃饭，我打电话给你。”国际饭店，14层楼。

灯光朦胧。管弦乐队正在演奏流行歌曲：《追忆当年》。“我真想你，小东西。”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第一次陈纳德这样喊她，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而且专属于她。

“哦，我有很重要的事得告诉你。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要回来，现在我已经回来了，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很慎重。

侍者端来两杯鸡尾酒。

陈纳德接着坚定地说：

“我们离婚了。就某方面说，我最早来中国时，真正的离婚似乎已经发生了。是8年前，安娜。战争中的8年，远离家乡一万二千里，此

时我已了然，我的工作将在中国。而我的妻子再度表示不愿意离开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家、她的朋友、她的邻居，而和我一起来到此地。我不责备她。多年前她没有来，我也不责备她。我们有着不同的兴趣，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陈香梅静静地听着，默然无语。

“小东西，过去我不能告诉你，但我感觉你必然会知道，我爱你，而且已爱你很久了。”他再次握住她的双手，说。她的心跳在加速。

“我要你嫁给我。”他频频发起进攻。

她感到有点昏眩。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中外联姻，世俗观念，舆论压力，年龄悬殊……她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呢。

她没有轻率地点头。

“你给我一点时间，将军。我需要时间来考虑。”她最后说。

6 民航空运队

在上海稍事停留后，陈纳德继续北上，到南京、汉口、重庆等地考察。他看到战后的中国，到处是饥荒，满目疮痍，交通运输更是陷于瘫痪状态，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在中国搞空运的决心。

他事后写道：

“在几周内，我旧地重游，重新踏足于前三年所走过的路，溯长江而上，从上海经过南京、汉口到重庆。我所见到的中国所遭受的破坏和饥谨对一个十分了解中国惨痛史的观察家来说也是十分可怕的。在以前日本占领的走廊地区——汉口以南，除长沙外，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遭摧毁。长沙市一半是废墟。桂林、柳州、零陵和衡阳只剩下了焦土——是中国人烧的，后来又挨过我们的炸弹，之后又遭日本人撤退时的破坏。一些极小的城镇也都夷为平地。

“这不是一个由于年成不好而引起的普遍饥荒。这是一场持久性的灾难，尚看不到任何救济。日本人在撤退时把乡下的所有食物全都弄走。现在，中国人只好剥树皮，吃野草。稻草被视作珍馐。市场上出售观音土，因为在这毫无营养的东西里加上了一些东西可作充饥之用。这些废墟里根本看不到野狗和老鼠，因为它们早被饥饿的人吃掉了。日本人杀黄牛和水牛充饥，吞食了大批粮种，使中国农民无法播种新的谷物。一家人脖子上套着水牛的桎梏，力图拖动笨重的木犁、耙子耕耘稻田，可他们半饥不饱的身子无法经受得住这种劳力。这都发生在一个正常情况下可以生产足够稻米，供一半中国人吃饱的地区内。

“不论我到哪里，我听到同样的事，交通是最燃眉之急的事。战前内河航运的一半船舶吨位在战争期间被击沉。要进口木材才能造船，而中国没有东西出口，就不可能进口。铁路所遭到的破坏需要三五年的齐心协力，不打内战，才能恢复正常运输。公路也是连年失修，没有几辆卡车在服务。空运少得可怜。全中国只有40架商业用的运输机。战后给中国空军的120架运输机正忙于给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提供补给，不可能用于救济工作。

“剩下的一点运输也如同老牛拉车。现代化运输缺乏使商业瘫痪，救济活动无法奏效。中国的经济生活在迅速倒退。只在少数沿海城市才

有一点贸易。联合国的救济品横渡太平洋后遇到了中国港口的薄弱环节。重要物资在沿海的仓库内堆积如山！无法运到内地，而内地却有千百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到 1946 年 1 月底，陈纳德几乎接触了所有该接触的人。

他打算在中国组建航空公司的想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不仅有政府内的要人，还有在华的美国顾问。

当时在中国，已经有两家航空公司在运作。一家是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政府和泛美航空公司共同所有，拥有 30 架 C - 47 和几架 C—46 运输机。另一家是中央航空公司，全由政府所有，它有 12 架 C - 47 运输机。

2 月份，联合国救济总署突然要求陈纳德提出一个空运计划，将堆积在中国各港口码头的救济物资，运送到中国内地的灾区去。

原来陈纳德在美国时，曾经就在华建航空公司一事，同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议过。拉瓜地亚以前也是一位飞行员，他在 1946 年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后，还没有忘记他同陈纳德的谈话。于是，他很快将此事通知了驻中国的分支机构。

经过多方奔走、筹措，陈纳德和威劳尔终于在 1946 年 10 月 25 日，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签约，成立了行总航空运输公司。这家新航空公司，又称为民航空运队。

1947 年 1 月 30 日，民航空运队的首次航班开通了。

一架 C—47 运输机，载着货物和一辆吉普车，从上海飞往广州。陈纳德也坐在这架首航的班机上，亲自压阵。

战后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机场，也没有导航设施，甚至连地对空的通讯也不存在。因此，飞越没有航标的中国上空，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几周前，中国航空公司的 3 架飞机就在圣诞节那天坠毁在上海的浓雾中，72 名乘客不幸遇难。1947 年 1 月 5 日，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 C—46 机撞在青岛的一座山上，机上 46 人全部罹难。以后几周内，2 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相继坠毁。于是，中国航空公司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所有客运航班。

虽然在中国上空飞行困难重重，但对陈纳德来说却是驾轻就熟的事。

2 月初，陈纳德决定将航空公司的经营业务放在广州，因为广州最接近内地的灾区。民航空运队开始在广州天河机场建立永久性设施。

陈纳德喜欢上海甚于广州。他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拥有一处寓所。他的“小东西”——陈香梅，这时还在上海分社上班呢。

民航空运队在外滩 17 号设了一个办事处。陈纳德把办事处当作他的大本营。

以前担任过陈纳德的翻译的舒伯炎，也从中国空军退役，到了民航空运队工作，当陈纳德的私人助理。陈纳德的勤务人员，还是在昆明用过的那些人。再加上一条忠实的小狗，陈纳德叫它“乔”的那条小狗。这一切，使陈纳德感到像是回到了老家。

3 月间，民航空运队已飞了 91343 吨/英里救济物资和 14589 吨/英里信件。

此间，飞机还将药品运到南昌的麻风病院，把种籽运到长江三角洲用于春播，让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人回到故土，将羊群运到西北的甘肃省。

5月运输量猛增到 386343 吨/英里，6月达 322820 吨/英里。到 7月 1日，民航空运队已拥有职员 385 人，并且开始赢利了。

陈纳德感到很兴奋。他写道：

“在经过那么多年将飞机作为一种破坏性手段之后，我能将它用于建设性目的，用它来建设一个国家，而不是将它夷为平地，对此我真感到高兴。”

第八章 终曲

1 婚礼在上海举行

夏天，陈香梅受聘民航空运队，兼任《空运队公报》编辑，同时仍然继续在中央通讯社的采访工作。最初的《空运队公报》仅仅是一张油印的单页纸，主要报道空运队的新闻和人物，阅读对象是队里的职员及队外人士。随着空运队营业量的不断扩大，陈纳德与陈香梅之间的婚姻问题也进展得十分顺利。

不久，这门婚事得到了陈香梅在上海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首肯。

接着，陈香梅在美国旧金山任领事的父亲，也飞返上海表示同意他们的婚事。大姐陈静宜从旧金山飞来。

1947年12月21日，下午。

婚礼在上海虹桥路陈纳德寓所举行。

仪式并不隆重。但是，美丽的鲜花像堤防一样，堆满了宽大的起居室、客厅，温暖的阳光照射着走廊，一千朵象征着纯洁、忠贞、奉献与长寿的白菊花，镶嵌成的大钟垂悬于起居室的天花板下。新娘穿上了漂亮的结婚礼服，它是在上海和巴黎联合设立的精致沙龙“绿屋夫人”订做的。新郎则身着戎装，英俊潇洒。

参加婚礼的除了陈香梅的父亲和继母、外祖父母、大姐陈静宜外，还有陈纳德的老友、飞虎队的军医金特里，民航空运队的合作者威劳尔夫妇，翻译舒伯炎上校夫妇，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叶公超博士，法官、美国驻沪领事，以及一些至亲好友。

关于这次婚礼，威劳尔夫人后来在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对将军结婚感到高兴。他很孤独，需要一个妻子和终身伴侣。一个中国姑娘与一名比她年纪大的将军结婚并非咄咄怪事（陈香梅当时是23岁，而陈纳德是57岁），因为结婚的对象通常是由父母决定的，而首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富裕。陈香梅与陈纳德似乎是真正相亲相爱的。我在给孩子们的去信中写了这件婚事，但我猜想你们未必见到那些信件，但很愿听到此事。

将军和陈香梅对结婚之事思考甚久，但决定结婚及其日期却很突然。陈香梅的父母是在星期三动身前往香港的，但星期四陈香梅打电话让他们赶快来上海，因为她要在星期日结婚，将军说，他不会因为结婚而就变得年轻一些，所以干嘛不早一点结婚。此外，有人给了他们一只大野鹅。不在星期日吃掉会坏的。还有，他还得请教中国人怎么办结婚手续等等。

幸好，由于我们得等候财政部副部长从南京赶来，而他的飞机误点，因此，婚礼推迟了。但他终于抵达，万事准备就绪。将军、金特里、主持婚礼的副部长和我一起退到门口的留声机旁等候信号：新娘和她的父母到来了，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大门打开，金特里把留声机的音响调得很高，并将留声机针头放在唱片上，结果出来的是一个爵士调。将军由于耳背，一听到音乐，即迈开步子，可金特里一把抓住了他，我们又试了一下，不对，有人把唱片放错了，我们永远也没弄清楚是谁干的，结果又试了三张才找到婚礼进行曲。

从那时起诸事顺当，但新娘父亲突然病了，大家把他安置在床上，我们喝茶，吃结婚蛋糕，用香槟向新郎新娘敬酒。之后，我们回家去换衣服好参加七点半举行

的结婚宴会。宴会真叫人难受，那帮服务人员表现得像是忠心耿耿的家臣那样，他们想向君主表示他的幸福也是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均已跟随了他好多年。这个宴会惟一的好东西是那只野鹅，但它不是厨师买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油腻不堪的杂烩，将军对此表示歉意，但他倒不是在模仿中国的习俗；主人总要评头论足地说所吃的饭菜不够贵宾享用的标准。此外，还有一些炒蔬菜和苹果排。

将军终究是将军，而且是一个有军人习惯的人，次晨还是照例在八时去上班。

婚礼的第二天，中美各大报都作了报道。

美国《什里夫波特报》刊出了长篇报道：《陈纳德与中国新娘喜结良缘》。

《路州平民报》的报道如下：

上海 12 月 21 日电讯：由于指挥飞虎队和第 14 航空队而名震天下的 57 岁的陈纳德，今天在上海与安娜·陈这位 22 岁的娇美漂亮的中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结婚，婚礼是在上海郊区陈纳德的住房中举行，婚礼只是小规模地宣布于众，故而只有一些亲密的朋友被邀参加。

2 克奈尔·安娜和雪狄雅·露蕙丝

1948 年春，陈纳德携新娘返美。

许多记者闻讯来访，其中有一位记者说：

“陈纳德太太，请问你是否百分之百赞成中美联婚？”“这个问题不能概括而论，要看个人而定。”陈香梅回答说。

“那么你对你的婚事还满意吗？”记者又说。“你以为如何呢？”陈香梅反问道。

……

事后，陈香梅在《陈纳德将军与我》一文中畅谈了她的看法，她写道：

西洋人以结婚为爱的坟墓，因为两人相悦到极点时，爱也走到终途，在那时结婚，已淡然无味，东方人以结婚为爱的开端，因为未结婚前两人相知不深，甚至根本不认识，然后才领略人生的温暖。陈纳德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把东西习俗来一个折衷，恰到好处，永无止境。

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太阳是一阕雄壮的军乐，月亮是一首诗意的短曲；太阳高高地照遍大地，月亮静静地影满人间；这是西方的美与东方的美不同之点。然而，我们既爱太阳，也爱月亮。

我们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仅是被一道围墙所阻隔，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们走出围墙以外之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回到上海后，当时国内战况日趋激烈。

“小东西，你不喜欢再去香港或美国吗？”6 月的一个夜晚，陈纳德问陈香梅。

“我喜欢的，但是我认为你现在太忙，我们不宜再外出旅行。”“我

是忙。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去。”

“为什么？”

“亲爱的安娜，战争已逼近上海，对你有危险。”“危险也好，没有危险也好，总之，我要与你同在。”“谢谢你，亲爱的。可是民航队忙乱地撤退时，我不愿意同时为你担心。”

7月，陈纳德把陈香梅送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12月11日，他才给她写了一封信：

至爱的安娜：

我趁午餐前匆匆写这封短信给你，以答复你的前两封信。如果那时候工作许可，我计划于12月16日赴昆明，再于23日转赴广州，与你共度圣诞；不过，若是我不能归来，你必须谅解。

虽然国军仍在徐蚌一带作战，情势似无改善。我们所能做到的实在太少，留意要做的还有很多。

我的感冒并未转坏。老陈不管我要不要，每天照样给我吃药。好好照料你自己，记着要去医生处检查……

陈纳德并没有如期赴穗，与陈香梅共度圣诞节。1949年2月8日，一大早，陈香梅在医院产下第一个女孩。

他匆匆赶来，用他们夫妻两人的名字替孩子取名为克奈尔·安娜。之后，又匆匆离去。

5月，他们离开广州，迁居香港对面的九龙，肯特路12号。寓所对面住的是中国著名电影明星胡蝶。

就在这个月，陈纳德的《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

9月中旬，陈纳德偕妻再度返美。

一位同陈纳德最要好的朋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詹姆斯·诺伊，告诉陈香梅：

“我未见任何人像陈纳德将军一样，具有清晰的思想与远大之眼光。他有一种罕见的天赋，不仅能透视当前繁杂局势的每一面，而己能准确预言未来事件的形态。我记得在30年代时他曾向我说过，装载二三百名乘客，时速每小时一千英里的飞机，终有实现的一天。当时我认为他在狂想——我想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今天我们已有飞行更快的喷气式的飞机，同时大型运输机的载重量也在不断地增加中。”

这位高大、魁梧、豪爽的州长，四年前，也就是陈纳德1945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之时，就曾经建议陈纳德竞选州长，后来又建议他去竞选美国参议员。然而，这一切都被陈纳德拒绝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他们在1950年1月飞返香港。

3月10日，早晨6时，陈香梅在九龙的圣·德利撒医院产下第二个女孩。陈纳德又一次当父亲了。

女孩取名为雪狄雅·露蕙丝。雪狄雅是陈香梅姐姐陈静宜的教名，而露蕙丝则是陈纳德姨母的名字。陈纳德五岁时丧母，他和弟弟威廉曾在外祖父家住过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兄弟俩得到了他们的姨母——露蕙丝·蔡斯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因而在替孩子取名时，陈纳德用了二

人之名为名。

3 台湾

雪狄雅·露蕙丝出生后不久，陈纳德一家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

他们定居于台北武昌新村 12 号，离市区只有 20 分钟的汽车路程。

随后，陈香梅的姐姐也嫁给了住在台北的理查德·李医生，夫妻俩都在民航空运队医务部门工作。

陈香梅不想闲着，陈纳德让她在《空运队公报》杂志社做编辑工作。这份杂志已成了一份定期的英文出版物。陈纳德改不了他的打猎嗜好，他经常同几个朋友一起，到台南去。那里一望无际的甘蔗地里有的是雉鸡和水禽。他的精力仍然是那样充沛，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沿着甘蔗地埂走。

突然，从甘蔗林中飞出一只羽毛五彩缤纷的雉鸡。他眼捷手快，“砰”的一枪，雉鸡应声落地。猎狗乔的后代“法蒂”扑上去，捡回打下的雉鸡，此时忠实的乔已经年老体肥。在台南一些小农庄的附近，有许多池塘，池塘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只野鸭子。

他们在池塘四周进行围猎，当野鸭子飞到一定高度时，所有射击手一齐开枪。空中到处是翻滚的野鸭、羽毛和碎鸭肉……

陈纳德带了十来只野鸭子和野鸡回到台北，夫妇俩邀请朋友来吃野味宴。

有一次，谈到钓鱼时，陈纳德说，他在中国没有钓到什么鱼，在台湾更无鱼可言，池塘里养的只是些鲢鱼。

接着，他想起了以前在陆军航空队运邮件飞往西部的年代。在二三十年代，不少部队驾驶员都要干这种差事。

他慢慢啜了一口威士忌，燃着一支“骆驼牌”香烟，津津有味地大谈钓鱼的往事。他说：

“那次我飞的是一架敞盖的 DH—4 双翼飞机，有一台‘自由式’引擎。此前，我曾多次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去亚里桑那州的凤凰城。新墨西哥西南边的基拉河周围的田野十分壮观。在多次飞越这个崎岖不平的基拉峡谷时，我曾想降落，并想在河中钓鳟鱼。

“在一个特别晴朗的春日，我再也无法抵挡这种诱惑，将飞机停在基拉峡谷的底部，靠近河边的一条狭长地带。我走出飞机，拿起渔具，开始寻找鳟鱼。

“阳光灼热，天空碧蓝。我花了几个小时在清澈的河水中捕捉美丽的鳟鱼。突然，我想起得赶快去办完公事。我收起渔具，将一大串发亮的鳟鱼挂在机舱的一个钩子上，以备事后食用。

“当我试图起飞时，突然刮来一阵侧风，把飞机卡在峡谷内，并使飞机的起落架撞在一块大石头上，而翻了身。我的额头上裂了一个大口子，身体倒挂在机舱内，那串湿淋淋的鱼不断拍打在我的脸上。”

“飞机倒没有起火。我将飞机下降到地上，察看损坏的情况。可是，我无法弄好飞机，因此只好背起邮包，拿起渔具和鱼，开始爬山走出峡谷。

“夜幕降临时，我架起一堆篝火，煮了鱼，随后在峡谷上面一块巨

石之下蜷缩而眠。次日我好不容易走到一个牧场。

“牧场主和他的妻子看到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长着一脸胡子、还戴着飞行盔甲和墨镜的陌生人，在敲他们的门，而大吃一惊。在弄清了情况之后，他们让我打电话给基地，牧场主妻子还帮我洗了额头上的伤口，并用绷带包扎好。”

陈纳德边喝酒边开心地笑着说：

“那时的确很难使航空队调查组相信，我的飞机会恰好坠落在一条有鱒鱼的河边上！”

陈纳德对孩子可以说无尽的钟爱。

一次，大孩子克奈尔·安娜患了“台湾热”，病情很危险。白天是好好的，晚上忽然发高热，双颊红涨，冷汗淋漓，起先还哭，后来竟然不作响，这把陈纳德夫妇吓坏了。

医生和护士替孩子注射的时候，陈纳德总是借故走开，说是不忍看见孩子因为疼痛而哭叫。晚上陈香梅催他去睡一会，他说不想睡，直到天快亮了，看着孩子比较安静，他才回到自己的房间。早餐也不吃，说是吃不下去，只是望着孩子发呆。

孩子一连发了两天三夜的高烧。

第三个晚上，孩子服药后，睡下了，陈纳德叹了一口气，对陈香梅说：

“我天天晚上为我们的孩子祈祷，我相信上帝一定听见我的。”

“我也曾这样做，我们继续祈祷，请求上帝助我们吧。”陈香梅接着说。

良久，陈纳德闭上眼睛，默默地坐着。只见泪水从他的双眼涌出，流湿了他的双颊。

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自从五岁那年母亲去世哭过以后，我未曾再流过泪，如今我方寸已乱，不知怎好。……我不知道还会再活多久，20年后，30年后，这个孩子将代我来做你的好伴侣……假如她有何不测，太对不起你了……”

他说到这儿，已是泪流满面。

第四天早上，孩子从死神的魔掌中逃脱出来了，热度也退了许多，她弱小的声音中吐出：“爸爸在哪儿？”于是爸爸马上走过来，不停地吻她的小手，吻她的脸——孩子自生病以来第一次笑了。

4 肺癌

1952年，陈纳德将他在民航空运队的股份出售，随后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梦洛，为陈香梅的两个女儿买下了一幢房子。

梦洛是一座只有八万人口的小城。奔腾不息的密西西比河流经小城，河的两岸是古老的原始森林。

他们经常往返于台北与梦洛之间，过着平静而愉快的家庭和社交生活。

陈纳德夫妇俩都喜欢看书。有时候晚上一卷在手，两人对坐两三个钟头而不交一语。

他俩尤其喜欢看一本关于林肯的传记：《没人知道的林肯》。

该书的作者戴尔·卡内基，为了写好这本书，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起初，他在伦敦和纽约两地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草稿。一看，很不称意，于是将草稿全部烧掉，推倒重来。

后来，他改变手法，从林肯的私生活入手，描写林肯的一生奋斗事迹。他特地跑到林肯的故乡，体验林肯当年所遭受的挫折、忧伤、爱情和悲剧性的婚姻，在林肯曾经歇过脚的大树下坐了一整天，在林肯恋人安丽芝的墓前凭吊，又到林肯和安丽芝谈恋爱的乡村里寻找灵感，继而在林肯开过苹果店的故址上徘徊。最后，作者又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不少有关林肯总统的资料，直到他能以林肯的快乐为快乐，林肯的忧伤为忧伤，林肯的失意为失意时，他才开始动笔写这本动人的传记小说。

林肯的一生贫困潦倒。他的外祖母在一个大农户家做侍女，被主人看上了。主人立意栽培这个年轻而貌美的村女，并鼓励她读书写字，可是不幸的是，她竟和主人发生了关系而怀孕了。

最初那个多情的农户答应娶她，后来又妥协于各方面的压力。这样，林肯的外祖母终遭遗弃。她忍辱负重生下了林肯的母亲——南丝。

南丝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22岁时和一个名叫汤姆斯·林肯的伐木工人结婚。1809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诞生了。儿子取名为亚伯拉罕·林肯。

九年后，南丝去世。她的丈夫到森林里伐了一棵大树，制作了一口棺木，草草地将他年仅35岁的妻子埋葬了。这位贫苦了一生，可怜的母亲，做梦也想不到她的儿子日后会成为美国最有名的总统。

林肯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有史以来的一代伟人。

林肯的一生，受到过两位女性的影响，那就是他的恋人安丽芝和他的妻子玛丽·托德。

据说，安丽芝是一个非常贤淑而又漂亮的女子。林肯20多岁时，同19岁的安丽芝相遇于伊利诺伊州的纽沙旁。两人一见倾心，花前月下，早有白首之约。突然，有一天安丽芝病倒了。起初几天，她只是感到疲乏，可是后来竟不能起床了。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伤寒，这种病在当时几乎是一种绝症。安丽芝在病痛中呼唤着林肯的名字，林肯一直陪伴在她的床前，直到她弥留之际。

安丽芝病逝之后，林肯完全丧失了理性。他每天都到安丽芝的坟前哀哭，下雨的时候，他的哭声更哀，他说他实在不忍眼看风雨吹打安丽芝的坟墓，他的亲友生怕他会自杀，他们都寸步不离地紧随他，监视他。

两年后，林肯离开安丽芝的故乡，去春田学习法律。就是在春田这个地方，林肯由寂寞无名的小律师，进而当选为州议员，国会议员，1861年被选为美国共和党的第一任总统。那时正值南北裂痕日深，战争一触即发，林肯在此时上任，真是任重道远，力挽狂澜。何况南方人士没有一个不反对他的，他们一直不了解他，直到林肯被刺身亡，美国人才开始理会对他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的确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仰的伟人。

影响林肯的第二个女人，是他的妻子玛丽·托德。

玛丽出身于南方世家。年轻时她就对人说，她终有一天要跟美国未来的总统结婚。那时大家都在背后嘲笑她。然而玛丽并不因此而气馁，她似乎知道林肯将来就一定会做总统似的，所以她在春田遇见林肯后，就不断地追求他。可是，林肯对玛丽并没有多大好感，常常是敬而远之。

久而久之，林肯哪里敌得过玛丽的手段，结果被迫与玛丽订了婚。

结婚那天，林肯竟然没有践约，他把自己关在一间斗室里，拒绝任何人见面。直到玛丽家的亲友们在深夜陆续散去的时候，林肯都始终没有露面。这使玛丽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然而这个个性强烈的女人，决定一做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两年后的一天，林肯到一个女友家赴约，那个女友不在，等候着他的却是玛丽。尽管在此之前林肯已经多次设法回避她，但这次林肯再也难以拒绝了。林肯为了不愿再使玛丽难堪，只好再度答应与玛丽结婚。正式结婚的那一天，有一个小孩问林肯：“林肯先生你到哪儿去？”林肯答道：“我大概是到地狱去吧。”由此可见林肯对这桩婚事的态度了。从此之后，林肯就从来没有一天快乐过，虽然他后来做了美国的总统。

陈香梅读完这本传记后，颇有感触地对陈纳德说：

“人生真是太奥妙了，林肯做了总统，联合了美国南北两方，解放了黑奴，然而他却一点也不快乐，他只怀念着他未成名时的日子！”

陈纳德回答道：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一个人在成功以后，他所向往的不是功名富贵，而是寒微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有苦难也有快乐的日子！”

1956年春，阴雨连绵。

陈纳德的气管炎日趋严重，剧烈咳嗽，但他每天仍要吸两包“骆驼牌”香烟。

6月，他和陈香梅带着孩子们，驾车去加拿大的路易丝湖度假。在开车回梦洛的途中，陈香梅注意到他夜间头痛，而且极易疲惫。于是，陈香梅建议他到家后，立即去医院检查。

车子刚抵家门，陈纳德便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尔特·里德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全面检查。

医生决定立即将陈纳德左肺上的小肿瘤切除，以便进行病理检查。

8月26日，即手术前一天，他给陈香梅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毫不怀疑我明天会经得住手术的，并同你和我们亲爱的女儿们生活很多年。但是正如你所知，一切事情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被召回到他来的地方去。

“要是我不能看到你们或与你们大家在一起，我要你们知道并记得，我将在精神上永远伴随着你和女儿们。我爱你和她们，爱得很深很深，我相信，爱情的力量会胜过死亡。

“请千万记住教育我们的女儿们懂得生活的真正原则：诚实、有道德、忠贞，对所有需要仁慈的人和善相待，生活简朴，不忌妒别人，既能享受人间的舒适又能吃苦耐劳。

“要谦逊。对你选定的职业一定要全力以赴。爱你和我们的女儿。”

华尔特·里德医院的外科大夫，为陈纳德切除了左肺的大部分，手术做了整整3个小时。

9月1日，病理切片检查报告：切除的肺组织内有癌细胞。

5 最后的日子

两个月后，陈纳德、陈香梅和两个女儿都回到了台北。

台北武昌新村 12 号。

这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内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客房，另外还有分开的佣人卧室。一堵高大的砖墙将楼房的前院和后花园环绕起来。陈静宜夫妇也住在里面。

他们回到家，总觉得缺了什么。原来相伴 12 年的猎犬乔，在去年冬天已经死去。它曾经与将军一起度过了在美国志愿队和第 14 航空队的大部分日日夜夜。陈纳德将它葬于台北附近的一座能俯瞰淡水河的山上。

圣诞节过后不久，一家人又归返梦洛。

他埋头于他的园地，种了许多蔬菜，还有各种花卉：玉兰、蒲公英、长寿花、风信子和紫罗兰等。

随着天气转暖，他同他的老友诺伊州长，在邓萨斯河边垂钓。夜晚，他们坐在靠近河边的温暖的“垂钓矮屋”里，用高脚酒杯喝威士忌。他们边喝边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

在医生的建议下，陈纳德戒绝了香烟，只是偶尔嘴边叼着那只石南根做的空烟斗。

陈纳德的身体似乎有些恢复，咳嗽也少了。他出席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哈伊召开的美国志愿队老兵大会，十分高兴地与昔日的飞虎队员们重聚一堂。

自从第 14 航空队协会成立以后，陈纳德一直在参加它的大会，每年他都盼望着同他的下属会见。1957 年这一年，来看望这位“老汉子”的人，比任何一年都要多。6 月间，陈纳德到医院做定期检查，结果仍然是阴性，虽然他经常感到很疲劳。

接着，他偕同陈香梅去欧洲旅行，参观了巴黎，在伦敦与皇家空军的朋友会见。

当他回到美国时，他总觉得有点不对头，白天极易疲劳，晚上失眠多梦。

在陈纳德左肺手术后的 13 个月，医生在他的肺腔内又发现了一个恶性瘤斑点。

医生们会诊后认为，如果再次手术，很可能弊大于利，因而决定采用化疗。

波士顿的拉希医院决定将陈纳德送往新奥尔良，让一位著名的肿瘤专家奥克斯纳博士继续为他诊治。

奥克斯纳大夫对这位威震四方的飞虎将军早有耳闻，于是他直言相告陈纳德，说他只有 6 个月的寿命了。1957 年 11 月 19 日，陈纳德在写给陈香梅的一封信中说：

你用温情、爱恋的话语说出我为你怀有的相同感觉——但是常常不能用话语表达出来。不知怎的，我最接近心灵的事情，总是不能用话语说出，我竭力以事实表现，我爱你以及我们两个女儿远胜今生的任何事。我一向最大及最常有的恐惧乃是我会失掉你——以及后来，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纵使我没有你和女儿们，我绝不会在不战之下，投降于致命的疾病或任何其他敌人。你可以确知，我决定在最艰苦与最绝望的情形下，为与你们一同生活更多的年月而奋斗。离开你的残酷和寂寞是太可怕而不敢想像的。

设若我必须过早地离去，我将仰赖你，尽你完善的爱心，抚育、引导、教导她

们，令她们以她们的先人为荣耀，并过着诚实、光荣的生活。我也将仰赖于你，保存着我将留给你的财产，如此你们所有的人都将有舒适的生活，享受完全使人满意的生活，并帮助那些凡是需要帮助的人。

当我与你结婚时，我在生活里实在只有惟一的志愿——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她会给予我情感、尊重，以及深爱。当然，如果我们彼此得有幸福与爱情，我盼望我们会有孩子。你已给予我所想要的一切，甚至远过之。我了解我已在你身上，获得丰富的幸福、了解与挚爱，远胜世上许多男人，我是如此的幸运，上帝在我晚年还这般仁慈地对待我。

因之，我现在以笨拙的语言，业已说出我对你怀有的情愫。此刻，我仅能再加一句，我以每一口气息与每一种思念爱着你。

1957年圣诞节，全家又按惯例飞往台北，度过这一佳节。由于化疗的影响，他经常出现恶心，体重也明显下降。1958年1月，他频频咳嗽咯血。

陈纳德回到美国。

他与科克伦驾车前往新英格兰州，在南北战争时期的故战场四周凭吊了一番。在返回的途中，在陈纳德的请求下，科克伦答应在他去世后照料陈香梅和孩子们，并设法让陈香梅在华盛顿找到一份职业。

陈纳德在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晨未吃早餐。9时30分开始检查支气管炎，10时10分检查完毕，不太痛，可麻药使人难受。刘易斯大夫真好。仍在咯血，但不多。收到不少信件、电报和花束。来访者频繁，但奥克斯纳大夫不让他们来探望。

朋友们听到他患了癌症的消息，纷纷从美国各地、英国和台湾等地写信给他。

陈纳德的最后一篇日记，内容如下：

1958年5月14日新奥尔良，奥其勒医院

今天中午开始用吸管进液体食物。我们等待此项实验进行情况。

着睡衣时体重139磅。

安娜全部时间在室中伴我。

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宋美龄来到病房探望陈纳德。此时，陈纳德已经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但他想说话。

“上校，不要说话，这次由我说。”宋美龄用了他们刚认识时的称呼对他说。7月27日，陈纳德与世长辞。

6 阿林顿公墓

美联社自新奥尔良报道：

克·李·陈纳德中将今日逝世。他的飞虎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中国上

空横扫过日本飞机。他终年 67 岁。这位面皮坚韧的飞行队队长是在赫伯特众议员(路易斯安那州)向国会迅速提出一个晋升陈纳德为中将的法案的两周后去世的。该案由 7 月 18 日获两院一致通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当夜即签署该法。

几天后，陈纳德的葬礼在华盛顿举行。

他的儿女都来了。

第 14 航空队的上百名队员，从美国各地赶来。

各国大使，美国各州州长，将军，国会议员，还有魏德迈、乔治·肯尼、柯蒂斯·李梅、卡尔·斯帕兹、纳坦·特威宁将军，以及代表美国空军的斯通将军，都前来参加陈纳德的葬礼。

7 月 31 日，晴空万里。

陈纳德的灵柩沿着树荫覆盖的阿林顿公墓的小道，随着有节拍的击鼓声缓慢行进。

扶柩人中有前志愿队驾驶员塔克斯·希尔、爱德华·雷克托、迪克·罗西，以及陈纳德将军的长子约翰·陈纳德上校。陈香梅和宋美龄坐在一起，参加了在墓边举行的仪式。阿林顿公墓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墓之一，只限于美国军人及军人直系家属在此安葬。

陈纳德将军安葬在俯瞰无名战士墓的绿草如茵的山上。墓碑正面镌刻着陈纳德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大字。这是阿林顿公墓中惟一的中文文字。

艾森豪威尔总统发来电报：

我与陈纳德将军在第二次大战时虽在不同的战场作战，但我对他的成就、他的品德无时不表示景仰。

参谋总长来信说：

陈纳德是美国空军领袖，是美国青年的好表率。

陈香梅的悼诗如下：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附 录

陈纳德生平大事年表

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年9月6日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东部小镇——康麦斯。他的父亲约翰·史东活·陈纳德，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母亲吉茜·李是美国南北战争时代南方名将李将军的侄女。

- 1898年（5岁） 随父母移居路易斯安那州。母亲病逝。1901年（8岁）喜爱狩猎与垂钓。
- 1903年（10岁） 父亲续弦。继母洛蒂·巴恩斯是陈纳德的小学教师。
- 1908年（15岁） 中学毕业。因未到读大学的年龄，父亲替他虚报了3岁，把出生年份改成1890年。是年考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继母去世。
- 1910年（17岁） 转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师范学校。
- 1911年（18岁） 师范毕业后，受聘于路易斯安那州雅典镇的一所乡间学校任教。
- 1912年（19岁） 和美国同乡姑娘内尔结婚。
- 1917年（24岁） 4月，美国对德宣战。8月，进入印第安纳州士官学校，11月任陆军中尉。
- 1918年（25岁） 秋天，被指派到纽约长岛的米切尔机场，担任第46战斗机队的副官。
- 1919年（26岁） 春天，从圣安东尼奥飞行学校毕业，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
- 1920年（27岁） 退伍。旋即加入新组建的美国空军机构，即后来的陆军航空队。
- 1921年（28岁） 夏天，被第94战斗机队录用为驾驶员。1923年（30岁）在珍珠港的路加机场指挥第19战斗机中队。
- 1925年（32岁） 升任上尉。6月23日，陈香梅生于北京。1926年（33岁）奉调回到得克萨斯州勃鲁克斯机场任飞行教官。
- 1928年（35岁） 苏联高薪聘请，为陈纳德拒绝。
- 1930年（37岁） 在弗吉尼亚州兰黎机场的空军战术学校深造。嗣后随该校迁入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尔机场，担任战斗机战术高级教官。
- 1935年（42岁） 《防御性追击的作用》出版。
- 1936年（43岁） 秋，因患气管炎住院。
- 1937年（44岁） 自空军退休。5月8日，从旧金山启程赴华，担任中国空军顾问。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淞沪抗战。
- 1938年（45岁） 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并建立地面空袭警报系统。
- 1939年（46岁） 10月，回美休假。

- 1940年（47岁） 2月，由美飞返昆明机场。 10月，受命赴美招募志愿队。
- 1941年（48岁） 11月，美国志愿队分为3个中队。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20日，首战昆明。此后中国报纸始称美国志愿队为“飞虎队”。12月23—25日，仰光空战。12月25日，香港沦陷。
- 1942年（49岁） 4月18日，擢升准将。7月4日，美国志愿队解散。嗣后新组建了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7月，父去世，享年80岁。
- 1943年（50岁） 3月3日，晋升少将。3月10日，出任第14航空队司令官。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 1944年（51岁） 在昆明接受中央通讯社第一个女记者——陈香梅的采访。
- 1945年（52岁） 8月，退休，返美。与前妻内尔关系长期恶化，终于离婚。12月离美赴沪。
- 1946年（53岁） 10月25日，民航空运队成立。
- 1947年（54岁） 12月21日，与陈香梅在上海举行婚礼。
- 1949年（56岁） 2月8日，大女儿克莱尔·安娜在广州出生。《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 1950年（57岁） 3月10日，小女儿雪狄雅·露惹丝降生于香港九龙。随后，定居台北。
- 1956年（63岁） 9月1日，诊断患有肺癌。
- 1958年（65岁） 7月18日，升为中将。7月27日，病逝于美国新奥尔良。

参考书目

1. [美] 杰克·萨姆森著石继成、许忆宁译，《陈纳德》，东方出版社，1990年。
2. 金宏达、于青编，《陈香梅文集（1~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3. 小叶秀子著，《虎啸九天：抗战中的陈纳德将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4. 陈济康、戚厚杰著，《蒋介石的洋顾问》，华文出版社，1995年。
5. 胡辛著，《陈香梅传》，作家出版社，1996年。
6. 廖惠雄著，《猫儿山的证明：1944年的壮烈——广西搜寻保护二战时期美军援华飞机残骸纪实》，1997年1月16日《服务导报》。

